

# 日本共産黨 鬥爭小史

市川正一著



世界知識社



## 日本共產黨的三十周年

日本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德田球一

美帝國主義者追求世界統治權的政策，目前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其中一個障礙是日本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

一九五二年「五一」節示威運動說明了日本革命運動的水平已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在全國四百個地方分別舉行的「五一」節示威，共有四百萬人民參加。敵人到處對示威組織了進攻，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出動了美國軍官指揮下的強大的武裝警察部隊。但是這種粉碎示威的企圖，顯然是失敗了。在東京，美國軍官指揮一萬名武裝警察，向人民廣場上的「五一」節示威遊行大會進攻。十萬名示威羣衆堅決向警察還擊，結果雙方死傷數百人。日本人民的堅決反抗，使美軍在朝鮮的處境更加沒有希望，加速了美國在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組織的崩潰，並使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同謀犯——日本反動派陣營更加混亂。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日本的革命運動已成爲美國在遠東的侵略政策的嚴重障礙，並且表明了日本的革命運動在這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這個運動得到國際上普遍聲援的原因，正在這裏。

目前日本革命運動的上漲，是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來頑強鬥爭的結果。今天，在黨的三十周年紀念日，我們黨有必要回顧它過去的活動，以便從中學習，從而幫助黨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一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起了重大影響。在它的影響下，各國共產黨紛紛成立。最近幾年來，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在慶祝它們的三十周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創立的日本共產黨在今年慶祝它的三十周年。

從一九〇〇年起，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在日本就在偉大的片山潛的領導下開始發展。有一個時候，這種運動曾被軍國主義的天皇制政府所扼殺。

但是，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工人運動、農民和學生運動復活了。一九一八年夏天日本發生了「米騷動」——飢餓的老百姓的搶米運動。

一九二二年初，莫斯科舉行了遠東各國人民的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以後，那時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在片山潛同志領導下統一為日本共產黨。共產黨宣佈它的綱領的目的是推翻天皇制度與建立民主共和國。

一九二七年，共產黨把這個簡單的綱領充實起來，使黨能擴大它在羣衆中的影響。

日本共產黨在粉碎了以山川爲首的經濟主義的取消派以及企圖以小資產階級的抽象理論使黨脫離羣衆的福本等「左」傾集團以後，就成了工人階級的真正的先鋒隊了。它的綱領包括下列幾項：推翻天皇制、廢除不勞而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無償地歸還農民、七小時工作日、成立工農聯合政府。由於渡邊政之輔同志的領導，黨曾依靠廣大羣衆的支持，勇敢地爲實現這個綱領而鬥爭。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遠東各國特別是中國的偉大民族解放運動，已使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中脆弱的一環——藉天皇制度維持生存的掠奪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日本政府才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進一步加緊干涉中國。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強佔滿洲，這使它成了第一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

爲了進行這場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加加強它的壓迫人民大眾的政策。這是法西斯的壓迫制度與封建殘餘的結合。

共產黨首先受到殘酷的鎮壓，以後這種鎮壓更擴及工會、農會、學生團體以至自由文化活動的各個方面。人民的全部生活、思想和行動都受到軍國主義奴役的束縛。

這種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已開始的殘酷鎮壓，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愈來愈厲害了。

我們黨竭盡全力與這種爲了侵略戰爭的利益而實行的政策進行鬥爭。共產黨不顧半封建的天皇制統治是如何窮兇極惡，繼續在工廠、礦山、鄉村和陸、海軍裏面組織反戰

小組，堅持鬥爭。

在這種激烈的鬥爭過程中，我們黨的卓越的領袖市川正一被敵人殺害了。

自從共產黨成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戰敗爲止，這二十三年中，我們黨的活動總是秘密的，經常受到野蠻的迫害。因此，黨員人數從來不曾超過一千人。然而，儘管如此，黨仍在工人、農民、進步學生之中爲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奠立了一定的基礎。現在擁有數十萬黨員並獲得廣大羣衆支持的共產黨的極爲迅速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日本遵照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掠奪性的日本帝國主義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以前被看做天神一樣的天皇被迫放棄他的神位。「治安維持法」以及其他法西斯法律被廢除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以共產黨領導同志爲首的許多日本同志在受了十八年的監禁以後終於得到釋放。

共產黨第一次得到合法存在的機會，於是立即展開活動。共產黨在它的綱領中要求廢除天皇制度，沒收寄生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確立人民對壟斷資本的管理和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共和國。由於這種緣故，黨立即受到反動派——特別是殘餘的法西斯集

團——的瘋狂進攻，這些集團爲了恫嚇共產黨人甚至不惜以恐怖手段對他們進攻。社會民主黨分子和資本家勾結，向共產黨發動進攻，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但是工人階級不顧一切，積極支持共產黨，工人階級的鬥爭幾乎完全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因此，一九四六年日本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罷工鬥爭。一九四六年夏季和秋季，海員工會、鐵路工人工會、電氣工人工會以及其他工會進行了一場勝利的鬥爭，要求提高工資，每日工作八小時，實行勞資集體合同制度等等。戰時日本沒有工人階級組織。在一九四七年初，組織在工會中的工人和職員已達四百萬人。

在進行這場鬥爭的過程中，我們黨不但勝利地領導了罷工鬥爭，而且還爲大規模建立工人階級對工業的管理而奮鬥。這種管理是必要的，因爲資本家鑒於國內政治局勢與經濟局勢對他們不利，已在停止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得不進行反抗，反抗的方式不單單是罷工，而且還要管理企業。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感受痛苦的羣衆歡迎這種管理。

工人階級管理生產的戰術受到資本家和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一致的瘋狂進攻，但是儘管這樣，這個戰術還是成功了。這種經驗對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是有很大大意義的。正因爲工人階級依靠生產管理，他們就能够勝利地進行罷工鬥爭，並滿懷信心地爲奪取政權而鬥爭。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許多工業部門的二百六十萬工人決定宣佈總罷工。在工人階級強大無比的力量面前，政府和資本家完全不知所措了。雖然他們在麥克阿瑟總部軍隊

的幫助下避免了這次罷工，但是工人仍然通過談判得到加倍的工資，實現了每日工作八小時和實行集體合同制度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艾奇遜發表的聲明中，美帝國主義者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反共立場。他們竭盡全力把反動的吉田政府搬上台。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總罷工以前，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禁止罷工。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鑒於共產黨人的領導作用愈來愈有力量，工人依靠着管理生產，鬥爭的規模愈來愈大，美國當局就發佈禁止總罷工的命令。從那時起，他們就不斷擴大他們的行動，而置波茨坦公告於不顧。禁止總罷工的命令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發出的，這是在日本建立目前的殖民地政權的第一步。

面對着一九四七年二月禁止總罷工的命令，我們黨爲了加強與以工人階級爲首的羣衆的聯系，向後退却了一步。這時共產黨在工人階級當中的領導作用是強大的，但是在農民當中，特別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當中的領導作用仍然是薄弱的。這時黨員人數還不夠多——只有三萬多一些。

後來黨集中全力加強黨組織和它們在各種羣衆團體中的影響；黨擊退了敵人的各種各樣的挑釁和進攻，穩步地建立了它的革命力量。

在這以前，黨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在羣衆團體中進行工作的重要性，而後來黨採取堅決的方針，加強黨在各個合作社、在文化和藝術工作者中、在中小製造商組織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在警察局以及其他迫害人民的機關中的影響。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使

黨的活動不單局限於工人階級中間，而是要把黨的活動擴大到農民、學生、知識分子、中小製造商和商人中去，從而建立一個廣泛的民族民主戰綫。黨還會設法擴展它在青年和婦女中間的活動。

先前黨的大多數報刊都是中央出版的。這時黨通過一項決定，規定黨的所有地方機關都要出版報刊。到一九四九年底，黨組織一共出版了五千種報紙和雜誌。所有黨組織也都成立了黨課訓練班。除了訓練領導幹部的中央幹部學校以外，所有地方黨委員會也都開辦了學校。我們用這種辦法來提高黨員的教育水平。我們一面為實現羣衆的日常需要、保障他們的利益而鬥爭，一面加強黨與羣衆的聯系，使黨更加堅強，能夠抵抗敵人可能進行的種種鎮壓。

這樣做的結果，黨的力量大為增加。

我們黨又用團結社會黨和勞農黨的左派的方法進行了吸收新黨員的工作。結果共產黨壯大了許多，到一九四九年底，黨員人數已超過二十萬。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禁止總罷工的命令發佈以後，共產黨員和其他進步分子被大批地趕出工會和農民組織。反動政府爲了達到這種目的，將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套在共產黨人頭上，各種行兇和賄賂的手段以及各種分裂活動都施展了出來，以削弱黨在羣衆中的影響。爲了對付這種情況，我們黨一面設法避免羣衆組織的分裂，一面用各種方法加強黨的影響——甚至設法加強黨在反動分子或中立分子所領導的組織中的影響。這樣一來，



儘管這些組織中的被收買的機會主義領導者進行抵抗，共產黨所領導的羣衆組織中的聯合行動的運動加強了，工人羣衆和農民的聯系加強了，統一戰綫的策略也擴大了。儘管隸屬於產業別工會會議的各個工會以及其他左派羣衆組織的會員人數大大減少，但是統一戰綫策略却在羣衆組織中廣泛而勝利地應用着，共產黨的力量並沒有減少，相反地却繼續增加了。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衆議院的選舉中，我們黨儘管受到吉田政府和美國佔領當局的野蠻迫害，仍然得到三百萬票，在國會中贏得三十五席。在競選過程中，黨在地方上的影響也大大增長，許多共產黨員當選爲市長、村長和市議會議員，而先前這一切幾乎完全沒有他們的代表。

黨在各個文化、科學組織和機關中做的工作一直是非常薄弱的，這時已大大擴展了。但是在這個時期，與得到這些成績的同時，產生了兩種機會主義。一種機會主義表現在一九四九年春季舉行的中央委員會第十五次全體會議中。犯有這種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低估了美國佔領政權的反動本質，認爲在國會中用和平方式取得革命的勝利是可能的。

另一種機會主義表現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主張這種機會主義的人認爲日本政府完完全全操在美帝國主義者手裏，吉田政府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政權機關只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因此他們主張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只對美國佔領軍進行鬥爭，而沒有提對吉田政府進行鬥爭。這些機會主義者主張黨集中全力在羣衆中廣泛宣傳這種任務，鼓動羣

衆立即爲促使美國軍隊撤退而鬥爭。

由於黨內進行討論的結果，黨的右翼機會主義得到克服。「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和北京「人民日報」刊載的深刻分析日本處境和黨的處境的文章在這方面給了黨很大幫助。一九五〇年一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第十八次擴大全體會議一致決定黨的當前任務是爲結束美國佔領政權和推翻以吉田政府爲代表的國內反動勢力而鬥爭。但是這種決定沒有對當時日本情況作十分清楚的估計，沒有確定與國內局勢相適應的主要革命行動。黨繼續受到左派機會主義動搖態度的損害，後來形成了包括以托洛茨基分子爲首的各種動搖分子在內的宗派主義集團。

不用說，這些宗派主義集團的出現便利了美帝國主義者和日本反動派對共產黨的進攻。他們趁着黨內部有弱點的機會促進黨內的分裂活動。結果使黨員人數暫時減少，妨礙了黨的進一步壯大。

這時黨有必要擬訂一個新綱領，來幫助消除黨內分歧，打開一個新局面，讓黨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 三

我們黨的領導方面缺乏明確認識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戰後的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

國家呢，還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殖民地附屬國。黨的領導方面認為：日本正如戰前一樣是一個軍事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它的正常的發展已經被打斷了。的確，黨的領導方面也會指出：由於美國的佔領，日本已處於附屬國的地位，因此使日本從佔領統治下解放出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黨的領導方面沒有明確地規定這種革命的性質是殖民地、附屬國的革命，這種革命的原則是斯大林同志已作過透徹的說明的。共產黨的領導方面曾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任務，並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成為解放鬥爭中的一個積極因素。我們會非常努力地研究這個問題，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把這個問題弄明確。

新綱領的意義在於它除去了這種不明確的地方，規定了日本行將來臨的革命的性質是一種附屬國的革命，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

共產黨的新綱領正漸漸成為全體人民的綱領。在它的旗幟下已經成立了許多反抗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勢力的堅強組織。這是因為我們黨的新綱領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並給他們指出了一條爲了美好生活而鬥爭的正確道路。

從一九四九年秋天開始，我們黨除了從前的合法活動以外，又轉入了另外一種符合於新的形勢的活動方式。戰爭結束後，我們黨會從事大規模的合法活動，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黨變成了一個羣衆性的黨，並且大大地發展了。但是爲了對付敵人惡毒的進攻和挑戰，爲了使黨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組織系統，以利於進行必要的行動。

由於轉入這種新的戰術，我們黨提出了一個口號：「依靠人民的信任進行鬥爭」，這就是說，永遠不能忘記必須密切地聯繫羣衆。這樣，黨依靠人民的強大力量才得以保存它的組織。在黨的領導之下，羣衆在短短的時間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反抗組織，這些組織正在擊退着敵人的進攻。

正是由於採取了這種新的戰術，我們才得以挫敗美帝國主義者和日本反動派的陰謀，他們從一九五〇年起便竭盡全力來摧殘共產黨，並利用黨內的反對派來達到這個目的。這種戰術並使我們得以保證黨的進一步的發展與鞏固。

美國佔領當局和日本的吉田反動政府利用佔領政權的條件，禁止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赤旗報」的領導人員參加公共生活。他們「整肅」了工會和國會中最積極的人們，並下令取締了近兩千種進步報紙和雜誌，其中有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赤旗報」，他們封閉了這些報紙和雜誌的印刷所。他們把幾萬個積極分子不是暗殺掉就是投入監牢，並以各種各樣莫須有的罪名來誣告他們。但是，儘管如此，革命的力量還是愈來愈大，愈來愈鞏固了，這證明了我們黨已戰勝敵人的鎮壓政策。

由於採行了新綱領，明確地提出了黨的目標，全黨都投入了更加積極的工作。

舊金山單獨對日「和約」、美日「安全條約」和後來的所謂「行政協定」簽訂後，人們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條約的意思就是：延長美軍在日本的佔領期，奴役日本人民和把日本變成侵略蘇聯、中國、朝鮮、越南及其他遠東國家的基地。

反動的吉田政府違背國際協定而發表的結束蘇聯駐日代表團的活動的聲明，以及它爲了進行侵略戰爭的目的與蔣介石集團相勾結的行徑，更加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

工人階級、農民、學生及其他階層的知識分子和中小工商業者的回答是按照共產黨新綱領的精神，起而作堅決的鬥爭。

這種強大的人民反抗運動在工會的行動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了，工會組織將人民羣衆團結在它周圍。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期間，工會曾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罷工並且組織示威，參加的人有一百五十萬到四百萬。工會就這樣有力地打擊了法西斯政策，並引起了敵人陣營之內的驚惶失措。

直到現在，日本的革命運動仍然缺乏與國際力量充分合作。但是，自從我們採行新綱領並開始實行這個新綱領以來，這種合作已經加強了。許多國家的兄弟共產黨和進步團體在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在與蘇聯和新中國的關係上、在反對美國侵略政策的鬥爭上、在我們黨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其他一些有關我國人民生活的問題上，都給了我們巨大的精神上的幫助。

在這方面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約·維·斯大林給日本人民的新年賀電。這封電報不僅加強了日本人民的國際聯系，並且也無可衡量地幫助了他們去加緊與美帝國主義者和日本反動勢力的反蘇、反共政策作鬥爭，同時還幫助他們爲勝利地實現共產黨新綱領

中所提出來的任務而奮鬥。

#### 四

在美國佔領軍的命令之下實施的「土地改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社會黨右派與「左」傾的冒險分子說：由於這種改革，將可耕地分配給農民的工作已經完成，唯一的問題是目前的農業無利可圖，因此投於農業的資本極爲不夠。

根據這種推理，他們就譏笑我們黨的土地政策，說我們提出實行革命的土地改革的要求是很可笑的。

那時候我們沒有能够在這個問題上給社會黨右派和「左」傾冒險分子以決定性的打擊。我們雖然提出了革命的土地改革的要求，同時並堅持滿足由於國內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所引起的農民其他的各種要求，但是我們沒有正確地把這些局部的要求和基本要求——實行革命的土地改革——聯系起來。因此，我們沒有能把農民、特別是作爲農民運動的主力的貧農爭取到我們方面來。

我們黨的新綱領，完全肅清了這種在土地問題上的不明確的地方，指出了農業的發展與農民生活的改善，只有在實行了革命的土地改革並且完全剷除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殘餘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實際上，在美國佔領軍命令之下實行的「土地改革」，並沒有

給中農與貧農任何利益。根據這樣的土地改革，農民必須支付大筆金錢買他們所分得的土地，農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結果他們所得到的土地很快就又落到地主與富農手裏去了，農民反比以前更爲窮困。

這種「土地改革」，把森林與荒地都留給了地主。社會黨右派和「左」傾冒險分子說：關於這種狀態，我們沒有理由把責任歸在政府身上，因爲將來這些森林與荒地都要完全交給政府。然而，在日本，耕地只佔整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十六，不把森林與荒地交給農民，任何改革對於農民都毫無用處。農民爲了畜牧、砍柴和取得肥料而使用森林與荒地時，必須支付大量的金錢。這樣一來，地主與富農在鄉村裏的統治照樣維持下來了。目前在強有力的反抗組織的保護之下，農民繼續在作有組織的鬥爭，要求把森林與荒地無償地交給他們。

「土地改革」也沒有觸動灌溉與改良土壤的設備，沒有這些，農民們是不能改進耕作的。

因此，這種「土地改革」不但沒有掃除鄉村中的封建殘餘，反而有助於保存反動勢力的統治。違反民族利益的「自由」黨之所以仍能在國會中佔大多數，正是因爲它牢牢地依靠着鄉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殘餘勢力。因此，如果不實行革命的土地改革，不僅不可能根本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就是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也是同樣不可能的。而不發展農業生產，就不可能改善工人階級與全體人民的生活。我國人民像以前一樣，被迫生活

在天皇制度之下，仍然受美國人的奴役，忍受失業的痛苦，充當戰爭的砲灰。美帝國主義者實行騙人的所謂「土地改革」，正是爲了要達到這些目的。

共產黨的新綱領發表以後，實行革命的土地改革以及把森林、荒地與灌溉設備等交給農民的要求，在鄉村裏格外普遍了。

除了規定以革命方式解決土地問題以外，新綱領還規定取消半封建性的勞力剝削，工會應有自由，徹底改善人民羣衆的物質條件，並把實現這些要求的鬥爭與農民的鬥爭密切結合起來。這樣，爲切實實現新綱領而作的鬥爭，就鞏固了工農聯盟。這種鬥爭並把那些同樣遭受美國佔領與吉田政府統治痛苦的學生、知識分子、手工業者、中小商人與工商業者都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了。所有這些力量都團結在以工農聯盟爲主力的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以內。這些革命力量依靠各種反抗組織正與美國佔領軍及日本反動勢力作鬥爭。正因爲根據新綱領而使所有的革命力量切實地鞏固了起來，這些革命力量才從一九五一年底起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

## 五

由於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美帝國主義者加在日本身上的桎梏更加沉重了。美國人開始從日本榨取這個戰爭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資。因此，這個國家的許多



日用必需品都極端缺乏。朝鮮戰爭的曠日持久，使經濟危機更爲嚴重。日本資本家所引以自豪的紡織業，最近也不得不把它的生產能力削減百分之四十。這對於許多與紡織業有關係的中小企業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擁有資本一千萬日元以上的一百多個大公司完全破產了。經濟危機也席捲了其他工業部門，自化學工業起，以至機器製造工業。在目前，經濟危機已深入到鋼鐵工業——戰爭工業的核心。完全失業和半失業的人數在一千八百萬以上。整個說來，人民過着實在難以忍受的生活。

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表明：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一些資本家，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轉上戰爭軌道的結果，已面臨到破產的危險，他們希望和蘇聯、新中國、人民民主國家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平相處，並和這些國家發展貿易。日本的許多資本家的情况也是這樣。預料訂於九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將有許多代表參加。最近參加過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日本資本家的三個代表，代表日本參加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籌備會議。

美帝國主義者爲了想掩蓋他們在朝鮮所遭到的失敗，就進行細菌戰，並對戰俘使用殘酷的報復手段。但是，在這些暴行被揭發後，日本人民對美帝國主義者的仇恨更增加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迅速撤退佔領軍，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發展得更爲壯大了。羣衆的這種愈來愈強的抵抗，正在粉碎着美國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使美帝國主義者越來越站不住脚。在目前，美國建立世界統治權的政策，正在所有國家中遭受失敗。他

們爲了避免這種失敗，使用了法西斯暴力手段。但是，儘管他們使用這種法西斯手段，甚至在美國本國，也發生了巨大規模的罷工。依靠美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正在加深。所有這一切都使美帝國主義者更難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來奴役我國人民。

美國壟斷資本和它的政治代理人，在這種嚴重情勢面前只好大肆利用匪徒組織，並在日本使用更加野蠻的法西斯統治手段。但是這只有使日本的危機嚴重化，使美國代理人在人民面前更加感到孤立。結果，美帝國主義愈來愈難維持它精神的和政治的基礎——吉田政府了。

由於這樣，美帝國主義者和日本的反動勢力就十分害怕廣大羣衆所進行的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爭取和平的鬥爭。任何法西斯鎮壓手段現在都壓制不了愈來愈壯大的人民革命運動。在目前，日本的革命運動與世界和平陣營有密切的聯系。而且，由於這種聯系牽涉到許多日常生活的經濟問題，這種聯系就越來越堅固。

由此可見，日本人民的奮勇前進是不可抗拒的。

## 六

由於新綱領的具體實施，我們黨中不可能再有反對派存在。大部分反對派分子——除去托洛茨基「國際派」，這派的人現在只剩下一小撮冒險分子了——都承認了他們的錯

誤，回到黨的隊伍來了。另外有些人正在要求准許他們重新歸隊。在目前，黨正在統一意志和統一領導的基礎上發展。但是我們仍有一些缺點。

例如，這些缺點包括：在舉行某些罷工和示威時，沒有考慮到工農的實際要求和奮鬥的目標，而只是根據領導的意圖。因此，領導人員就集中力量在罷工和示威方面，而常常對國會選舉和地方當局選舉這種鬥爭形式重視不足。我們的任務是：對黨員堅持進行階級政治訓練，掌握把公開工作和地下工作配合起來進行的藝術，克服我們在工作中仍然發生的各種缺點，我們的全部活動必須獲得羣衆的信賴，不要落在迅速發展的革命鬥爭的後面。

在回顧日本共產黨這三十年來的活動的時候，我們特別認識到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來武裝我們黨，堅定地遵奉偉大的領袖、全體勞動人民的導師、和平的旗手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指示。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在中國革命上，給中國指出一條新道路的毛澤東思想，也必須成爲我們的經常指南。

日本共產黨三十周年萬歲！

打倒帝國主義戰爭！

日本人民的獨立、自由與和平萬歲！

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萬歲！

日本與蘇聯、中國及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合作萬歲！

# 目 錄

日本共產黨的三十周年	德田球一
序	德田球一
引言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緒論	五
一 日本共產黨的成立	三
(一) 國際情勢	四
(二) 國內情勢	六
(三) 日本的資產階級	九
(四) 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	三五
(五) 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無產階級	二七
(六) 黨成立前夕的時代	三三
(七) 黨成立之具體情形	三六
(八) 黨成立由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	四〇



(三) 從「三·一五」到第六屆世界大會	一〇五
六 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以後	一〇六
(一) 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一九二八年綱領）	一一八
(二) 從共產國際第六屆大會到「四·一六」	一二三
結尾語	一二四
最終陳述	一二五

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

## 原版編者例言

「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係根據已故日共黨員市川正一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在「日本共產黨事件」的公審法庭上作為代表之一的歷時五日的陳述記錄整理而成，因而只講到一九二九年「四·一六」事件為止。



## 序

編纂黨史，必須在革命後蒐集許多資料並和許多有關的人共同商酌，否則必不能正確。而歷史如不經相當年月之後來編寫，亦難期其正確。

這本書的內容，誠如引言所云，乃是市川同志在法庭裏面的陳詞。這是在獄中極為困苦的條件下整理出來的。本書最初的目的，是和法庭作鬥爭，讀者應這樣來了解這本書。

雖然如此，本書之為貴重的著作，是無可爭辯的。我們不可忘記：市川同志是嚴謹的領導者和鬥士，他在我們黨處境最困難的時候，抗拒敵人的進攻，灑着熱血寫成了這本書。獄中條件雖然困難，但是我們却仍然在市川同志陳述以前，討論過它的內容，所以市川同志的陳詞，決不是一方面之言，而是經過相當推敲的。

不消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至寶，是我們很好的教科書。本書當然不能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相比，但是為了教育同志進行新的鬥爭，必須把這本書作為教材。由這本書可以看到，我們黨曾經犯過很多錯誤，雖然如此，但總是始終一貫為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而進行鬥爭，這就是說：在遇到困難的時

候，要怎樣使理論和實際結合在一起。我們黨曾經吃過小資產階級理論家的苦頭。這些小資產階級理論家會使理論與實踐脫節，他們的理論原是貧弱而無用的東西，在這本書裏說得都很清楚。

我們有義務根據這本書把過去的錯誤細加檢討，若發現黨的生活的各方面還有同樣的偏向，就必須痛切地加以批評，使黨更加鞏固。遇到錯誤即悲觀失望，這樣的人是毫不足取的。只有鼓起勇氣來克服錯誤，革命纔能有成就。

現在，我們的民族正面臨着破滅的危機。事實極明顯，只有我們黨的力量，纔能拯救它。因此，我們應該虛心地鍛鍊自己。市川同志爲我們增光不少，是一個不朽的領導者，現在把他這本書印出來，送給工人農民和勤勞大衆作爲鍛鍊自己的一種教材，真令人高興。

德田球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 引言

日本共產黨到今年七月，成立整整十周年了。我黨爲了迎接這個十周年紀念日，把市川同志用血寫成的這本「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貢獻給全國工農大衆及同情者諸君。

日本組織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同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正式承認了日本共產黨是它的支部。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對蘇聯武裝干涉的戰爭，是由一九一八年開始的，在這個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當中，誕生了日本共產黨。現在當迎接我黨的十周年紀念之際，又正是日本天皇着着進行準備（不，戰爭業已開始）進攻蘇聯和中國人民的時候，天皇爲了實行這種強盜式的反革命戰爭，在國內實行國家總動員計劃，使憲兵與警察合作，並充實特務警察網。對共產主義者實行血腥的鎮壓，天皇制定了死刑法（「治安維持法」）這樣的極刑，來對付我黨歷史悠久而且繼續在英勇鬥爭中的光榮同志。日本的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採取了劃時代的新戰略，站起來對於天皇的反動措置進行果敢的鬥爭。在這個重大關頭，第一次發表我們編好的黨史，相信是有極深切的意義的。

這個黨史的編纂，是以現在在獄中對資產階級的、地主的天皇制的狂暴與恐怖進行勇敢的鬥爭的市川同志在公審法庭上的演說爲藍本，爲了紀念我黨成立十周年，爲了鬥爭，宣傳部特意刊行了它。市川同志是我們黨的英明的領導者之一。這本「日本共產黨鬥

爭小史」的內容，正像市川同志所說，決不是具體地、有組織地來敘述黨的歷史，所以不能當作完全的黨史來看。而且裏面的材料又僅僅是限於從黨的成立到「四·一六」檢舉爲止。由於獄中資料極有限，又有政治上的、組織上的各種限制，言論自由被殘酷地剝奪，在資本家和地主的階級審判下，一個在法庭上作鬥爭的陳述，它的不完善完全是理所當然的。雖然有這種種的限制，但是這個法庭鬥爭的記錄，的確是把「日本共產黨到底是什麼」說得極淺顯明瞭，同時把血腥的天皇制的剝削、鎮壓與恐怖，都予以確實的和具體的反證。

工農大眾對於共產黨越來越理解，越來越信任，越來越支持。統治階級在極端恐怖之下，常常用捏造事實和反宣傳，處心積慮地來毀謗我黨。這本「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對於這樣的統治階級來說，真是一個重大的當頭棒喝，同時對於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那就真是一種力量了。

這本用血寫成的「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裏面，有許多寶貴的鬥爭經驗，例如和軍事、警察的君主制作鬥爭，和資本家、地主及其代理人左右搖擺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鬥爭，無情地克服黨內「左」右偏向，和工農大眾的一切敵人作徹底的鬥爭。現在發表這一本書，希望能從這些使黨沿着布爾什維克的路綫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英雄們用血寫成的這個大著裏，盡量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

## 緒論

因爲我們是日本共產黨員，僅僅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才被傳到這法庭來。有許多同志因爲是日本共產黨員，因爲會替日本共產黨活動，受到資產階級殘酷的追究、迫害、逮捕、下獄和長期的刑罰，有的就犧牲在資產階級白色恐怖之下了。就是爲了我也是日本共產黨員，不是爲了旁的任何理由，我被傳到這法庭來。那個日本共產黨，我們的日本共產黨果真作了些什麼呢？我現在想把日本共產黨的過去——直到我們被捕爲止的活動，具體地敘述一番，來答覆這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並不願意把黨史具體地有組織地敘述出來。黨史對我們，對於黨，從而對於日本無產階級，都是極重要的。爲什麼呢？因爲一國的共產黨的歷史，乃是這個國內階級鬥爭最高的經驗和教訓的集中表現。尤其是若把最有階級意識、最前進、最受過鍛鍊的工人之團結和鬥爭、各種大衆組織與黨的內部活動以及它所完成的各種任務、黨內鬥爭發展過程中所湧現的種種派別、乃至派別活動和黨內種種問題……都總括起來編成黨史，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革命運動的發展，都會有很大幫助的。我是很重視黨史的，可是我相信現在在資產階級執行階級裁判之下，却不是講重要黨史的時機和地

點，所以我不在這裏講黨史。現在我們所願做的就是：以對這次階級審判的鬥爭，來參加整個的階級鬥爭；把日本無產階級運動歷史上的一頁，用在這法庭中的行動來寫成。

這個法庭不是別的，乃是階級鬥爭的場面。這明明是日本國家的權力，使這法庭徹底成爲階級鬥爭的場面。法庭裏面不是擠滿着法警、獄卒和憲兵嗎？我們不是到這裏來要帶上鐵手銬、我們不是在法庭上常被制止發言、還用禁止公開審判來恐嚇我們嗎？

有人說我們是在這個法庭裏大放厥詞的。果然如此嗎？不是。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停止階級鬥爭，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作爲階級戰士而和資產階級鬥爭的。但不論是在這個階級的法庭上，不論是在斷頭台上最後的一瞬間，我們共產黨員也不停止階級鬥爭，而常站在它的前列。可是，現在當着不足一百人的旁聽者面前來大放厥詞，是不會滿足的。在這個法庭之中，敵人正向我們挑戰，他們並且用殘酷的壓迫手段，向我們挑戰。若在這法庭裏面箝制言論，那末我們連一句話也不必說了。我相信我們在法庭裏站着時的毅然的态度本身，就足以對於大衆成爲極大的宣傳，成爲號召。法庭只管許可言論自由，我們也絕不想在那範圍內大放厥詞。最近聽說解黨派那些無恥的變節叛徒，說我們只會在法庭大放厥詞，而他們不這樣作，他們是在地下和資產階級鬥爭。到今日爲止，首席推事對我們同志所採取壓迫言論自由的態度，暗中和解黨派所說的一樣，這是很有趣的事。日本資產階級權力，豈不是藉着法衣的外形，表示和解黨派一致嗎？

正像首席推事背後有資產階級的權力支持着一樣，通過我們背後默默無言、冷冷靜靜的聽衆，我們深信有聲勢浩大的階級鬥爭浪潮，有廣大羣衆的鬥爭，支援着我們。我今天所講的，乃是對付資產階級挑戰之絕對不可避免又出於不得已而又非忍耐不可的鬥爭，而不單是單純的口舌宣傳。我們背後的大衆當真允許資產階級壓迫我們嗎？當真允許判我們的罪嗎？這是首先能判斷清楚的吧。

我們不打算隱蔽日本共產黨的真實。無產階級絕不害怕真實。只有共產主義者是最愛真實的。害怕真實或者迴避真實、歪曲真實的，是那要壓迫、剝削、奴役大衆纔能維持生活的資產階級，和跟在他們後面跑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對於日本共產黨任意誣蔑，並且捏造許多無恥的謠言，我們必須揭破他們這種陰謀，把黨真實的面目表現出來。當然，關於黨的機密事項和那只有在黨的各種組織、各種機關內部才應該處理的黨內問題，是一個字都不能講的。爲什麼呢？爲了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絕對必要的。

資產階級在各處造謠，說日本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團體，又給戴上什麼陰謀、大逆、賣國、國賊等帽子，令人感覺到共產黨是窮兇極惡應該深惡痛絕的東西，對於共產黨員，應判處死刑。不，不僅這樣，如果可能的話，那就不必經過法律審判這些麻煩的手續，一下子把日本共產黨和擁護日本共產黨的革命工農及同情者，都抓來斬盡殺絕纔快意。實際上資產階級不僅以法律「合法地」加害於日本共產主義者，他們更用一切

「非法的」手段來迫害共產主義者，而且現在還繼續迫害着。日本共產黨遭受到資產階級這樣極端的憎惡，遭受到非常殘酷的迫害，可是它果真作了什麼壞事呢？作了些什麼令人可怕的事呢？到底他們作的事叫誰害怕，被誰憎惡呢？日本共產黨是那些人的敵人又是那些人的朋友呢？這纔是問題的核心哩！

自「三·一五」以來，日本共產黨雖然受到種種的鎮壓，而却能更加發展，這是什麼道理呢？只要我們黨有十個黨員被捕，後面就一定有一百個二百個新的黨員進來，更成爲資產階級可怕的敵人。黨爲什麼能成爲斬不盡殺不絕的不死之體呢？這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只要無產階級存在，只要無產階級成長，那末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不能不存在，就不能不成長，就不能不發展。

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現在的日本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之對立爲基礎的社會；資產階級壟斷了社會生產資料，掌握着國家權力，剝削和奴役無產階級；在另一方面來說，無產階級生產一切社會財富，可是他們除去出賣勞動力以外，沒有其他東西可賣。資產階級是主人，是剝削者；無產階級是奴隸，是被剝削者。這兩個對立階級彼此不相容的社會，即是今天現實的日本社會。根本否定這種階級社會、根本反對這種階級社會、徹底進行革命的階級，即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有剷除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任務。這樣看來，無產階級不是過去的階級而是未來的階級，未來的社會是屬於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



黨，是顛覆資產階級一切的統治、樹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完成這種歷史偉業的領導者，因此，只要無產階級存在，共產黨就是不死之體。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的意義是這樣：第一、它的根源是人類歷史最後階級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共產黨不是隨便成立的；第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廣大勞苦大眾最信任的朋友，同時它又是資產階級地主等一切剝削者最徹底的敵人；第三、共產黨不服從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它是和這種法律對立的，共產黨只服從國際無產階級的規約，只受它的拘束。國際無產階級的規約，決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體地、最集中地體現在共產國際的規約裏面。當然，對於本國資產階級來說，黨是非法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完全是這樣：反抗本國的資產階級，團結全世界的工人；這對於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都是無條件的信條。

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對於日本共產黨的迫害、鎮壓，是階級的鬥爭，也是政治鬥爭。日本共產黨和日本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鬥爭，是公然的權力的鬥爭，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當然不是其他任何犯罪事件，也不是什麼社會問題。資產階級害怕工農大眾知道這些事實，因此資產階級政府不僅用野蠻殘酷的方法鎮壓共產黨，還極盡毒辣下賤的中傷和誣蔑的能事。資產階級煞費苦心，淆亂視聽，彷彿想讓人知道日本共產黨不是無產階級的朋友，而是無產階級的仇敵。

對於資產階級的所作所為，起助長作用的，有資產階級特別可靠的朋友社會民主主

義者。他們在資產階級不能直接伸手到工人之間，散佈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和無產階級的集中領導者共產黨的不信任空氣，努力破壞共產黨的勢力，他們打算藉叛變無產階級的那些社會民主主義各政黨，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連結在一起。

在數年前，日本共產黨沒有在大眾之間公開宣佈政綱的時代另是一種情況固亦未可知，可是在黨公開在大眾之間活動的今天，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切的努力，結果却毫無用處。而且這不過適足以證明他們對於共產黨的迫害越利害，大眾對於共產黨的信心也越堅強罷了。

日本共產黨當真作了些什麼樣的「壞事」呢？我這就要講「連篇的壞事」了，可是，還是講些主要的吧。爲了把日本共產黨都是作了些什麼「壞事」講得更明顯，我想是有講述無產階級的敵人資產階級作了些什麼「好事」的必要吧。日本共產黨決不是沒有對手而一個人在那裏角力，它是和大敵手資產階級揪扭在一起作決鬥的。所以想要明白黨作了些什麼樣的事，先要講講敵人是伸了什麼樣的手來打的。

以下我想把日本共產黨重要的發展時期分開來講講它的主要特點。首先我想講講日本共產黨在什麼樣的時代誕生的，怎樣鬥爭怎樣成長的，也就是想講一講從日本共產黨的誕生到我們今天的被捕的整個時代的總括的一般情況。

## 一 日本共產黨的成立

日本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一九三一年）已經經歷了九年的風霜了。在這個期間，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始終一貫地存在着。資產階級說日本共產黨是好幾次無連絡地造出來的，這徹頭徹尾是騙人的話。日本共產黨在資產階級強壓之下，受到好幾次的打擊，侵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也曾阻礙了它的發展，使它後退；在某一期，甚至黨的組織也曾解體。但是日本共產黨是和共產國際一同存在，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是這樣向生長和發展的道路上前進的。

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又說日本共產黨是由特定的個人、由社會主義巨頭們，或是由偶然出現的天才，偷偷摸摸地組織成的；又說日本共產黨只是由這些巨頭、天才來操縱的組織；又說它僅是被選舉出來的那些少數人的黨，對於其他大眾來說，它乃是堅持關門主義的陰謀團體；這些明明都是惡毒的宣傳。日本共產黨是把向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日本工人階級中的革命勢力組織起來、支持着它並使它向前發展的政黨。實際上，從日本共產黨的成立起，在發展的期間，最能奮不顧身地努力為黨戰鬥的，不是有名的社會主義巨頭或「天才」，而是無名的工人戰士們。日本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政府來

說，是秘密結社，即是秘密的政黨，但這決不意味着日本共產黨是特殊的陰謀團體。共產黨是必須動員廣大羣衆來參加革命的，決不會成爲陰謀的團體。

資產階級還說什麼日本共產黨不合於日本國情，說它是完全和日本國情相反而與日本無緣的舶來品。泉二偵探局長會說：「日本共產黨的犯罪，是思想的內亂罪，是天人所不容的國賊。」社會民主主義者也作了資產階級攻擊共產黨的應聲蟲，他們也故意說日本共產黨不合日本國情，說日本共產黨忽視日本的特殊性。於是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就組織自以爲立足於日本國情的叛變的無產政黨，簡直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機關。但是可怕的事却是沒有像日本共產黨這樣深合於日本國情的政黨。現在日本的國情，不外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日趨激烈，只有那個日本無產階級的黨才是日本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決不是偶然的產物，誰也不能隨便組織它；誰也不能隨便消滅它。日本共產黨之存在與發展的一定條件，儼然存在着。

## (一) 國際情勢

先就國際情勢來說：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那空前未有的殘酷的世界大戰，是國際矛盾最初的大爆發，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整個的時代就像我們的導師列寧所說的那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是具有世界規模的由資產階級獨裁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轉

換時代。一九一七年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得到了勝利，建立了今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於是世界上才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出現。

世界從此便分爲兩個陣營：一個是日趨滅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是不管用什麼力量也阻擋不住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從中國在其國內到處樹立蘇維埃政權<sup>①</sup>的革命開始，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使帝國主義的基礎大爲動搖，並已開始崩潰。資本主義橫暴地強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不僅不能給予資本主義以永久安定的祝福，相反的却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日趨擴大，惹起了今日難掩世人耳目的世界經濟大恐慌。

在中國則軍閥混戰綿延不絕，犧牲了成千成萬的中國民衆，而這些國內戰爭實際上是站在各個中國軍閥背後的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戰爭。在這個戰爭裏，日本帝國主義者們會積極參加。不僅這樣，以日本爲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對中國的革命屢次藉故出兵，而且日本的驅逐艦砲艦及其他軍艦，還常到中國沿海及長江那樣的大河裏面去游弋。而日本的兵士——工人和農民——則因此多被犧牲。

最後，這個時代正是第二國際變節的「英雄」們，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把社會主義棄如敝屣的時代。他們變成資產階級政權的保衛者，戰後則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鎮壓

① 指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譯者

者、殖民地革命運動壓迫者的手下人，變成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例如在德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員，變成防禦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最大而公開的堡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列寧早已宣告第二國際的破產，創立了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際組織，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即受壓迫最慘與受剝削最甚的民族之強有力的干城，也是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靠着布爾什維克的光榮傳統，它常在克服一切內外的機會主義，每年都在壯大着。

在這樣的時代裏，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是革命的黨，只有成爲第三國際的支部的纔是共產黨。

我們日本共產黨是在這樣國際情勢之下成立、鬥爭並發展起來的。

## (二) 國內情勢

上面我已講過自日本共產黨成立以來以至今日，即從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直到今日，給日本共產黨的整個生活打下了基礎的國際的條件。以下主要地想講講國內情勢。

日本資本主義在世界大戰前後，面目完全一新。日本資本主義強奪海外市場和資源，達到了飛躍發展的地步，但是同時，內部矛盾也跟着激烈地發展起來，這種矛盾尖

銳地表現在日本的整個社會上，就是連續的恐慌、黯淡和蕭條。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搗毀米店的風潮<sup>●</sup>，就是最初燃起的烽火；接着第三年有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的恐慌，一九二三年有大震災恐慌，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有金融恐慌，最後在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資本主義已完全捲入大恐慌的漩渦之中了。

戰後幾年當中，雖然日本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多少仍然沿着發展的道路前進，可是內外的情勢已經阻礙着它發展，反有使它日趨縮小的趨勢。日本資本主義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市場縮小，而農業破產的危機亦連年增大；若干重要的工業特別是鐵工業，一年比一年地墜入低落和停滯之中，僱傭工人的人數在這期間絕對地減少，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但不能由資本主義來提高，反而一天一天地低落。日本資產階級看到這種情勢，對內對外乃採取經濟的、政治的、武力的、和平的、合法的、非法的一切手段，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可是這些方法，不外是犧牲工人、農民以及朝鮮、台灣、滿洲等日本資本主義殖民地的勞苦大眾而已，但是用這些方法，也是不能克服危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和矛盾越來越深刻，以致落到像今天這種大恐慌的漩渦中，這是必然的結果，並不是偶然的不幸。只要日本資本主義存在一天，這就是它必然要走的路。

● 搗毀米店的風潮「米騷動」，是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夏由於米價的暴騰，日本富山縣漁村的主婦們，大舉搗毀米店之鬧積居奇，並以此為導火綫而擴展於全國的革命的大眾行動。這個運動因為沒有領導者就被鎮壓下去了。這次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革命運動的導火綫。

像這樣矛盾日益加深，危機就愈逼愈近了。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加強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的道路，也即是政治的經濟的權力集中於一小撮金融資產階級之手的過程。現在的日本，一方面有吮吸工農和殖民地勞動大眾的鮮血而肥得走不動的超等大資產階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川崎、大倉等），一方面有喘息在飢餓綫上的數百萬大眾。資本家因為得不到使他滿足的更大的利潤，就把巨大的社會有用的生產力，例如工廠和機器，聽其閒置着、關閉着、荒廢着。在農村方面，日本國家的領導者、統治者的資產階級也弄到束手無策。除去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以外，已經沒有旁的辦法，情勢緊急，農業革命已迫在眼前。

三井、三菱等大資產階級是一毛不拔的，但日益龐大的軍費一文也不能動用，日本國家的財政更瀕於危機，更瀕於破產。而且作為日本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基礎的台灣、朝鮮等殖民地，滿洲等半殖民地，已經今非昔比，不能「稱心如意」了。因此今天日本資本主義已無力自支，資產階級國民經濟體系瀕於瓦解。於是，他們拼命從更瘋狂、更具毀滅性的帝國主義戰爭裏尋找出路。

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侵略中國的強盜戰爭，已經有數年之久，還要進行太平洋兩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主義更到了非演重要角色不可的地步。這個帝國主義戰爭，即世界性的破壞性的殘酷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已經列入日本陸海軍及其他帝國主義現實的日程上了。這樣看來：一方面是在經濟恐慌之下，有工農大眾所不能忍受的貧窮和



奴役，一方面是破壞的、殘酷的戰爭！這兩者只有外形不同，却都是盲目的、貪婪的、只知道追求利潤不知其他的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雙生子。

日本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成立、生活、鬥爭和發展起來的。我已經把作為日本共產黨成立的基本條件的世界情勢，特別是日本國內客觀情勢，簡單扼要地講過了。我更要講現在支配日本社會國家的資產階級，具體地作了些什麼事，我認為這對於了解日本共產黨的全面發展和全部生活史是有幫助的。

### (三) 日本的資產階級

日本資產階級，在這個時代裏，積累了莫大的資本。他們把剝削工人勞力所得的資本，再利用到加重剝削工人上，這樣，資本的積累就越來越高了。從戰前戰後極簡單的數字來看這一點吧。

全國公司的實收資本及投資額指數，以世界大戰後一九一九年為一〇〇，那末戰前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不過三四強，即戰後的為戰前的三倍；最近一九二八年更達到了二二〇強的地步，即又超過了一九一九年的二倍。當然，這些數字並不十分正確，不過這毫無疑問是證明了巨額資本逐漸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手中。實收資本額在五百萬元以上的大公司，在戰前佔公司總數的百分之〇·三七，佔總實收資本百分之三八·五

六，可見在公司總數上不到百分之〇·四的大公司，在資本方面却佔了將近百分之四十，這就說明在戰前即已達到相當高的集中程度，但至戰後不久佔公司總數百分之一·四，而佔有的資本則達到了資本總數的百分之五三·六的地步。最近在一九二八年，佔公司總數百分之一·七強的，却佔總實收資本百分之六五。資本的集中，同時也是工人的集中。一九二八年度僱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廠，只佔工廠總數的百分之一，却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四·六，即是集中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但是這還沒有把那些使用五人以下的礦山和工廠計算在內，集中程度之高可想而知。資本之積累，也不是單憑公司的實收資本所能完全看出它的真相的。實際上不過是由幾個巨大的資產階級，三井、三菱、住友等直接經營或間接支配着許多的公司工廠，三井系、三菱系的公司事實上操縱着公司總數百分之三十左右。

資本越來越集中於少數大資產階級手中，由他們壟斷，少數的金融大資產階級，支配着整個的國民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資產階級早就在某種特殊事情上，和地主勢力結合起來肆行反動。現在正在舊地主、官僚、半封建的勢力結合起來的共同政權上，掌握着領導權。在戰時和戰後，當日本資本主義像狂風暴雨一般發展起來時產生了政黨內閣，這也不是偶然的。日本資產階級，不限於衆議院和內閣，連那種最落後的半封建的殘酷的壓迫形態，像君主制、貴族院、樞密院等陳腐的殘忍的統治形態，也爲了一小撮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被利用作壓迫、鎮壓大眾的銳利武器。

資產階級尤其是對於他們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以根本推翻它們的統治的鬥爭來威脅着他們的無產階級——使用猛烈的壓迫武器。日本資產階級在這危機當中，更強行着最殘忍而刻薄的產業合理化。這種產業合理化，乍一看來似乎是符合於全體利益，事實上只有犧牲工人纔能行得通。他們所行的產業合理化，不外是把工人的勞動加強，把工人當作活機器，把工廠當作工人的棺材，從而強烈地進行剝削而已。工人因為強烈的勞動，弄得身心均極疲憊，而恢復勞動力所必需的工資，却絕對得不到，因而使工人活在工廠中而骨瘦如柴。不但這樣，產業合理化又把許多工人從工廠趕到十字街頭，造成了龐大的失業羣衆。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他們就變成再也不能作為工人而被僱用的固定失業者。

我們聽聽資本家對於產業合理化是怎樣一個說法吧。日本鋼管公司，造一噸鋼管所需要的職工人數，一九二〇年是十餘人；實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一九二四年減到七個人，一九二七年減到五個人，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減到四個人。這個公司的董事笠原某說道：「日本鋼管公司生產費降低的原因，第一是因為精神緊張，這對於增進能率是最有效的，職工全都關懷着公司的興廢，在工作上以前以為作不到的現在也能作到了。第二是職工的熟練。第三是設備的改良。所謂設備的改良，也不是要用許多錢，而是以前用三個職工的地方，現在用兩個半人就行了，我們是這樣來普遍地調整設備的。」這話正說出資本家所行的產業合理化第一是剝削的強化，第二也是剝削的強化。

其次，對農民怎樣呢？掌握着日本的權力的資產階級政府，在農村汲汲於擁護地主的利益。對於租佃爭議中的農民，不消說動不動就斷然鎮壓。農村裏有莫大的帝國主義的租稅，又有很多債務的束縛。例如農民所必不可缺的肥料，資產階級也以壟斷價格來剝削農民。光是三井、三菱就差不多完全獨佔了肥料，特別是人造肥料硫酸。資產階級在農村盡全力守衛地主的利益，相反的，對於佃戶和貧農這樣農民的大多數，却是壓迫、剝削，用鐵鎖鎖住他們。

日本的資產階級，對於一切工人和農民的運動，日益加以殘酷的鎮壓。警官隊時常武裝襲擊工人的罷工和農民的鬥爭，必要時還出動軍隊，明裏暗裏使用暴力圍；爲了殘酷地鎮壓農對於資本家、地主的鬥爭，頒佈各種法令（如各種勞資爭議調解法及農民調解法——這些都是以調解爲名的鎮壓法令），又頒佈治安維持法，我們現在就是根據這治安維持法被起訴的。治安維持法就是爲了把那些爲全體工人利益而徹底鬥爭的革命戰士，一個一個都送上斷頭台的目的而制定的。我們看這些法律怎樣壓迫和鎮壓工人和農民全體吧！犧牲在治安維持法下面的，已經達到了一千三百零七名；犧牲在其他法令之下的，例如犧牲在「暴力行爲取締法」之下的，或是犯騷擾罪、傷害罪的，從去年後半以來，僅部分地所判明的，就有三百一十一名之多。這些人的犧牲，使工農鬥爭和罷工及租佃爭議，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犧牲，削弱了工農鬥爭的力量。資產階級的報紙也這樣說：「若是沒有這些犧牲，那末工人和農民的鬥爭力量，必然更要強大。」

其次，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中國，進行極兇暴的軍事干涉。幾次出兵中國，大肆殺戮中國的工農和士兵，還經常不斷實行軍事侵略，和中國軍閥——中國勞苦大眾斷難容忍的、萬惡的、殘酷的軍閥——相勾結，經由最可恨的苟合以自肥。至於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殘酷地鎮壓和懲罰日本的殖民地朝鮮、台灣的革命起義，更不必在這裏多說了。

在這個時代，日本資產階級更是最狂熱地專心從事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成了軍備擴張競爭中的主角，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兇猛的帝國主義者像豺狼一樣進行着軍備的大擴張。雖然屢次開軍縮會議，實際上連軍縮的影子都沒有。只是用和平的宣傳來欺騙工農，猝然乘其不意就把他們送到戰場，作為資產階級貪慾的犧牲品來利用。日本的軍費，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以後，表面上像是減少了，實際上每年都在增加。單就陸海軍部預算的表面來看，是不能明白的。為了準備戰爭，在種種形式上增大以工農膏血積累起來的國庫的支出，乃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在倫敦會議上，日本說是要把五億元作為保留財源，實際上並沒有保留，而把這裏面三億七千四百萬圓這樣龐大的數目，用到海軍擴充計劃裏面去了。小資產階級的輿論，也曾羣起不平。資產階級對於和平縮軍的宣傳弄到汗流浹背，社會民主主義者立即跟在後面散佈着和平主義。但是這些事一點也不能否定日本時時刻刻在進行着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今天或明天任何導火綫也都可以使它爆發。難道不是一面談着和平，而一面却更熱烈地鼓吹着忠君愛國主義和排外主義嗎？這種愛國主義、排外主義的鼓吹，與和平主義的假宣傳遙相呼應，為了資產階級的

利益，把工農投入戰爭，這樣做不過是爲了在戰爭時使工農充當砲灰而已。在帝國主義互相矛盾的世界中，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對德國賠款和債務雖曾許其延期支付，而德國却早已根本陷入危機，大銀行停止支付，法國的軍隊集中到德國國境。這是世界戰爭現實的端緒。帝國主義戰爭到處一觸即發。只有日本共產黨敢對帝國主義戰爭展開鬥爭。日本共產黨就是在幼年時代，對於日本欺壓中國的現實戰爭，也曾用種種手段反對過。濟南事件●發生後，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發表共同聲明，以共同行動對出征軍隊進行宣傳；以後對於第三師團的出兵，也曾高呼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也宣傳過，工農爲了真能保衛自己的利益，除去防止戰爭、粉碎戰爭、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以外，沒有旁的方法，儘管在那時還是我們力量所達不到的。現在戰爭的危機日趨深刻。國際的反帝國主義日是八月一日。全世界的工人必須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對於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即是對於爲少數資本家利益而殺戮世界工農及殖民地人民的帝國主義戰爭，必須由大眾的示威運動來抗議、來反對、來把它粉碎。戰爭若一開始，無產階級必須打倒資產階級政府，把戰爭轉化爲國內戰爭。必須把共產黨這種主張，宣傳到全國工農大眾裏面去。

●「濟南」事件係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出兵佔領山東濟南，屠殺濟南人民的「濟南慘案」。——譯者

#### (四) 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

最後一件重要的事，即是資產階級在各方面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如果都由資產階級親身來作，這是很難辦通的事，所以必須找些助桀爲虐的可靠的朋友。現在一切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是在工人裏面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都是幫助着資產階級壓迫或統治工人和農民，並使它脫離危機者。沒有他們這些人的幫助，今日的資產階級就不能維持他們的統治。社會民主主義者是工人運動中的害羣之馬，他們背叛了工人的利益，他們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大衆的利益出賣給資產階級。如果沒有他們，資產階級終究是不能維持其統治的。爲什麼說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當了資產階級的支柱呢？從小的方面來說，只要看他們對於罷工的態度就知道了；就大的方面來說，只要看他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就知道了。

在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有曾經存在於工人的最堅強組織的共產黨裏面的，他們一到像今天這樣政治經濟危機迫切的時候，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便背叛共產黨而脫逃，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最右翼最露骨的君主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的社會法西斯的解黨派。他們在危機越迫切、階級鬥爭越激烈的時候，就越成爲資產階級非常可靠的、非常得力的幫手。他們全是君主主義者、忠君愛國主義者、排外

主義者以及「和平」主義者。同時他們又是資產階級實行戰爭的大幫手，沒有他們，現在的反動戰爭是不能進行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在世界大戰以前，以大言壯語高唱反對戰爭，到大戰爆發了以後，趕早就贊成戰爭預算而完全叛變了。沒有他們這些人的叛變，那樣的大殺戮戰，是進行不了的。就是在今日，資產階級也知道如果沒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援助，進行戰爭還是困難的。所以用一切方法去鍾愛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接受了這種鍾愛。最近所謂由大合併而成的全國勞農大眾黨<sup>●</sup>的綱領，用了個表面上彷彿是工農的朋友的名稱，而實際上却連反對帝國主義的片言隻語都沒有。反之，却有確立工農世界入國和居住之自由這樣的項目。而這不是爲了光輝的工農社會，想向着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蘇聯要求入國自由。前後仔細一讀，纔知道這是向美國要求自由入國。這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美戰爭政策的一部分，由他們巧妙地倡導着。全國勞農大眾黨徒，在演說會上也許要熱熱鬧鬧地喊叫一陣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他們在實際行動上，在鬥爭時，可就叛變了，他們反來妨害並破壞共產黨、革命的勞動組合和紅色組合等爲反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的組織，反而爲官廳服務，瘋狂地禁止工農大眾參加鬥爭。不論他們用什麼名義出現，社會民主主義者總是工農大眾可

● 全國勞農大眾黨，係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由全國大眾黨（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勞農黨、社民實現同盟合併而成。其政策第二項外交部分的第三款中，提出了「工農世界的入國居住之自由」。



憎的敵人，是資產階級的密友。他們又是蘇聯的敵人，這在這裏姑且不談。他們又明暗中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他們和那些反叛中國革命並殺戮了幾百萬中國工農的匪幫結爲盟友。社會民主主義者又支持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用鐵鏈來壓迫朝鮮、台灣等殖民地民族。「殖民地解放！」「殖民地獨立！」這種他們自己所會揭櫫的口號使人毛骨悚然；可是他們對於爲了這種口號而鬥爭的人們，却是非常勇敢地反對着。

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資本家的經營，尤其是對於「產業合理化」乃是最忠實的協力者。他們在產業民主主義這個大幌子之下，怎樣在忠實地爲資本家服務而成爲壓迫工人的代理機關，只要一看勞動總同盟和海員協同會的行動就明白了。日本資產階級政府鎮壓工農的革命運動，實行白色恐怖，他們都暗中熱心地支持着。他們也扮演這樣的角色，即是從組合裏把革命工人趕出去，工廠裏一有對挑戰的資本家作鬥爭的工人，他們就去向工廠主告密，向警察引渡，把這些工人關進監獄去。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是國際間最體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呀！日本現在像這樣地有國際性的人們另外就找不出了。

### (五) 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無產階級

日本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創立的。我黨不僅是日本的共產黨，而是作爲世界

無產階級的黨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而創立的。直到現在還始終是作爲第三國際的支部而存在和發展着；可是它與日本資本主義和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完全沒有關係嗎？當然不是那樣的，在它的根底上却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共產黨是日本無產階級的政黨，日本無產階級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先要在這裏簡單地講講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六十三年以前的明治維新，顯然是日本歷史上的變革，也是「國體的變革」。因爲有這種變革，日本資本主義纔像暴風雨一樣急劇地發展起來了。後藤象次郎、福岡孝悌等，在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年）上朝廷的奏摺裏，就用過「變革國體」或「國體的變革」「國體一新」的話。治安維持法裏也有「國體的變革」的字樣。可是有人硬說日本的國體是萬世一系不朽不變的，而明治維新的功臣們却說明治維新是「國體的變革」。明治維新的變革乃是日本生產——私有關係的變革，即是以由封建時代的生產關係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爲基礎的變革。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難道這是什麼天佑嗎？這是日本資產階級特別巧妙的緣故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之所以不亞於其他國家，是在於殘酷的犧牲工人這一點。日本資本家爲了盲目地追求利潤，只有使無產階級遭受慘重的犧牲，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第一，在明治初年就肆意奪取農民的土地，並藉徵收重稅——當時所激起的許多農民起義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或高利貸來進行對農民的掠奪和剝削。

第二，對於工人進行野蠻刻薄的剝削，諸如吃不飽的工資和極長的勞動時間。資本家還對於缺乏抵抗力的幼兒弱女等童工，進行野蠻的剝削。監獄不必說了，連紡紗工廠的宿舍，也簡直是人間地獄。因為有這樣殘酷的制度，日本資本主義纔能發展起來。由明治二十年到三十年的中間，神戶的火柴工廠，曾使用着五六歲的幼兒作火柴桿，當時物價就算便宜，而終日虐使着這樣的幼兒，却不過日給一二分錢。紡織的女工一天的工資是八分二三厘，男工也不過是一角七分，工資低廉到這樣的程度！到了明治四十年前後，紡紗男工日給四角，女工二角五分，工資低廉可想而知。勞動時間普通說是十二小時，實際上將近二十四小時，還有時候常常一連兩三天晝夜不停。紡織業是日本工業的台柱，紡織品是日本出口貿易的大宗，這種工業就是由於這樣殘忍刻薄纔發展起來的。

第三，爲了對勞動者強行這種刻薄的勞動條件，那末和它相適應的血腥的法律和兇暴無比的警察，對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是絕對必要的。剝削越兇暴殘酷，法律和警察的鎮壓也就越兇暴殘酷。關於這一點，只要把日本內地和朝鮮加以比較就明白了。日本對於朝鮮民衆的掠奪和鎮壓，比對於日本內地的工人要更爲殘暴得多。朝鮮殖民地的血腥的法律和兇暴的警察，更是日本內地所見不到的。朝鮮的法律裏，聽說居然有笞刑。日本資產階級以國軍的稱號，將工農大眾供戰鬥之犧牲，略取殖民地，並徹底掠奪和壓迫殖民地民衆。這在朝鮮、台灣和表面上另有說法而實際上是日本的殖民地的滿洲，都是明確的事實。實際上日本資本主義只靠着這種手段才急速成長起來而達到和歐美資本主

義相抗衡的地步。

隨着這樣的成長，日本資產階級和半封建的貴族地主勢力，結成了反動集團。兇暴的官僚政府，就是這種結合的體現。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制就的關於日本的綱領上說：「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革命打開資產階級在日本發展的道路，但政權仍留在封建的諸要素的手中，留在軍閥和宮廷閥的手中。在那場合，日本國家的封建的特質已經不單是傳統的殘餘和舊時代的遺物了。它又成爲資本主義便於原始蓄積的工具，日本資本主義在它以後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曾巧妙地利用着它。」又說：「舊日本國家向資產階級國家的質變，是沿着兩個方向進行的。即一方面，產業、商業、金融資產階級的比重和政治的意義不斷地增大，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諸原因以及對於工農運動的恐怖，而又由於帝國主義政策的要求，以致封建的諸階層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融合極其急速地進行了。」情形正是這樣的。

日本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期間，完成了飛躍的發展。這就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一方面是由於日本資本家強奪海外市場，和大正五年大隈內閣（加藤外交大臣）時期對中國強迫提出強盜式的二十一條，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國內極度驅使着工人進行超速度的大量生產、強化剝削來發展的，在大戰期間趁火打劫，遂一舉而飛躍發展起來了。以三井、三菱爲首的大資產階級，吮足了日本工農及朝鮮、台灣、中國大衆的鮮血，就腦滿腸肥起來了。現在日本資產階級，已經凌駕了明治時代舊地主勢力，成爲日本的主

人翁。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關於日本的綱領上也說：「近代日本乃是資本家和大地主結成的同盟——而其盟主却是前者即資本家——所統治。」又說：「現代的日本國家，雖有它的一切封建的特質和殘餘，却正是日本資本主義最集中的表現……」這件事說明日本一點也不是進步了，反而是用更反動的鐵鎖，鎖住了全日本。

如上所述，日本資本主義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日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在明治年間，年輕的日本無產階級，就已經參加了反對藩閥政府、反對專制政府的自由主義的羣衆鬥爭，當時暗中領導這種大衆鬥爭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實際活動的戰士，乃是工人。當日本羣衆對於日俄戰爭那樣大的犧牲大爲不平的時候，資產階級便提出反對樸資茅斯條約的口號，轉移了工人的不平。因而惹起了大衆的蜂起，發生過放火燒房的事件，在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政黨那班人一面盡量地利用着無產階級，一面又立刻和藩閥政府妥協苟合而把無產階級拋在路旁。這種例子很多，不遑枚舉。最後發生的就是普選運動，這是資產階級出賣無產階級行爲中最醜惡的一樁。當其以普選爲中心，動員羣衆參加民主運動時，尾崎行雄等人一馬當先，可是他們只當了片刻的先鋒，忽然又把工人交到警察手裏，或投入監獄，和藩閥政府進行了自私的妥協。

● 一九〇六年九月召開的反對樸資茅斯條約的國民大會羣情激昂，曾宣佈戒嚴令。

由明治到大正，日本無產階級在這個期間積有向政治鬥爭前進的過渡經驗。日本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一樣，雖然受了欺騙，還是時常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無產階級稍稍一反抗資本家，稍稍一主張自己的利益，資本家馬上就借用半封建的國家機關力量進行強壓，他們宣告新興工人運動、勞動組合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一切都不合法，並加以無理的摧殘。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第二年就禁止了最早的社會民主黨。以後，趁着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幸德事件」<sup>●</sup>的機會，就對社會主義者進行迫害。日本無產階級在這樣情況下，會進行鬥爭。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無產階級還很幼稚，差不多說不上有國際主義。可是帝俄時代發生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於一九〇四年在海牙召開的萬國社會黨大會上，日本社會黨的鬥士片山潛（現在在共產國際佔着光榮的領導地位的片山潛），和日本資產階級的敵國帝俄社會民主工黨的普列漢諾夫（現在是叛變的頭子），緊緊地握過手<sup>●</sup>。在日本無產階級的幼稚時代，一個先覺者和日本資產階級敵國社會主義者握手，是日本無產階級光榮的回憶。

我們再來看一看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搗毀米店的風潮吧。這風潮是在「討伐奸

- 「幸德事件」，是日本資產階級政府爲了絞殺一切進步運動，於一九一〇年以「計劃暗殺天皇」的罪名，捕殺幸德秋水等無政府主義者的事件，也就是日本警察所製造的所謂「大逆事件」。——譯者
- 片山潛和普列漢諾夫會見於一九〇四年八月十四日，普列漢諾夫當時已經是孟什維克了。

商」這一個口號之下，由小資產階級來領導的，可是這次風潮的本質，不外是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不外是世界大戰中極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矛盾的最初的爆發。我們在這裏不說這個搗毀米店的風潮怎樣被用野蠻方法給殘酷地鎮壓了，這裏應該注意的是：當時無產階級並沒有自己所組織的領導者，但却能挺身而起，站在羣衆前面到處戰鬥。站在襲擊米店風潮的前列而英勇地鬥爭的中心力量乃是工人。這次襲擊米店的風潮，爲什麼遭到那樣的慘敗呢？這首先是因爲沒有由大衆起義的中心所組織的強大領導機關，即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可見得像這樣的大衆蜂起，如果沒有共產黨，那一定會遭到慘敗。

日本無產階級還有一件最值得記憶的事，就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的朝鮮起義，即以「萬歲事件」著稱的朝鮮爭取獨立的起義。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受着不堪忍受的壓迫的朝鮮民族，不得已在日本帝國主義兇惡的軍隊之前起義了。日本帝國主義怎樣加以殘酷的鎮壓，更不必說了。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未能積極援助朝鮮民族的起義，這是日本無產階級對於朝鮮民族的一種恥辱。但是現在日本無產階級長成了，它已是朝鮮、台灣殖民地民衆和中國工農大衆最好而最可信任的忠實的革命盟友了。

## （六）黨成立前夕的時代

下面就要講日本共產黨成立前不久的階段了。我想首先簡單地講講社會主義同盟的

時代。

工人人數的增多，大工廠的集中，這便是日本共產黨成立的客觀條件，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經驗和國際經驗，便是它成立的主觀條件。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的發展，當然使日本無產階級要求有一個領導階級鬥爭的組織，要求成立他們自己的政黨。

日本工人的階級鬥爭，尤其是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在布爾什維克的口號之下而從事革命的鬥爭，使日本資產階級害了怕，才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頒佈了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sup>●</sup>，這是最初的鎮壓法令。當時日本無產階級和已經日趨成長的共產主義者，站在大眾的前面，作為他們的領導者，反對過這個法案。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舉行了大示威運動，因而粉碎了這個法案。不但粉碎了這個法案，當時在誕生不久而且還很幼弱的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大眾示威運動，還粉碎了和這個法案並稱為三大惡法案的勞動組合法案及租佃爭議調整法案。

勞動組合運動在這一時期也進展得很快，當時有「安那」和「布爾」（即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譯者）的話，像那樣在工人運動的陣營內，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發展，政治鬥爭也有了顯著的進步。於是便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組織了社會主義同盟。這

● 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乃「由於紊亂朝綱，並企圖用違法手段來改革社會根本組織者有取締的必要。」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八日由貴族院提出，經過修正後主要内容被刪除，並於三月二十四日經該院通過，但審議尚未終結。翌年即一九二三年曾經企圖再行提出，但因無產團體反對而被打消。



是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其他革命團體、社會主義團體的統一戰綫，從根本上講，它並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也沒有那種性質。但是已經有了階級鬥爭經驗的社會主義工人，有了自覺的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工人，看到這個社會主義同盟之中，有了自己無產階級鬥爭的組織，都歡呼着這個社會主義同盟的成立，並有許多人參加到裏面去了。現在逮捕了來的在日本共產黨內活動的領導者，以及出席這個法庭的工人同志之中，有好多是參加過這個社會主義同盟的。

社會主義同盟受到先進工人熱烈的歡呼，因而使改良派組合主義者棚橋小虎、麻生久（就是今天叫作什麼勞農大眾黨委員長的麻生久），對於工人之要求政治組織害了怕，起來作破壞工作，向工人提出「回到勞動組合去」的口號，反對工人參加政治的階級鬥爭，想把他們拉回勞動組合去。當時資產階級的政府，幾個月就把社會主義同盟解散了。日本工人在世界大戰以後，總之是一度有過社會主義同盟的（以前明治時代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暫且不提）。社會主義同盟是一個試金石。有了這個試金石，日本先進工人、有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工人，痛切地體驗到無黨狀態即僅僅作為思想團體或其聯合體而存在的無黨社會主義何等軟弱無能。結果使人覺得像社會主義同盟這樣思想團

● 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友愛會機關報上發表了棚橋小虎（今仍在世）所作「回到勞動組合去吧」一篇文章。

體或其聯合體的社會主義同盟，不但無益，而且是運動發展的障礙。大家都感覺到爲了對抗自一九二〇年經濟恐慌期及其後反動期間資本家對待工人的強制的態度，爲了在日常經濟鬥爭中得到勝利，像從來那樣乃是不夠的。他們更知道，若想把分散的家長式的改良的勞動組合運動，更加集中化、大衆化、革命化，用以前的方法，將一事無成。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或無政府工團主義，妨礙日本無產階級階級的政治的發展。單是爲了掃清這些障礙，現在都感覺到絕對應該有個新的强有力的領導中心。這即是日本工人爲什麼要求有日本共產黨，並爲了使它成立而成爲基本動力的理由。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尤其是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一種不可比擬的偉大事業；它激勵了日本共產黨之成立，並促進了它的發展。對於俄國革命，日本資產階級却勾結世界資產階級一同來包圍年輕的蘇維埃俄國，進行反革命的攻擊，又用報紙、雜誌、學校以及其他一切手段，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極盡惡毒宣傳之能事。雖然這樣，日本無產階級認識到只有這個俄國革命才是和他們本身血肉相連的，只有由俄國革命建立起來的工農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是工人的祖國，從而對它表示階級的同情和好感。這就是日本無產階級非常憎惡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對蘇維埃俄國進行反革命的干涉及出兵西伯利亞的根源，這就是日本無產階級對日本資產階級反革命行動作鬥爭的根源。勝利的俄國無產階級，是日本無產階級的弟兄；日本工人受到俄國工人的教導和鼓舞，由他們的本能，進一步知道他們是應該受尊敬的階級弟兄。這也是由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得到的教訓。

這時候我們有不可忘記的一樁事：當時日本工人，不單是對俄國革命表示隔海的同情和共鳴，還有先進自覺的工人和進步革命家，渡海到西伯利亞，獻身幫助俄國革命，向日本資產階級侵略的軍隊勇敢地進行宣傳。他們說：不要破壞俄國的革命，這是我們兄弟之國，不要把槍口向着工人之天下的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俄國的工農。我們的同志和可敬的先覺工人，冒着非常困難，到西伯利亞，更到歐俄，獻身幫助俄國革命，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鬥爭。佐藤同志<sup>●</sup>爲了擁護俄國革命，親往西伯利亞，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進行英勇的鬥爭，生命之花遂隕落在西伯利亞了。俄國革命實際上是日本進步工人自己的事。布爾什維克——當時被叫做過激派，被當作如鬼如狼一般，在資本家看來或許是可怕的過激派，可是對於工人來說却正是他們的朋友和領導者——只有世界最優秀的革命導師列寧所領導的具有鋼鐵意志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才是工人真正的先鋒，是勞苦大眾最信任的朋友。這已由日本工人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這種理解。

日本共產黨的成立時機，從各方面來看，已經醞釀成熟了。再加上第三國際領導者的力量，於是共產國際日本支部的日本共產黨便成立了。日本共產黨雖然是受了國際間

● 佐藤三千夫同志原籍宮城縣登米郡。一九二二年六月以來參加濱海省游擊隊，對白俄軍、帝國主義

日本軍抗戰。曾力疾奮鬥，惜於同年十二月四日在哈巴洛夫斯克陸軍醫院病故。當時年二十四歲。

的影響，作為世界黨的一部分而成立的，但是它決不是外國委派的司令部，它的基礎乃是日本無產階級及其鬥爭之發展。

### (七) 黨成立之具體情形

以上講過了黨成立的基礎，以下我打算說明日本共產黨成立的直接的具體情況。首先必須強調的，即是日本工人階級組織日本共產黨，是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得到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和援助的。共產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和第二國際不同，它對於東方一開始就非常注意。東方有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將是從帝國主義壓迫下求解放的民族革命運動最大的舞臺，因此共產國際非常注意。日本位居東方之一隅，是殖民地革命運動舞臺的東方的反動、反革命的台柱，它壓迫中國、朝鮮、台灣，又担任着從東方進攻蘇維埃俄國的角色。東方的情況既是這樣，共產國際與以非常的注意乃是當然的。

共產國際注意東方問題，遂於一九二一年在它的倡導之下召開了遠東民族大會<sup>①</sup>。

① 遠東民族大會正確地說，乃是遠東共產主義的革命團體第一屆大會。詳見德田球一著：「革命的回憶」。

一九二二年末在伊爾庫茨克召開預備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二月，在莫斯科開了遠東民族大會。這個大會以組成遠東共產主義運動和支持民族革命運動爲主要目的。

參加這個大會的，有得到勝利的蘇維埃俄國的無產階級，有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代表，有打算脫離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朝鮮民族革命運動的代表，有蒙古獨立運動的代表，此外還有許多國家民族運動的代表和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代表。這些人裏面，雖然有共產主義者，有社會主義革命團體的代表，有民族革命團體代表等種種差別，但都是革命的代表，都是帝國主義的英勇的敵手。在這次大會上，決定日本工人必須和中國、朝鮮的共產黨組織運動步調一致，趕緊組成日本共產黨。

日本代表把遠東民族大會的成就帶回國來，開始進行日本共產黨組織運動。共產國際非常注意遠東問題，在它號召之下，既召開了遠東民族大會，又用一切方法來領導日本革命的工人。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在震災時候被殺的大杉榮<sup>●</sup>和對於有革命性的人，都積極地誘導，並努力進行說服工作；對他們說明：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是怎樣的錯誤，那只是對於無產階級的解放的革命空言，它不談政權問題，不會得到預期的勝利，而且會要失敗。

如上所述，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們，用一切方法，傾全力來促進日本無產階級的成

長，他們認爲要想使階級鬥爭勝利，就非有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組織不可，於是幫助日本無產階級組織作爲它的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和司令部的日本共產黨。

但是日本先覺工人，並不單是等待着共產國際強大有力的扶持，他們也積極地用自己的力量來推動黨的成立。舉一個例來說吧，爲了成立日本共產黨，他們會和其他各國共產黨中日本人支部取得接觸和聯絡。像上述對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干涉蘇維埃俄國而進行鬥爭的佐藤同志那樣的先進，就是日本共產黨的最初柱石之一。日本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就是這樣和共產國際的領導結合在一起，爲黨的建立而努力的。

上面說過了，日本共產黨並不是由共產國際從外面輸入，也不是由共產國際從上層強制所組成，不消說，也不是機械地服從共產國際。關於這一點，由下面黨成立之具體條件，就可以證明。下面就講黨成立中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

### (八) 黨成立中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

經過共產國際領導者和日本當時的共產主義領導者的會議，遂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組織了日本共產黨，同年十一月，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四屆世界大會，報告黨的成立。在這次大會上，纔正式承認日本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日本共產黨雖然是第四屆世界大會以前在日本成立的，可是共產國際早已經有了成立的宣言，一九二〇年第二

屆世界大會●也有決議的規約，也審理並通過了種種綱領，即黨的指導原理。這個規約第一條上說：「承認這個規約，積極地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作為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而積極活動。」我們根據這個規約成立了黨，又得到了第四屆世界大會的承認。對於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上通過的共產國際規約及二十一條加盟條件以及其他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原理等，日本共產黨既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是承認並把它當作根本原理的。共產國際規約的前段，說明着共產國際的目的，這同時也是日本共產黨的目的。現在只擇幾個最重要的地方講一講。

「共產國際的目的是：以一切手段，以武器，為打倒國際資產階級，和建設作為消滅國家的過渡階段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而戰鬥。」

接着說明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即是：

「共產國際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可能從資本主義暴政之下解放人類的唯一手段；共產國際還認為只有蘇維埃政府才是歷史賦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

這個共產國際的根本綱領，也可以說是共產國際的目的，它的要點就是現在的共產國際也一點沒有改變過。這只要看第六屆世界大會訂立的共產國際綱領就會明白的。共產國際一開始就有着一貫而明確的目的，向大眾公佈，並始終為建立世界無產階級專政

而鬥爭。所以這個同一目的根本綱領，日本共產黨從最初成立就有，乃是當然的事。

日本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在共產國際規約裏規定如下：

「共產國際認識到，爲了廢除資本主義和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工人團體，必須有嚴格地集中的組織。共產國際又必須真正是世界統一的共產黨。在各個國家從事活動的共產黨，僅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作爲集中的、統一的全世界黨——國際共產黨——之不可分的一個構成要素的日本共產黨組織成功以後，加盟於共產國際。這就是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組織關係的根幹。至於詳細的地方，還有第二屆大會規定的條款，在這裏面規定着各國支部與共產國際本部的關係，但是這些就不在這裏講了。

共產國際二十一條加盟條件，是列寧親自起草的，所以特別嚴格，這是無產階級歷史的文獻。現在不能把每個條文都講，僅把想要強調的條文說一下：

「在整個歐洲與美洲今天的情況之下，共產主義不能信賴資產階級的合法性，所以共產主義者爲了在決定的時期完成對革命的義務，應該除公開的組織以外，同時成立秘密的共產主義組織。」

當時，正是世界大戰後世界革命危機一觸即發的時代，整個歐洲與美洲的一般情況，迫切要求共產黨直接領導革命，要求共產黨擔負起動員大眾走向革命的任務。所以爲了和敵人權力徹底鬥爭，遂強調秘密組織的絕對重要性，而且這也絕不是一時的，



在第二屆世界大會關於政治情況的綱領中，也強調着這一點。第六屆世界大會的時候，也可以說是革命新高潮的時候，可是共產國際絕不是那樣愚蠢，它絕不會受世界資產階級法律的拘束，它絕不會僅在它法律範圍以內來從事活動。共產黨爲了徹底和統治階級鬥爭，爲了根本破壞資產階級一切權力而鬥爭，一定要有強固的、秘密的、地下建築、秘密的組織。這是一個始終不變的原則。

日本共產黨成立的時代，日本一般政治情況與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大抵相同，不允許共產黨公開存在。所以無產階級的力量總的來說是微弱的，資產階級反動的權力是強大的。但這並不是指資產階級所謂政治的自由逐漸擴大、逐漸積累，從而日本共產黨也將逐漸成爲公開，並在沒有達到這種地步的時候，先有一時秘密的存在。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這種意義。日本共產黨一點也不能放鬆和敵人鬥爭，這樣纔能使資產階級壓迫共產黨的法律在那階段中歸於無效。共產黨必須從這種鬥爭中成長起來，而事實上也是這樣成長着，共產黨在政權的爭奪戰和階級鬥爭中，直接和資產階級對壘，直到最後資產階級權力徹底傾覆爲止，即是作爲一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樹立無產階級專政爲止，不論在任何意義之下，都必須有秘密的組織。這在日本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就已經是十分明確的。

關於黨成立的情況，還想有一點補充的地方。即是在黨成立的事情裏表現的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共產國際爲了使日本工人階級組成他們

的先鋒隊共產黨，曾用一切的手段努力鼓勵他們；同時日本革命工人也要求共產國際的領導，爲了組成日本無產階級的黨而熱心活動。共產國際的領導的鼓勵和日本工人熱心的活動結合在一起，組織成了日本共產黨。但是敵人正在無恥地宣傳，說日本共產黨完全是共產國際機械的傀儡，又說共產國際以金錢和綱領來支配日本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成立時共產國際和黨的關係，極其簡單。即是日本共產主義者承認了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中所通過的共產國際規約及二十一條加盟條件，在這承認之上建立了日本共產黨，並正式得到共產國際第四屆大會的承認。這就是說，日本無產階級把國際無產階級總集結的共產國際，當作自己的根源和戰鬥組織，而把自己作爲共產國際的構成部分。這決不是像資產階級所宣傳的那樣，說什麼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是個別的存在，說日本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指使而機械地服從它的指揮，說日本共產黨的加盟毫不成體統。這證明日本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世界黨共產國際不可分的要素。這樣真正組織上的國際主義，資產階級到底是不能理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跟在資產階級後面，對於共產黨散佈種種謠言。

建黨的意義，簡言之，可以說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在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第一，日本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世界黨的一個支部。由於日本共產黨的建立，而日本無產階級和國際無產階級堅固地結合在一起了。

第二，日本共產黨不是任何職業的和宗派的集團，相反的，我們是克服職業的宗派的集團思想，為整個無產階級而鬥爭，作為代表無產階級整體利益的政黨而成立的。

第三，日本共產黨反對一切改良主義和議會主義的幻想，使無產階級自覺地向着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路上前進。

最後，前面也稍稍說過一些，日本共產黨是日本資產階級法律所不能束縛的秘密的黨，是資產階級所不能解散的黨。日本無產階級開始有了這樣的黨。從這一點來說，它和從來任何社會主義的工人團體，是截然不同的。

## 二 從黨的成立到所謂解黨的決議

以下把日本共產黨重要發展的階段加以區分，選擇重要的時期來講一講，所以只能是簡單的敘述，不能逐年逐月詳細地分開來講。此外關於日本共產黨對於勞動組合運動的政策和領導，對於農民運動的黨的政策及其活動，以及共產主義青年運動中黨的輔導和幫助，這些在黨的政策及活動中是最重要的，在講黨史的時候應該把這些事情詳細敘述。這讓其他同志來說，我就不講了。

從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到「四·一六」事件的歷史，在黨的生活史上最重要的劃期的分界綫，就是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發表了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即所謂一九二七年的綱領。在這前後，日本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的影響上，組織發展的速度上和對於大眾公開的結合上，乃至黨在地下活動與在大眾面前公然揭發黨的政綱的活動上，以及對於共產國際聯系的程度上，都表現了明顯的不同。

一九二七年再組織以前的時代，仍然可以分爲若干小階段。

## (一) 所謂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及其鬥爭

首先講稱爲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時代，即是從一九二二年七月日本共產黨成立，經過第二年的稱爲六月檢舉的第一次檢舉共產黨和九月大震災時期的反動，到日本共產黨一時因機會主義的領導而使組織解體的時候，即所謂解黨的時候，我想把它當作第一個階段來講。

稱爲第一次日本共產黨時代的情況，簡單扼要地說：就國際方面來看，戰後革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歐洲中心的革命的低氣壓，仍然深深地迴旋繚繞。這一年的秋天，有過已經失敗的德國革命。在國內方面，自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恐慌以來，接連陷於沉滯狀態之中，資本對勞動展開攻勢。工人運動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是一個頂點，農民運動大體也以這一年爲一小頂點，罷工<sup>●</sup>也好，農民爭議也好，從這個時候起都有若干的減退和停滯。但是由於工農對資本攻勢之拼命的抗爭，階級鬥爭一天天地深刻化了。工人的鬥爭組織，以前是職業別的、手工業的、分散的，而現在他們進而

● 罷工次數據政府統計爲一九一九年四九七次，參加人員爲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七人，次數與人數均達到大正年間的高峯。

要求產業別的、集中的和統一的鬥爭組織。在思想方面表現為共產主義對無政府主義壓倒的勝利，在組織方面表現為勞動組合運動中集中的統一主義對於自由聯合主義的勝利。此外更表現為有階級意識的工人，暗中都要求階級政黨——共產黨——之急速長成。同時幾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反動工具，即當時的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等資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浪潮，也曾使工人受到影響，把改良主義的頭子們俘虜了，誘往議會主義方面去了。

日本共產黨產生於這種情況之下，第一個重要任務，乃是對工人之間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舊工團主義的思想以及新興議會主義的思想等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鬥爭，並加以克服。換言之，就是把工人領到階級的政治的鬥爭方面去。黨的第二個重要任務是因為不論在黨的本身或是在勞動組合運動之中，當時都有前一時代支離破碎的宗派組織的殘餘，所以要肅清這種殘餘，就得把工人編練成一個有集中組織的、有嚴格紀律的階級隊伍。

在這些任務之下進行了鬥爭的當時的黨，由於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和强有力的說服及勸告等一切援助，首先以「走向大眾」的口號來面臨戰鬥。這個「走向大眾」的口號，原是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屆世界大會所採用的國際口號，當時日本共產黨必須採用這個口號，不僅從國際方面來看非如此不可，而從黨的本身來看，當時的黨不過是少數人的集體，在大眾中間是孤立的，所以這個口號是絕對必要的、最重要的口號。

當時黨第二個重要的口號，是「走向政治鬥爭」。因為有「走向大眾」「走向政治鬥爭」這兩個重要的口號，使所謂第一次共產黨由黨的成立開始，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已有走向大眾化的任務。但是當時在黨裏面還未曾脫掉幼稚的小資產階級的軀殼的思想，以往小資產階級手工業派別組織的殘餘，妨害了這個共產黨走向大眾化和積極走向階級的政治鬥爭。爲了把這兩個偉大口號宣傳於大眾之間，日本共產黨以黨的決議，使當時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山川均起草了一篇宣傳文字，那就是「一九二二年夏天在黨的機關雜誌「前衛」上發表的那篇有名的「方向轉換論」。這個「方向轉換論」是日本共產黨決議的宣傳文字，它的用意，乃是實現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所擬定的正確的口號「走向大眾」「走向政治鬥爭」。可是「方向轉換論」的內容，現在已經證明，顯然是歪曲了本來的精神。這雖然不是當時的領導者山川均故意的歪曲，却不外是山川均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尤其是工團主義的濃厚的殘滓之一種表現。雖然這樣，但是因爲有了「方向轉換論」的宣傳，有了其他文件的宣傳，有了黨員的種種集會及勞動組合內實際鬥爭中黨員的有組織的工作等等，日本無產階級就急速走向政治鬥爭的方向，走向共產主義旗幟下的政治鬥爭方向了。當時日本共產黨有這樣重要的中心任務，而最具體地集中地把它表現出來的乃是黨的綱領。

當時日本共產黨的目的及其根本綱領，不消說不外是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所採用的規約和其他綱領，但是日本共產黨更考慮到，作爲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也應該有適應

日本特殊情況的一國之黨的綱領，並爲訂立這個綱領而活動。共產國際在第二屆大會以後，也要求各國共產黨支部，制定他們自己的綱領。

日本共產黨的綱領，當時並未完成。當時在共產國際領導同志直接參加之下，僅制定了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共產國際指令日本共產黨審議並決定這個草案。黨於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召開了臨時大會，審議這個綱領並審議所謂無產政黨組織問題。這個綱領草案在大會上並未審議完畢，留待大會以後由黨內各機關審議決定。但不久遇到六月檢舉，以後又有九月震災，又有反動時代的混亂，接着又是解黨，結果終於是黨的綱領的草案而已。因此這個始終是黨的綱領的草案，決未超過這個限度。但是這個綱領草案，把當時黨的重要任務說得很清楚。當時日本共產黨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的情形是應該記住的，我想簡單地講講。

這個綱領草案，首先分析了當時日本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般情況，也稍稍談到日本政權的構成問題，更強調過日本無產階級必須站在前面來和當時日本政治上半封建的代表天皇制作鬥爭，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領導。從而在行動綱領中，提出了廢除君主制，更不用說，提出了廢除貴族院、樞密院，也提出了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當時在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要求普選的運動，形成了大眾運動，不僅小資產階級，勞動大眾也必然捲入漩渦，所以在共產國際領導者直接參加之下制定的綱領草案上，顯明地記載着黨應該積極參加普選運動，和資產階級一切議會主義的幻想來鬥爭，而把它變爲革命的



議會主義。關於農民問題，雖然沒有更詳細的規定，但是已經提出了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由這一點可以想到其他的一切了。現在僅把這個綱領草案的要點摘出來，就知道當時日本共產黨來討論和審查這個綱領草案，是很有意義的。當時日本共產黨領導部裏

● 日本共產黨一九二二年綱領草案中行動綱領如下：

(一) 政治領域的要求：一、廢除君主制；二、廢除貴族院；三、十八歲以上男女均有選舉權；四、工人結社完全自由（勞動組合、工人政黨、俱樂部及其他勞動階級組織）；五、工人出版自由；六、工人室內室外集會自由；七、示威運動之自由；八、同盟罷工之權利；九、廢除現在的軍隊、警察、憲兵和秘密警察；十、武裝工人；

(二) 經濟領域的要求：一、工人八小時工作制；二、失業保險及其他勞動社會保險；三、根據市場制定工資額、制定最低工資；四、由工廠委員會管理生產；五、僱主及國家承認勞動組合；

(三) 農業領域的要求：一、天皇、大地主、寺院之土地無代價沒收並歸為國有；二、為支持貧農設立國庫土地資金，特別是佃戶從來以自己農具耕種之一切土地，都要給予農民；三、實行累進所得稅；四、實行奢侈特別捐；

(四) 國際關係領域的要求：一、停止一切對外干涉；二、由朝鮮、中國、台灣及庫頁島撤退軍隊；三、承認蘇聯；

● 普選運動是要求無財產的限制、凡成年男子皆有選舉權的運動，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一八年開始的。憲政會（當時的總裁係加藤高明）就是後來的民政黨。政友會的總裁係高橋是清。革新俱樂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三月，犬養毅、尾崎行雄等為其首領。上述諸政黨所謂護憲三派內關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實行改正了選舉法，容納了普選的要求。

面舊的小資產階級領導者，迴避這些重要任務；對君主制的鬥爭，積極參加普選和向資產階級民主之限制和欺騙作鬥爭，直接投入這種大眾鬥爭之中為實現資產階級民主而進行實際鬥爭。迴避這樣一些重大的任務，當然對於以後黨的發展是很有妨礙。

以上大體把當時黨的政治任務，略略說過了。

關於當時黨的組織情況，我想講些原則。日本共產黨雖是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而組成的，但是想要一下子就肅清以前的宗派集團組織的殘餘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殘餘很多。在各種思想團體及勞動組合方面，也有不是由於職業別而是由於思想的分歧而存在着若干小的團體。因此，黨不但不是以工廠為基礎而來組織的，就連一般工農的勢力都很微弱。當時黨的基礎組織，雖然叫作細胞（支部——譯者），可是這不是經營細胞，乃是沿着居住的區域、大眾團體及黨外大眾運動工作領域，而一點一滴地組織起來的小團體，根本上不過是繼承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而已。這即是說並沒有組織在以工廠為基礎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基礎之上——這和光榮的俄國無產階級經驗集積的工廠細胞、經營細胞的組織，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就成了當時黨的組織上最大的弱點。這樣的組織，必然使黨內存在着種種宗派的傾向，並且這種傾向還要再重複下去，這種組織若不徹底布爾什維克化，黨的政治成長和發展，都是非常受着限制和壓制的。

當時「前衛」●是黨的機關雜誌。這個雜誌雖然是黨的宣傳機關雜誌，但決不能稱之為中央機關報。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即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是爲了取

得黨員和黨外革命工農大眾對於黨的信任所絕對不可缺的，但這種機關報是在黨再組織以後，纔根據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的決議而創設的。在這以前雖然也有各種機關報，但決不是有像今天所說的這樣重要作用的機關報，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我在這裏附帶說明這一點。當時的黨除了機關雜誌「前衛」以外，在勞動組合運動方面的宣傳機關報，最初還有「勞動新聞」，以後還有「勞動組合」這一類的小雜誌型的機關報。「勞動組合」出了不過四五期到震災的時候就停刊了。在農民運動方面，有名叫「農民運動」的機關報，這個機關報是被當作農民之間的一個宣傳鼓動機關來使用的。

當時日本共產黨重要的鬥爭活動，在國際方面首先有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干涉蘇維埃俄國的運動，即是對俄不干涉運動。

前面已經說過，世界資產階級是如何害怕俄國革命，如何爲了拼命地要毀滅掉它而聯合向它進攻。可是世界資產階級對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即是推翻帝俄的第一次革

●「前衛」是一九二二年一月發刊的。因關東大震災而停刊。改名爲「赤旗」、「階級戰」後仍一面抵抗壓迫，一面繼續發行月刊。這裏所說的山川均的論文係指七、八月號所載「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變」而言。

●對俄不干涉同盟，——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三日在東京神田青年會舉行了成立大會。它的三個口號是：（一）駐紮俄國的日本兵無條件地立即撤退。（二）開始對俄的通商貿易。（三）對俄國飢饉贈與救濟金及物品。這是響應英國勞工組合評議會等所發起的、因被資本主義諸國封鎖而發生的蘇俄（今日的蘇聯）大飢饉的救援運動的。

命，倒是比較平心靜氣的。還不僅是平心靜氣，據說某帝國主義者，甚至還幫着打倒帝俄和顛覆沙皇。至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只要一看當時資產階級輿論和報紙就能明白，他們對於第一次革命，即對帝俄之顛覆，和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參加的克倫斯基政府即臨時革命政府，並未怎樣去攻擊。不但未加以攻擊，我們還可以斷然說他們是很感興趣的。但是一旦發生了十月革命，一旦發生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剛剛成功，立刻就震駭了全世界資產階級，他們便拚命地攻擊，而這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早就向西伯利亞出兵了。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寺內內閣發表出兵宣言，說日本爲了幫助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東漸——即幫助它東進侵略西伯利亞，爲了維持沿海州、即遠東西伯利亞的秩序——適合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秩序，斷然出兵，並且宣言，如於事有利還要增兵。自此以後，直到一九二二年，五年之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西伯利亞的原野，駐紮了七萬三千兵士，戰死者和傷病死者算起來有三千五百人，花費了十億元龐大的軍費。這是由於日本資產階級侵略西伯利亞，爲了發動反對俄國革命的反革命戰爭，使工農大眾所遭受的犧牲。由於蘇維埃工人英勇的防禦，即由於防禦自己新建的祖國的自我犧牲的英勇防衛，遂使日本軍隊對西伯利亞的侵略以失敗而結束。日本資產階級一向誇耀日本軍隊怎樣「忠勇義烈」，盲目地認爲它是百戰百勝的日本帝國軍隊，到現在還認爲是這樣。可是當出兵西伯利亞，却完全失敗了。在所謂「尼港事件」的時候，即是惹起大糾紛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時（發生於一九二〇年三月

十三日——譯者)，俄國工人在遠東還沒有充分有組織的紅軍，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狂暴的侵略，乃組織游擊隊來抵抗日本軍隊。日本帝國主義者指使日本無辜人民，在尼港向俄國無產階級挑戰，反而大加煽動地說，游擊隊挑起了尼港事件，殺了許多無辜的日本人。西伯利亞的出兵終於打了敗仗。日本資產階級本想成功之後喫一杯香羹，現在看到打了敗仗，就開始大肆攻擊軍閥，實際是日本資產階級啣自己的失敗而已。

日本共產黨當然反對侵略西伯利亞的反革命行爲，也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由大連會議、長春會議來向蘇維埃工人強取賠款而鬥爭。更在一九二二年夏天，由於日本共產黨員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成立了對俄不干涉同志會。這個對俄不干涉同志會羅致了數十個無產者的思想團體和勞動組合，係日本無產階級爲着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西伯利亞的鬥爭而組織的團體。日本共產黨在對俄不干涉的大衆運動之中，提出了「立即從勞農俄國完全撤兵」、「對俄開始通商」、「承認勞農俄國」等中心口號。

其次，和救濟俄國大饑饉運動結合在一起，日本工人組織了對蘇維埃俄國同情和援助的運動。一九二三年勞動節，採用了黨所首倡的「承認蘇聯」的口號。俄國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饑饉，不單是因爲天時不順，也因爲反革命的猖狂，遂使豐饒的俄國國土，有廣大而肥沃的土地的國土荒廢了，饑荒的程度，令人悲痛到極點。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蘇聯的饑饉，當然是滿腹同情的。日本共產黨也站在日本工人前面，從一九二二年夏天開始，用種種方法來號召「救濟俄國的饑饉」。在所有的工廠裏，在勞動組合

之中，在農民之間，以及在廣大的小資產階級之中，也採用了「救濟饑餓的俄國」這樣的口號。黨動員機關雜誌「前衛」並動員其他能夠為力的一切機關，甚至推動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報章雜誌，來廣泛地募集救濟俄國饑饉的捐款。把募得的款項湊在一起，贈給蘇維埃俄國的工農。

此外在國際運動方面，對於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國軍事佔領德國魯爾地區●，也舉行過抗議示威運動。並且在此時期，日本共產黨也提出過「日鮮工人團結起來」的口號，爲了與朝鮮工人團結而進行了種種鬥爭。

其次，爲了指導工農日常鬥爭，爲了使他們革命化和強化他們的組織，當時的黨作了不少的活動。凡有罷工和有農民鬥爭的地方，黨就往那裏派人去作組織工作，並進行宣傳鼓動，尤其是爲勞動組合的統一而進行的鬥爭，曾加以積極的指導。其中爲勞動組合運動之統一而鬥爭的時候，黨竭力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由結合論，在集權的合併論的旗幟之下，爲勞動組合之統一運動而努力。一九二三年秋，在大阪開了全國總聯合會成立大會。這個大會開會的時候，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發生了衝突，以致於決裂；一般人都說大會的被解散是爲了這種原故。不錯，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衝突是

● 爲了德意志共和國沒有履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賠款，法軍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佔領了魯爾。魯爾的煤礦工人開始罷工，法國工人也開始了抗議運動。

事實，可是資產階級解散大會不是爲了這個；資產階級是看到無政府主義者之主張佔少數，共產主義者方面是絕對的多數，勞動組合總聯合會就要結成了，纔鎮壓大會並下令解散了大會的。但是大會雖然被解散，而共產黨的勞動組合統一運動的鬥爭，直到今日還在繼續之中，在工人運動的領域中，則特別集中力量於失業者運動方面。

日本資產階級爲了防止日本工人的抬頭及其鬥爭之革命化的傾向，頒佈了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勞資爭議調解法案和租佃爭議調解法案。當時任何工人都認識這惡劣法案的苛刻，因而進行鬥爭；黨站在鬥爭的前列，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組織了反對三大惡法的羣衆鬥爭。又促使全國五十多個思想團體、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組織了反對惡法的無產者同盟，也進行過使全國勞動組合組織反對惡法同盟的活動。終於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舉行了反對惡法大示威運動，使這些惡法不能成立。這些前面已經說過了。

黨還援助過水平社運動<sup>①</sup>，援助爲解放特殊部落人民而勃起的鬥爭，黨員中有若干同志，以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來担任水平社運動的領導，然後把這種運動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連結在一起而鬥爭。

① 日本有一部分特殊部落人民，在生活上和法律上都不能達到一般人的水平，水平社運動就是解放這一部分人民的運動。——譯者

當時爲了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黨更直接加以領導和幫助，這是不必說的了。通過這些時代，黨常爲工人政治鬥爭，最熱烈地進行了鬥爭。對於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殘餘的鬥爭，也是當時最重要的鬥爭之一。

日本共產黨就是這樣站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前列而戰鬥着的。在這個期間，像上面所說過的那樣，爲審查綱領開過臨時大會，此外在這以前，大約在二月間開過成立以後最初的大會，決定了黨的規約和「對俄不干涉」、「承認勞農俄國」的口號，而且爲了克服過去遺留下來的宗派組織，實行了領導幹部的改選。

如前所述，黨是在鬥爭中漸漸發展起來的。

## (二) 六月檢舉和對它的鬥爭

這時，資產階級以六月檢舉破壞了黨主要的活動部分。

一九二三年六月對共產黨檢舉，是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階級團結活動進展的第一次大檢舉。資產階級極盡惡毒煽動之能事，說什麼這是第二幸德事件，說是什麼大逆事件等等。這並不是資產階級對於日本共產黨的目的和性質完全無知，而是和「三·一五」事件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爲了保全自己，有意識地利用君主制作爲武器而已。

這次檢舉，把黨的指導部和其他一部分活動的黨員，給關到獄裏去了。但黨在檢舉



以後就又組成了指導部，決定了檢舉以後對抗這種檢舉的鬥爭方針。這次的檢舉，對一般黨員不必說了，就是日本一般的工人，也決沒有被什麼第二次幸德事件、什麼大逆事件的煽動所嚇倒而屈服下去。相反的，工人大眾從這次檢舉知道日本共產黨的存在，他們加強了對黨的默然支持和對黨的要求。當時黨在大眾之間的印象怎樣呢？雖然不具體地知道，可是這次檢舉以後，證明了共產黨並不是無產階級所討厭的東西，而廣大羣衆却開始有了共產黨是我們的朋友的想法。但是這次檢舉在使勞動運動違反共產黨的領導這件事情上並非毫末發生作用，此後，接着又有九月大震災時的大反動，使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者、改良主義者，越發右傾、越發挺不起腰來了；在一般勞動運動中，則發生了社會民主主義，而在我們黨裏則發生了解黨主義；這次檢舉，却幫助了這些東西的發生。

### (三) 震災恐怖(虐殺朝鮮人、龜戶事件)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震災，是正在我們作了第一次共產黨被告而入了市谷監獄的時候發生的，在一時一地曾發生了無政府的狀態。

資產階級利用震災，作為鎮壓內亂的演習。在戒嚴令之下，假手於軍隊，另外又假手於自警團這樣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武裝組織，首先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常踩在脚下，又

怕他們一旦翻了身來推倒自己的朝鮮人進行了大虐殺。由於日本資產階級的惡毒煽動（現在是誰都明白的），由於完全虛偽的惡毒宣傳，不知有多少萬無所依靠而又不能抵抗的朝鮮人被虐殺了。

在這次震災期間，日本資產階級更製造了「龜戶事件」，種下了日本工人胸懷裏所不能忘掉的大仇恨。這就是在我們黨下面的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者，以河合義虎同志爲首的九位革命工人，慘遭殺害的事件。黨爲了永遠追念日本無產階級運動中這些英勇的犧牲者，在一九二七年再組織的時候，都把他們載入日本共產黨黨籍。

日本資產階級，殘殺了這些工人，殘殺了朝鮮民族，還不滿足，在震災的混亂當中，還以勅令來制定維持治安的罰則，這不久就修改成爲現在的治安維持法了。

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就像這樣的，在震災的時候，爲了資產階級利益，一方面制定震災票據補償法這種保護資產階級的掠奪性的補償法案，一方面對於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則採用了上述的手段。

#### （四）解黨決議

在震災以及資本家接連不斷的反動攻勢之下，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者和勞動運動中小資產階級之間，所謂分離化運動●、所謂自由主義化運動抬頭了。一句話，這不外是在

資產階級強有力的攻擊之下，在白色恐怖的反動之前，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害怕得挺不起腰來，屈服於資產階級而已。當時黨的指導部中，有一部分人受到分離化運動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分子暴露了自己的本質。現在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老前輩之一的有名的叛徒赤松克麿<sup>①</sup>，當時也在日本共產黨指導部內。他丟掉黨丟掉得最「勇敢」，但是他不是走向分離化的道路，而完全是向着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突進的。

一回顧他所提倡的「科學的日本主義」，就可以明確了解他以上的行徑了。和這位「勇敢」的赤松並駕齊驅的，出現了山川均以下一些胆小如鼠的變節漢。這些人尙不敢從正面否定共產黨，可是在反動勢力之下，却表現了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即是產生了自然成長論的傾向。他們認為必須再稍稍等一下日本工人的覺醒而自然地結成共產黨，這種代表典型的機會主義的思想，實質上仍然是背叛了黨、放棄了黨。黨內這樣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思想，對於黨和無產階級運動全體，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者，不單是自己放棄了黨，而還使黨解體，強調黨的解體，使爲黨鬥爭的革命

● 分離化——是分離主義化的略稱，當時領導上的口號。把共產主義運動扯到自由主義運動的當時的運動。當然這是與解黨決議的精神相一致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 赤松克麿在後來完全成爲法西斯主義者。他那篇「科學的日本主義」一文，載於「新人」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號卷頭語。志賀義雄加以反駁，曾著有「駁科學的日本主義」一文，載於「馬克思主義」雜誌一九二五年六月號。

工人，陷於無黨狀態，這由以後他們是怎樣爲害於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就可以推想得到。當然，這個解黨也不是毫無阻力，就那樣順順當當地作下去的。就連那「勇敢」的叛徒赤松克磨，爲了欺騙黨內革命工人和黨外工人，也感到有說日本共產黨的解散，是單是爲了便於清除黨內不純分子和封建主義分子的必要。若不這樣欺騙，當時黨員羣衆就是在消極方面，也到底不能接受解黨的。實際上當時黨內工人同志，對於解黨是反對的、抗議的，但結果却被厚顏無恥的小資產階級叛徒們把黨解散了，向資產階級出賣了黨。日本工人革命分子，對於這種行爲，不論到什麼地方，決不是盲目的。他們在黨解散以後，開始爲了再建更堅強的共產黨而鬥爭。共產國際對於解黨，最初就是絕對地反對，強硬地反對，對於解黨不予認可，並且下令立即從事黨的再建。共產國際對於日本共產黨的解黨展開了鬥爭，在實行解黨決議的一九二四年，即大正十三年春天，馬上下了反對解黨的指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當時日本共產黨指導部聲明，不承認日本共產黨的解體。共產國際對於日本共產黨的解黨，當然沒有承認的理由，凡某一國共產黨重要的事，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承認的，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反對，就要作爲無效。在那個大會上所決定的事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若無異議，那就是承認了，若斷定它是錯誤的，那却是應該取消的，也就陸續被取消了。

這次解黨，當然不是由當時黨的正式大會決定的，也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勢之下，由代替大會的會議來決定的。

這個解黨決議，是叛徒們在極陰險的策動之下，從這裏那裏去找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湊在一起偷偷摸摸地決定的，並且，作得使不知內情的人彷彿看來是普遍贊成解黨的樣子。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對於這次的解黨，就黨來說，並非由大會及代替大會的會議來負責的，完全是由少數叛徒玩弄毒辣的陰謀手段來促成的。

前面已經說過，這次解黨決不是順利進行的，它曾遭遇到許多磨擦和反對。叛徒們本想爽爽快快地解黨了事，可是這是辦不到的，於是不得不用種種方法騙人。結果是他們爲了保留機關而設立一種組織，把革命的黨員也拉到裏面去予以地位，叛徒們對革命的要求，作了表面的妥協。這個組織就是以後衝破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叛變，成爲黨再組織的實際活動機關——委員會。

### 三 從共產國際否認解黨到黨的再建

#### (一) 委員會時代

解黨並不能順利進行，曾起過波瀾，而解黨以後成立的委員會，決不單純也不統一；其中一派是極純樸的、極革命的而又富於鬥爭性的；另一派則完全是失敗主義的、解除武裝的、取消主義的主流的代表者。這兩派最初還是在一起。

在共產國際強有力的幫助之下，這個委員會即刻進行了黨的再建。在爲了黨的再建而進行的實際鬥爭中，這兩派中有一派成爲當時名叫提倡派的，即是暫時滿足於宣傳提倡的自然發生論者；另一派名叫行動派，這一派純樸地代表工人革命的要求。這兩派絕不能和平共處，前者終於脫離了委員會。那以後的委員會在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之下，完全歸於行動派手中，他們從各方面進行了再建黨的一切實際工作。這個委員會實際是黨再組織的委員會，不消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使它完成這種任務的最強的力量。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一月，共產國際領導者，作了日本共產黨再組織的決議。

## (一) 一九二五年一月決議

一九二五年一月上海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徹底地批判了以前日本共產黨的指導部。可是黨當時對這個批判和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都不曾發表。共產國際曾發行名叫綱領問題資料的文件，末尾確實載有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我想現在已有了翻譯，可是當時却未發表。而一九二五年一月決議的領導方針，像這個重要的文件而竟不曾發表，這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損失是很大的。

一月決議上說：「現在日本沒有一個全體共產主義者的集中組織（即共產黨），這對於日本革命運動有很大的危險。但是現在的日本同志們，却墮入『等到運動自然長成以後再組織共產黨』這樣機會主義之中。這種機會主義不打破，日本的革命絕對不能前進」。這個決議給了大家當頭一棒。

其次這個決議講到以前黨的領導者非常幼稚，也講到他們的重大過失——如對於共產國際的領導，缺乏注意，不去從事實踐的行動，陽奉陰違——並對於這些地方，指出錯誤而痛加叱責。決議認為以前日本共產黨的領導者，好玩弄些觀念的、抽象的理論，缺乏真正的共產主義知識。決議指出，只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乃是非馬克思主義、非列寧主義，只是與實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緣的庸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已。第

二，決議講到不知道用革命的戰術指導羣衆，不知道把黨建築在羣衆基礎之上。也沒有從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堅強紀律。單從個人關係上團結黨員。因此，甚至非共產主義的封建主義者也都混了進來。決議又指出，當時黨的領導者，不用說，從來對於共產國際的指令，決沒有充分執行。忽視了共產國際的這些忠告：必須爲羣衆要求民主主義而鬥爭，必須號召普選運動，必須積極參加工農的日常鬥爭，必須有公開的出版物，必須有秘密的出版物。這個決議像這樣以革命怒火大加申斥着。

這毫無疑義地完全說明了當時黨的缺陷。

一月決議的最後部分說到黨的孤立問題。爲什麼工人大衆對黨不信任？更正確地說，爲什麼黨脫離羣衆而孤立？這就是由於黨的活動一概都是消極的，由於黨的指導部錯誤的領導，即黨的指導部對於勞動運動及政治生活中一切重大問題採用了消極政策。因此決議中強調：在工人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上，若是共產黨不獨自積極鬥爭和領導，黨不但不能前進，而且是要後退的。大衆在前進，黨反而後退，那末，黨當然是要陷於孤立的。

### (三) 政治局時代

黨再組織委員會根據意義重大的一月綱領，開始進行真正的黨的再建工作。以前那



個小委員會，只不過幾個人，而那裏面還有行動派和提倡派的矛盾，行動並不統一，宣傳方面也只是偏於小資產階級主義、機會主義，可是這個軟弱的委員會，也並未完全忽視當時的革命工人；它常把追求革命的中心領導的革命工人們，直接地或間接地積極地或消極地拉到周圍而加以節制。因此再組織委員會以一月綱領為根據，實質上就是把這個委員會掌握在革命工人行動派的手中，而已故的渡邊政之輔同志即是其中的堅強的領導者之一。這以後黨的再建工作，就進入惡戰苦鬥時期了。由這個時期起，委員會變作政治局而進行活動，實際名義也稱為政治局，以日本共產黨之再建為直接任務。在這個政治局領導之下，各方面成立了革命工人集團，政治局團結它們，領導它們去鬥爭。

這個時候，國際形勢進入穩定時期，即是進入資本主義暫時的、相對的穩定時期。同時，這也是矛盾日益深刻的時期。前面已經說過日本震災以後的反動，即是資本家為了逃避由震災所受的打擊——把他們的犧牲完全加在工人雙肩之上——而來復興資本家事業的時期，階級鬥爭却只有日趨激烈和深刻化。在這種情勢之下，資產階級方面以今日民政黨前身三菱系政黨憲政會為首，以擁護憲政為名，成立了護憲三派內閣。資產階級的護憲三派煽動工人以打倒特權階級相號召，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進展，採

○ 一九二四年六月由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等護憲三派組成加藤高明內閣。總理大臣是加藤，外務大臣是三菱的親戚幣原，鐵道大臣是和三菱有深切關係的仙石貢。

用兩種對付方法：一方面拿出普選法案，並允許勞動組合有選舉國際勞動會議代表的權利，欺騙工人，想把無產階級拉到它們自己方面去；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在它喊叫打倒特權階級的同時制定並公佈了現在的治安維持法案。這個普選法案和治安維持法案互相爲用，資產階級在這些條件之下，就可使它成爲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和武器，成爲資產階級離不開的東西。把以前已經葬送了的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現在又狡猾而卑劣地撥拾起來，制定了以變更國體、否認私產爲罪名，而處無產階級十年徒刑的卑劣的法律條文。在資產階級這樣進攻之下，無產階級的陣營裏，一面有受資產階級積極援助而成長爲社會民主主義的一派，相反的，另一方面却有革命化、左翼化的工人，使共產黨陣營的基礎鞏固起來了。

在這個時期，因有共產國際的領導，黨再組織委員會在進行共產黨重建工作中，逐漸地獲得了主觀條件。換句話說，在政治局領導之下，黨因爲爭取到許多革命工人便壯大起來了。

在這個期間，最初改良派和革命派大規模的分裂，首先是一九二四年春天到翌年春天的所謂總同盟內訌事件，繼而是一九二五年五月的總同盟的分裂、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的成立。

所謂總同盟的內訌事件，當時山川均等都認爲是勞動組合的內政問題，而革命的工人則認爲這明明是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的對立和分裂。正好在這前後，一九二五年五

月，共產國際對於日本勞動組合運動作了一個決議。在這個會議上，日本再組織委員會的代表也參加了。關於這點，不擬詳述。在這個決議中決定要為勞動組合的總聯合即為統一而鬥爭，為產業別組合的統一而鬥爭。此外，對總同盟內部的反對派，即還不會分裂的革新同盟，不要使它和總同盟分離。一定要在總同盟裏加以強化和擴大，並且規定以發行左翼勞動組合全國規模的機關報為最緊急的任務。此後即創刊了全國規模的機關報「勞動者新聞」（工人日報——譯者）。又規定總同盟裏面的革命反對派，必須和右傾分裂主義堅決鬥爭，內部亦必須擴大和強化等條款。但這樣的條款，在拿到國內以前，總同盟內部就已經強行那樣的分裂，所以未曾實行。

#### （四）成立共產主義集團

像這樣不論直接在黨內或在黨外，委員會的工作因受到共產國際直接的領導和幫助而着着進展，終於組成了一個「共產主義集團」作為組織共產黨的過渡階段。這是一九二五年八月的事。在左翼工人絕對的支持之下，創刊了「無產者新聞」。

一月會議的綱領，是在上海共產國際領導者會議之下制定的，代表把它帶到國內以

後，政治局開了個擴大會議來審議，關於付諸實行問題有所會商，完全承認了共產國際的一月綱領，並決定了付諸實行的具體方案。

關於政治局會議所協議和所採擇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我只把它在當時黨的運動上能說明重要任務的部分作為代表來講一講。

這個綱領分析了日本的情況。認為現在日本的深刻而延長的蕭條，無論在什麼地方也看不到能急速恢復繁榮的徵候。經濟和財政的狀態，越來越不正常，越來越不健全。其結果使工人階級及佃農大眾生活越來越貧困，思想行動越來越急進。這種情勢，由於無產政黨組織運動之急速展開，便可以得到證明。在此種情勢之下，統治階級一切派別，憲政會、政友會、貴族院、樞密院，都企圖用一切方法把無產政黨和大眾分離，拼命地想使它成爲一個無意義的政治團體。另一方面共產黨叛徒赤松一派的改良主義者，爲了想作成排除共產主義者、排除無產政黨的社會民主黨，而逞其陰謀。

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在具體鬥爭中，克服首先是赤松一派的社會改良主義，其次是安部磯雄等所創的日本費邊協會以及政治研究會的舊幹部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並把它們驅逐到無產政黨的圈外去。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認識到只有由羣衆自身之興味與活動，才能形成羣衆的、階級的無產政黨，使用一切宣傳的、組織的方法動員羣衆。

第三，把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直接領導之下的工人教育協會、水平社青年同盟、無產

青年同盟及左翼勞動組合結合起來，在無產政黨內，創立共產主義分支，這就是第三個任務。

當時無產政黨組織運動進行中，連今天公然變為社會民主黨的政黨都包括在內。可是當時是把它們作為共產主義者可以在其中活動的革命鬥爭舞台而加以利用的。在無產政黨運動中，對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展開激烈的鬥爭，在這種運動之中，壯大了共產主義的勢力。這樣才能在無產政黨運動中使共產黨方面取得勝利。這在綱領之中，規定為共產主義集團的重要任務；可是這決不是說共產黨以外還應有任何其他政黨的必要，一點也沒有這種意思。同時在工農特殊政治戰綫形式上，和山川均合理化的機會主義組織論<sup>●</sup>，也是沒有關係的。

最後，規定在無產政黨內創立共產主義分支。當時的無產政黨運動是有革命意義的，它和從幾年以前就壓迫工人的資產階級代理機關的無產政黨，應該區分開。在這個綱領上，明白地說，無產政黨決不能代替共產黨。

這個綱領裏這樣說：「我們不能把無產政黨當作我們理想的政黨，而在這種幻想之下來從事工作。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共產黨。」

● 機會主義的組織論是山川均提倡的統一戰綫黨論（這一直拖延到本年社會黨大會的統一戰綫黨論為止），就是不要共產黨的政黨，而想要加強勞動組合幹部的領導力，藉此使之成為整個鬥爭的領導體。

在共產主義集團成立會上所採擇的政治綱領，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這次會議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組織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這裏簡單地講講被採擇的組織綱領。

黨必須以工廠支部爲基礎，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在工農羣衆團體之中，成立黨的支部組織。這個黨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在這個組織綱領上，明白地被採用了。前年，即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第五屆世界大會上，已經採用了黨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黨的政策不論怎樣正確，如果不能和無產階級羣衆好好結合在一起，即是如果沒有以工廠支部爲基礎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那就是沒有意義的。在確立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的會議上，也採用了這個原則，決計根據這個原則進行黨的再建。

這次組織會議主要的決定事項，完全表現在這個組織綱領和政治綱領之中。我在講述這兩個綱領的時候已經附帶地說明了這個時代黨的活動的大概情況，所以就不再細說了。

#### (五)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屆總會中再建日本共產黨的決議

這個時候組成黨的條件在客觀的方面也逐漸成熟了。從第二年，即從一九二六年二月到三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國際紅色勞動組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國

際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的時候，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的代表曾去參加。會上給日本共產黨的再建作了直接而具體的決議。同年六月日本代表把這個決議帶到國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詳細地、徹底地討論了這個決議，並商定了實行這個決議的方法。

自從一九二六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黨急速吸收了工人中的革命分子，逐漸進行準備召開黨再建大會。

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如下：立即增加百名左右黨員，這是馬上就可以作到的。大會盡可能早開，當時我們在獄裏，可是這大約是估計我們不久就可以出獄，所以才有這樣計劃。在這大會開會以前，黨員要增加到三百名左右，這是很很有把握的。並決定為實行這些事而努力。此外還決定盡可能以公開的宣傳文件，發表共產國際的決議和國際紅色勞動組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如果作不到時就秘密出版等等。

共產國際全會的決議，一九二六年後半即着着見諸實踐，於是黨再建大會十二月就召開了。

#### 四 從再建大會到再組織

##### (一) 再建大會

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再建大會開會以前，就已經有了發展。一九二六年工人運動急速高漲，農民運動中土地問題日形急迫，而日本資產階級却運用國家權力，採取斷然鎮壓工農的手段；工農爲保護日常利益而鬥爭，乃不得不和國家權力正面衝突。這種情勢，愈演愈烈。一九二六年罷工的次數，也飛躍地增多了。像共同印刷廠的勞資爭議、濱松樂器公司的爭議、別子銅山的爭議<sup>①</sup>，都是延長到六十日或百餘日的長期鬥爭，也都是對資本家不屈不撓毫不躲避的堅決的流血鬥爭。農村方面的形勢也大略相同，爭議的次數在一九二六年顯著地增加了。新潟縣木崎村所發生的大爭議<sup>②</sup>，農民爲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死守着土地，徹底進行鬥爭。在農民和地主爭奪土地的時候，日本資產階級乃是地主徹底的幫手。政府對於農民加以殘暴的鎮壓，把數百農民都關到監獄裏去了。

工人在罷工方面，感覺到必須有堅持的秘密組織，而把它和強硬的秘密領導結合在



一起，也是絕對必要的。於是根據必須以半秘密的組織來和敵人徹底進行鬥爭的經驗，工人大眾才有了像地下本部和移動本部這樣的秘密組織，並在共同印刷廠的爭議中現出了端倪，其次是濱松樂器公司的爭議，這是一件延長到一百零五天之久的長期流血的徹底鬥爭，在這次爭議中工人羣衆成立了作爲自下而上的鬥爭組織的細胞。由這種細胞組織，來和官憲及公司的暴力團以及一切敵人作鬥爭。這是工人階級鬥爭激烈化、深刻化的結果，許多工人和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的領導結合在一起，都來要求一個共產主義的工人黨，還有富於鬥爭經驗可以稱爲階級鬥爭的將校的共產主義的工人，都站在大門以外，等候着黨來開門，並且用各種方法對黨表示信任並努力和黨接近。有一件事至今令人不忘，即「無產者新聞」通訊欄內，有讀者寄來的一封信。這是因爲右翼社會民主主義

① 共同印刷廠的勞資爭議，從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起到三月十八日止，參加鬥爭的有二千二百人。濱松樂器公司的爭議，從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七月七日止，參加鬥爭的有一千三百人。別子銅山爭議是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止，爲首的是三百名組合幹部。

② 新潟縣北蒲原郡木崎村發生禁止耕種事件，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執行拍賣扣押米的處分時，農民和警察之間發生衝突，許多人作了刑事被告。

③ 「無產者新聞」第十八號（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第四版，讀者通訊欄內載有讀者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共產黨這個名詞，爲什麼常爲反宣傳所利用？」編者的答覆是：「近來有反宣傳別人是共產黨來陷害別人的，但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希望不要再說別人是共產黨來排斥他。」

者和當時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勾結起來攻擊評議會，說它是「共產系」機關，這個讀者發生了以下的疑問：「一提到共產系都說是不好的東西，但是共產系到底是什麼呢？我不大明白。共產系是以什麼爲目的呢？現在作些什麼事的人是共產系呢？」我想這是工人的呼聲，這已經是反映了他們在種種形式上或暗中或公然地在尋求共產黨。當時「無產者新聞」編輯部是這樣答覆的：「講什麼共產系，乃是改良主義者的一種造謠欺騙。」這種回答案，也決不是「無產者新聞」編輯者怎樣特別不中用，這僅是說明工人們想盡了一切手段想加入共產黨，而當時的黨還在一種幼稚渺小的時代，不能適應這種要求。這件事正表示工人感受到了對於共產黨的攻擊，以及工人對於「共產黨云云」的真正的要求。同時說明小資產階級分子，讀了馬克思列寧的著述，雖然口頭上講些共產主義，但是他們却體會不到，爲了進行階級鬥爭，非有共產黨這樣的組織不可，也不能實際獻身於革命。雖然政府和改良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共產系」，在那裏造謠欺騙和作組織上的排擠運動，而工人却更加知道共產黨纔是自己真正的好朋友。這些條件對於日本共產黨的再建，非常有利。另一方面自五卅事件開始舉起烽火以後的中國革命之進展，中國工農站在國民軍前列從事於實際犧牲的英勇戰鬥，這些當然對於日本工人的影響也很大，這是重要的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舉行了黨的再建大會，黨的英雄、已故的渡邊政之輔同志，在那時候居於重要的領導地位，最熱心地從事活動。這次的黨大會，日本工人階級作爲一個

政黨，克服了黨從第一次大會時期直到共產主義集團時期所存在着的宗派組織，從新把黨建立起來，這是由於工人階級覺醒的壓力，纔作到了這種地步；這在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這次大會的成立，發電祝賀並激勵日本共產黨的再建。

可是這次大會所採的基本方針，却有很大的錯誤。這在今天看來格外清楚，即由於福本主義（福本和夫所倡導的——譯者）這個錯誤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左右了大會，使大會採取了福本主義的政治方針。福本主義的思想，並不是這一年才開始出現於日本小資產階級之間，而是在數年前就已經浸潤到黨裏來的。今日日本黨內如佐野學和其他領導同志，曾根據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的日本問題決議，對於福本主義作了理論的批判。全黨黨員和在黨影響之下的革命工人、左翼工人，也以實際行動，以鬥爭來批判了它，克服了它。今天在這裏不能從理論和政治方面詳述福本主義。

講到福本主義爲什麼抬頭就必須注意這種情勢：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階級對立尖銳化，共產主義左翼黨和社會民主主義右翼黨對立鬥爭日趨激烈，而階級鬥爭發展中，舊的左翼領導精神、舊的共產黨領導精神（即是山川主義的領導），已經徹底暴露了破綻，因此，日本工人迫切要求一個代替這個暴露了破綻的、僵死的山川主義的領導，迫切要求一個能夠對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攻擊進行強力戰鬥的新的領導。若是沒有這個，運動就會停滯不進了。同時福本主義的抬頭，和國際的情況也有關係。在國

際方面，資本主義是在暫時的、相對的穩定時期，資本主義是在一時地、表面地復興着——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工人的壓迫當然是越來越兇，矛盾更趨尖銳化。在資本主義一時的、表面的穩定狀態之下，工人運動中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小資產階層，不絕地墮落下去，代表小資產階級動搖思想的機會主義分子，屈服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鋼鐵般的共產國際的鬥爭，懷着不信任的念頭，在種種形式上，散佈反共產國際的思想，當時是有這樣一系列的國際的右傾偏向。這種右傾偏向，和「左」傾偏向為隣，他們是同志又是難兄難弟。在德國有路德·費夏、寇爾修、盧喀琪等形態；在蘇聯也有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羣人，對於布爾什維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抱着懷疑態度。當時國際間有這樣反共產國際的傾向，而在日本則以福本主義的形態出現。日本這種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把握住了和革命工人的要求同時流進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忽然風靡了黨和左翼羣衆團體。這個福本主義的衆所周知的「理論鬥爭」，和它的「分離結合論」，是何等錯誤，是怎樣阻礙了日本無產階級運動，怎樣使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後退，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當時工人對於福本主義的文件和言論，也有多少覺得不滿的。對於分離結合論和理論鬥爭主義，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抱有懷疑之見。山川主義的領導暴露了破綻以後，福本主義代替它登場；正在山川主義使工人失望以後，工人要求共產黨組織的時候，好像這個東西滿足了這種要求似的，所以福本主義能把左翼工人絕大多數都吸引了進來。即是——並非詳加批判——福本主義所強調的主體或者說是主體的條

件，當時工人認爲這正是他們自己要求的共產黨，於是福本主義才拿出主體或主體的條件來。但是今天已經證明，福本主義的主體純是馬克思主義之意識的集結，是把組織完全抽象了的觀念的主體。它的主體是什麼地方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存在，便存在於什麼地方。這不過是說什麼地方都有類似共產黨的組織出現，可是這和實際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鬥爭的現實組織，是沒有關係的。這種主體條件和主體的理論鬥爭，及表面輝煌的分離結合論等議論，對於工人一向所求之不得的共產黨，好像是祈求麵包而給了一塊石頭一樣，工人得到的不是麵包。這也是日本工人階級一大不幸！黨內由於福本主義的浸潤，把山川主義從左推向右，後來福本主義走了進來，可是這個福本主義只把山川主義推了出去而已，決沒有克服了它，也不具備能够克服它的性能。由工人階級鬥爭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黨大會，在馬克思主義意識注入的名義之下，却注入了福本主義，真是日本工人階級的一大不幸！

在這個大會上，以渡邊政之輔同志爲首的若干優秀工人同志，直接參加並再建了黨，決定了黨當前的政策，選舉了新中央委員會。長期失掉了的黨，現在恢復了，那些具有鬥爭經驗來到黨門前的階級鬥爭將校們，以面向鬥爭的氣概加入了這個黨。共產國際對於這次黨再建大會表示慶賀，同時對於這次大會所採用的福本主義方針，首先表示強烈的反對。共產國際認爲大會所採用的方針，毒害了日本無產階級，於是便否認了它，主張必須由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來正當地解決這件事。

共產國際強烈地反對黨大會所採用的方針和其他政策。同時共產國際也指出當時仍然浸潤在黨內的山川主義的領導——已經爲福本主義從實際羣衆鬥爭的場面排出去，可是仍有山川主義的殘餘——和共產國際的主義背道而馳，亦不亞於福本主義。這兩種東西若不加以克服，日本無產階級便不能取得勝利。從這種見地上着眼，於是把當時福本主義的派別代表，和殘餘的山川主義派別代表，都叫到莫斯科去，在那裏經過徹底研究討論後，必須給予這些派別代表們以決定。不消說，當時被稱爲幹部別的福本主義派中聲望很高的領導者渡邊政之輔同志，後來爲了克服福本主義，站在前列從事鬥爭。他在這個大會上，爲了召開十數名黨員參加的大會，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奮不顧身當此大任。這次大會的決定，對於共產國際所召集的會議，非常重視，主張在可能範圍之內，要多派些人到莫斯科去，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徹底討論，改正錯誤的地方，得出正確的方針，所以福本主義派決計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在當時這是黨內問題所以不能講，我想在今天發表是無妨礙的。當時的反對派，也是少數派，即是山川均等，雖然由渡邊政之輔同志和其他同志努力進行說服工作，告訴他們，反對派也應該到莫斯科去討論，爲了使他們到莫斯科去，用了種種方法，煞費一番苦心。可是山川主義和其他勞農派的領導者，却實行怠工而不去參加。黨在中央執行委員不在家的時候，設立了領導機關，在莫斯科決議來到日本以前，他們在大會所採用的方針之下，進行實際運動。

當時黨裏面，一面是福本主義，一面是山川主義，這雖然不是組織上的派別，而確

是有這樣的潮流，現在雖然管這叫幹部派和反對派，但是當時的幹部派不是什麼派別，而就是當時的黨。這一點是要特別說明的。

還有應該附帶說明的。一些共產黨的叛徒，說什麼共產國際的領導者——據那些叛徒說，這就是共產國際日本支部首長，實際沒有這名稱——否認共產黨大會；否認一國共產黨大會是很奇怪的，不應當的。這明明是完全不知道國際的組織紀律。共產國際的領導者，若是單以領導者的名義，那是不能否認黨大會的決定的；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若認爲一國大會決議有錯誤的時候，當然可以使它作廢。在階級鬥爭組織中，國際中心若感到有一個支部的決議發生錯誤的時候，即否認了它，使它變爲新的、正確的。這是當然的事，也是應該這樣作的事。

## (二) 一九二七年的鬥爭

日本共產黨雖然在福本主義領導方針的軌道上來行車，可是以後階級鬥爭的發展，若是不離開這個軌道而走向另一個正確的軌道，階級鬥爭的火車頭，就不能前進。一九二七年就是現實地證明這種情況的一年。

在勞資爭議和農民鬥爭日趨激烈之中，已可看到日本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刻，終於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四月，爆發了所謂昭和金融恐慌。這個恐慌對於工農的影響

是很大的。金融恐慌對於工人影響就是：大量的解僱、革職、減低工資、工廠倒閉等等，因此遂使沒有加入勞動組合的廣大工人羣衆，也奮起反對資方。這個金融恐慌的影響，也波及到農村，農村階級鬥爭因此更激烈化了。農家最重要的收入之一的繭價下落得很厲害，養蠶的農民更特別陷於窮困，現在不僅是以前那些爲租佃爭議而奮起的佃戶，還有涉及廣大範圍的貧農羣衆，在全國各處奮起抗爭。

黨再建大會以後黨的活動，主要是一九二七年的活動，不用說它的鬥爭是以工人和貧農的鬥爭方向爲轉移。日本共產黨反對政府爲保護少數財閥而實施的補償法；爲了組織恐慌的犧牲者即工人羣衆的鬥爭，宣傳、鼓動並組織工廠代表會議運動；爲前年以來所進行的解散帝國議會而鬥爭；爲實行普選而舉行請願運動，更繼續進行那種能夠動員廣大羣衆的請願運動；領導羣衆反對資產階級議會打算強奪大衆五億圓的企圖而進行鬥爭。在這些鬥爭裏，不僅左翼工人，就是中間和右翼的羣衆也參加了。實際上這是一個歷時三月以上的強有力的鬥爭，日本共產黨通過這個整個的鬥爭而使羣衆革命化，努力培植共產主義的工人。一切重要的運動，都採取「到工廠去」的口號，工人一切鬥爭，必須在工廠中來組織，這在金融恐慌的影響下極迫切的鬥爭中，深切地學到了這個經

● 一九二七年震災票據法案在議會列入議事日程。資金薄弱的銀行內部發生動搖，銀行紛紛倒閉，釀成金融恐慌。台灣銀行亦宣告停業，暫行停止兌現，五月四日，使日本銀行向各銀行貸款，臨時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要用七億圓來彌補日本銀行的損失。



驗。「到工廠去」這個慣用的口號，這時候用於所有的方向。例如在「無產者新聞」爭取讀者運動中，在「無產者新聞」組織活動中，在工廠中組織讀書會的時候，都用過這個口號。日本共產黨這一年接受了一九二七年綱領，把它當做根據朝着以工廠支部為基礎而進行黨的再建。這些運動，和當時的社會民衆黨、日本勞農黨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鬥爭的領導，對立得很尖銳。他們對於工廠代表會議運動，作了一切積極的和消極的阻礙，他們自己手下的羣衆，誰若是參加這個運動，他們就盡量使用一切兇惡手段來壓迫他們。可是黨對於這些是毫不寬恕的，黨揭發了他們的劣根性，並和他們鬥爭。

一九二七年，對於金融恐慌的鬥爭，使工人階級的鬥爭有了極大的進步，而對它影響最大的，乃是中國革命的偉大的進展，和中國無產階級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干涉的鬥爭。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由背叛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之手，移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手中，這個時期中國工人英勇無比的自我犧牲的鬥爭，在帝國主義砲火之下，在殘暴的殺戮和監視之中發展起來的英勇鬥爭，給予日本無產階級多大的感動和影響以及多大的教訓，到後來就更明白了。

當時中國的戰鬥的工人組織糾察隊和便衣隊，來和帝國主義者抗爭，在日本工人之間，乍一看彷彿是「輸入」的，其實決不是趕時髦。日本無產階級受到中國工人英勇鬥爭的感動，乃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武力干涉中國，特別是和中國軍閥相勾結而來殺戮中國

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引起的階級憤怒所形成的偉大的革命的影響。我想這毫無疑義地對於培植日本共產黨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日本工人以前總是受到不良宣傳，說什麼中國人遠不如日本人，同時也就這樣想着。可是一見到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時中國無產階級光輝的鬥爭，就完全感到階級的愛，革命同志的愛，中國工人英勇的鬥爭鼓勵了自己的鬥爭。這是促進日本共產黨運動發展的偉大力量，必須強調的。這一年黨的各種活動，不必多說了，就是一方面工人階級對於金融恐慌的影響起而鬥爭，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影響，使日本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了很大的發展。

日本共產黨在當時，雖然採用了福本主義那樣反國際主義的、反共產國際的、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領導方針，並在這個方針下面進行活動，可是到了這個時候，就不得不承認在福本主義的領導和實際階級鬥爭的發展之間有着顯然的矛盾。當時日本共產黨指導部雖然無意識地，但却在實際鬥爭之中，部分地修正了福本主義；從那一年夏天到秋天，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問題，例如共產黨必須有黨自己的綱領，黨必須有秘密的中央機關報在羣衆之間公然宣傳黨的政策，公然來作鬥爭活動，一切運動都必須以工廠爲基礎，黨本身也必須以工廠支部爲基礎而再行組織……這些問題迫切需要解決。但是這些問題若不肅清福本主義、不排除福本主義、不和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直接結合在一起，是絕對不能解決的。實際上，當時指導部遇到這樣的問題，曾開過中央委員會及擴大中

央委員會加以討論，但是在未能作出決議時，關於工廠支部問題，共產國際第二屆組織會議關於工廠新聞的綱領和關於支部組織的綱領，已作為文件帶到了日本。黨的指導部接到了這些文件，越發感到這件事情的重要。

黨爲了以工廠支部爲基礎來進行再組織，使用了一個過渡的方法，就是以過去的地方組織，或地域工作關係的黨支部組織爲中心，使其負擔組織重要工廠支部的任務，即使過去的支部擔負組織新工廠支部委員會的任務。這個支部必須把它所負責的周圍工廠的工人吸收進來，爲了成立一個工廠支部，先組織一個可以稱之爲外廓的單位。於是採用了在重要工廠中建立支部的方針。當時最活動的支部，對於這種工作非常積極，不等領導者指令就發行了「工廠新聞」等。有的也翻譯了共產國際關於「工廠新聞」的方針，分發到黨員中去。

但當時的黨在工廠支部之上進行再組織，如用使過去的支部來建立工廠支部委員會這樣的方法不是容易辦到的事。代表由莫斯科回國後，帶來了一九二七年綱領，於是決計從根本上謀黨的再建，乃解散了過去的支部，再建新的工廠支部或工廠支部籌備會，這樣才完成了再建黨的任務。在這裏看得很清楚，雖然未能肅清福本主義的錯誤領導，可是在實際鬥爭發展中，使黨遇到了這樣重要的緊急問題，其次最關重要的，就像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那樣，若不斷然克服了一切形式的小資產階級領導，不論有什麼好計劃，碰到緊急問題，一接觸到實踐，就無能爲力了。我們說一九二七年黨的活動，就是爲了

證明這件事而再行組織的，也不爲過。以上極概括地說明了一九二七年黨的活動。

一九二七年七月到莫斯科去的日本黨的代表同志，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討論了日本黨的問題。共產國際領導者，爲了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忙得迄無寧日，簡直是一點閒暇都沒有的在不斷進行活動，但爲了日本問題，花費了許多時日，把山川均那些僵死的不值一錢的文件和福本主義的著述，小心地翻譯出來，仔細閱讀、仔細研究，對於日本實際工人運動的狀態，只用種種方法加以討論，對於日本黨的問題，盡情加以批判而毫不放鬆。日本的代表，以渡邊政之輔同志爲首的工人出身的最活動的、最積極的同志們，也都很熱心地參加了這次的討論。這次充分討論的收穫，就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共產國際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

到莫斯科去的日本代表，有工人成分也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分，在討論問題時，就劃分了界限，出現了工人集團。這是黨在錯誤領導之下所產生的東西，這件事的本身雖然是不妥當的，可是按派別來說，這是健全的派別。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渡邊政之輔同志是作爲代表的領導者而存在的。因此，他把一九二七年綱領實際推行到日本運動中時，他活動得非常積極。日本共產黨有了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決議，才在思想方面、在政治方面開始走入布爾什維克的路綫，爲了使民主集中制具體化，黨在組織方面正確地建立在最重要的工廠支部基礎之上，於是日本共產黨沿着共產國際的路綫奠定了不可動搖的正確基礎。

### (三)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日本的綱領

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是怎樣的呢？我只能大體講一講。這已經有了譯文，譯文曾在一九二八年三月「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登載過。但是這個譯文，有不少地方是極其杜撰的，當時黨雖然決議必須即行改譯，可是到現在也沒有改譯成功。

把這個關於日本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文件譯成正確的譯文，給予日本工人大眾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事。這雖然已經是幾年前的決議了，但在今天意義仍非常重大，我想正確的譯文還是不可少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日本代表和共產國際代表所共同討論和決定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即一九二七年綱領，如前所述，對於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從而對於日本共產黨的發展，是有最重要的劃時期的意義的。這個綱領曾經過共產國際縝密和詳細的研究，絕不是突然間在一九二七年制成的。在這以前，共產國際

●「馬克思主義」雜誌後來成爲黨的政治機關刊物。一九二四年五月創刊。一九二九年四月（由於四·一六事件）停刊。

關於日本共產黨的問題，曾制成了若干重要的綱領，這是已經說過的了。一九二六年二月共產國際委員會全體會議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就直接是一九二七年綱領的前身。所以雖然叫作一九二七年綱領，然而並不是一九二七年會議纔產生的，這在敘述這個綱領意義的時候，就可以明白。

一九二七年綱領，對於日本今天的無產階級運動，實際上起了莫大的推進作用，今天沒有人懷疑。若對這個綱領回過頭來吹毛求疵，而說什麼在一九二七年當時這一點應該如此這般云云，我想這樣馬後砲式的、風涼話式的批評與非難，斷不是共產主義者所應有的態度。今日有人要來非難這個綱領，那只有從其所好。可是這個綱領是當時日本無產階級運動中最高的力量的表現，最高的領導方針，對於實際運動一點也不會妨害，不但不會妨害，而且是起了偉大的前進作用，這是必須強調的。這個綱領爲什麼起了這樣偉大的作用呢？我先談談這個綱領的要點吧。

綱領上分析了日本客觀的情況。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規定日本資本主義的前途還是沿着發展的上坡綫前進這一節：「日本帝國主義尙在它的發展的上坡綫上，可是它的地位的矛盾，使它的進一步發展受到許多困難，因而使它帶着威脅的性質，此事不用說，首先表現爲資本主義恐慌的特別尖銳化。」●這時候一方面有日本資本主義急劇沒落的獨斷論，即是曾在日本共產黨內抬頭而表現爲福本主義理論之一的獨斷論，另一方面有右翼分子，把英國以次的歐洲各國所謂資本主義穩定狀態，原封不動地加在日本身上，也

說什麼日本資本主義是穩定的那種毫無意義的議論。不用說，綱領上的見解是對這兩種意見斷然反對的，它把到當時為止的日本資本主義的情況，正確地說明了。勞農派<sup>①</sup>、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派，把日本資本主義走上坡路的見解，高唱入雲，彷彿日本資本主義仍然隆盛地發展着。這樣的見解，與事實完全相反。這個綱領裏明白指出，如果日本資本主義走上坡路，那是有許多限制的。特別是和美國資本主義一比，尤其有許多限制。最重要的限制，乃是沿着這樣向上坡路走的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劇烈增加，因此可以說是開始成爲威脅形態的資本主義恐慌的尖銳形態。綱領乃是金融恐慌以後制成的，很正確地把握着了這一點，使人注意日本資本主義矛盾的激烈發展。

其次綱領上談到日本國家權力的構成。強調日本資本主義在世界大戰期間飛躍發展的結果，使日本國家之權力，資本家與地主的反動聯盟，它一向是在地主勢力之下，而今天它完全轉移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運用着反動的聯合政權。這種見解，比一九二三

① 在上坡綫——「關於日本問題的方針書決議集」九頁稱：「日本資本主義却與英國和歐洲資本主義各國正相反，無疑地今天還在發展的上坡綫上。……」

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勞農」雜誌以「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雜誌」爲標榜發行了。這是以誹謗當時日本共產黨爲任務的雜誌，是叛黨分子的機關報。主要的撰稿人是山川均、荒畑寒村等。編輯兼發行人是山畑甚二。一直繼續發行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左右，後來也有時復刊。所謂「勞農派」就是指這個雜誌的撰稿人而言。

年黨大會上所審議的共產黨綱領草案上的見解，是更進了一步。在這個綱領草案上（指一九二二年綱領草案——譯者），把日本國家半封建的性質，歸於地主勢力之領導，把日本的現政府規定爲地主政府。但是自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成立了所謂護憲三派內閣之後，繼而又成立了憲政會的單獨內閣。對於這種發展，共產國際作了正當的評價，在一九二六年的二月綱領上，明白地這樣說：「在世界大戰中，日本資本主義急劇地發展起來，以前在地主領導之下和資本家結合起來的政權，現在完全由資產階級掌握了領導權。」關於這一點，一九二七年綱領，繼承了一九二六年綱領的精神，而且說得更明白。

綱領上關於日本必然要來到的革命的前途，更作了重要的規定。這是已經發表過的，所以簡單地講講。

根據這個綱領，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要急速轉化並成長爲社會主義革命。爲什麼呢？近代日本國家雖然還有種種封建的特質和封建殘餘，却是日本資本主義最集中的表現，也是它最重要的致命的神經中樞的集結點。只要對它一擊，就等於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整個系統最強有力的打擊。所以從這裏看來，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不過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縱然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無產階級決沒有忽視階級的遠景。在無產階級看來，唯有正確地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的遠景才是在鬥爭的一切階段上具有決定性的。從這種意義來講，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



遠景，從制訂一九二二年綱領草案時起，早已就在發展着。一九二二年綱領草案中，明白白地說，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乃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並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爲目標的革命的序幕。日本共產黨雖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敵人，仍須提出推翻天皇的政府、廢除君主等過渡的口號，並領導爭取普通選舉權的鬥爭。日本革命運動在目前發展的階段上，應該把現在正在集結中的各種反政府的勢力團結起來，由共產黨來領導着前進，爲日本無產階級爭取蘇維埃政權的未來鬥爭開闢道路。一九二六年綱領中也說，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將來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工農去實行。也就是說，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因爲有着急速轉化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所以共產黨必須站在工農之一切進步的和民主的要求的前列，自我犧牲地積極活動。

一九二七年綱領上，論到一九二二年以來的發展，並指出現代的日本，雖然革命客觀條件非常成熟，可是在另一方面列寧所說的革命主觀條件，是很不成熟的。綱領上極力強調爲使主觀條件成熟而鬥爭，就是要擴大並加強共產黨，使其在羣衆中間獲得政治領導權。

一九二七年綱領中，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聯系到強調共產黨的作用問題。以前日本共產黨錯誤的小資產階級領導所謂山川主義，在這個綱領上是星同志所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有和這相對立的新的錯誤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即所謂福本主義，在這個綱領上是黑木同志所代表的思想。這個綱領中對於這些妨害黨發展的兩種重要的偏向和錯誤，曾

徹底加以批判。關於這些，在這裏不能詳述，我只講共產國際認為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障礙和敵人，而主張毫不留情地來和它們作鬥爭。只要一看綱領就會明白，山川、福本綱領中出現的星同志、黑木同志——這在今天已經是很明白的了，所以我才敢公然說——這個星同志及黑木同志決不會在克服了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的同時又被黨清除出去，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決不那樣作。

但是星同志（山川）竟為黨所棄而今日公然成為黨的敵人了；這是因為他不服從「徹底克服山川主義」的共產國際綱領，他不服從決議，叛了黨，叛了共產國際，所以黨和共產國際才把他趕了出去。這是很明顯的，和克服山川主義決不是一回事。

## 五 根據一九二七年綱領從黨的再組織到 第六屆世界大會

### (一) 再組織

日本共產黨接受了共產國際有劃時期的重要意義的綱領以後，就把它付諸實踐了。在頒發這個綱領的同時，共產國際任命了日本共產黨新中央委員會，使它根據這個綱領的精神，擔負根本再組織黨的任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討論了黨再建大會的決議，交付日本共產黨實行新方針的嚴肅任務，頒發了綱領，同時任命了新中央委員會。

這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很難理解的，他們認為這該是怎樣官僚的一套吧。但這不過是共產國際乃世界上集中的，嚴格的，統一的組織之一的證明而已。而且新任命的日本中央委員會，並不是永久的，而是爲了馬上要將綱領付諸實行，同時日本共產黨要盡可能地趕快召開黨大會，在這個大會上通過綱領並選舉新中央委員會。

日本共產黨即時把這個綱領付諸實踐了。到莫斯科去的日本共產黨代表於一九二七

年十一月回來了。十二月二日就開了擴大中央委員會。會上對於一九二七年綱領會熱烈討論，在絕大多數的贊同之下，全體出席的同志，宣誓要根據這個綱領，就是在黨內也要站在最前列來作領導活動。新中央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更到以前黨的一切支部去，報告這個綱領，使所有黨員都充分加以討論，使黨員都有信心來努力實踐這個綱領。黨員中絕大多數，其中尤其是過去幾年來對資產階級有階級鬥爭經驗的工人鬥士們，都熱烈地贊同這個綱領，並願獻身為實行綱領而努力。這些同志得到這個綱領以後，高興而勇敢地到工廠活動去了。黨根據這個綱領，馬上進行整個黨的根本再組織和改造。把以前的支部，組織成工廠支部或工廠支部籌備會，從工廠中吸收工人羣衆革命的精華，爲要把黨真正作到是工人羣衆的黨而鬥爭。

有了這個根本的再組織，即是有了工廠中的活動，爲工廠支部之確立與發展而進行的鬥爭，全體黨員纔決定積極參加黨的活動。以前黨是秘密的存在，不得不在羣衆之中隱蔽了自己的面目，而再組織的結果，就公開在羣衆之中提出政綱了。中央委員會馬上作成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勞動組合運動綱領以及目前各種政策綱領等而加以討論，經中央委員會決定以後，把它發表了。又創刊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赤旗」，這不僅發送給黨員，也發送到黨周圍的革命工人中間。這樣，黨纔開始直接和羣衆結合起來。這在日本共產黨來說，是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的最初的實現。有了這個綱領，日本共產黨不論在思想、政治、組織各方面，都站在正確的列寧主義基礎上和共產國際的路綫上，

已經能够奠定牢不可破的工人羣衆的黨的基礎了。這樣，這個綱領已經有了實現的端倪，對於它的實現，有了極有利的條件。這些國際的，國內的客觀條件，以及國內工人過去數年間苦難的鬥爭經驗，直接地參加到黨裏，或者成爲支持黨的力量，有了這些，纔使作爲羣衆的黨的共產黨容易誕生。

至於工人的鬥爭，自一九二六年以來，罷工日益深刻，自從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以後，資本家忽然公開地加緊實行產業合理化，於是惹起了羣衆生死的、頑強的鬥爭。又在農民方面，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租佃爭議也飛躍地增加了，特別是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爭奪土地的爭議飛躍地增加了，農村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屢有暴動化的傾向，而一九二七年更爲普遍，甚至廣大的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民，也大舉參加鬥爭。資產階級面臨着內外危機，越來越採用反動政策，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日常鬥爭中，正面地接觸到國家權力。在另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者叛變的事實則更加明顯，他們公然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相勾搭。共產黨公開地出現於羣衆之間的時候，就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假面具給剝下來了。在這種情勢之下，爲黨的發展、爲黨的羣衆化而進行的鬥爭，就順利地進行下去了。黨員除去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外，其餘全都努力於黨的再組織事業而有所貢獻。把綱領付諸實踐的經過，大體就是這樣。

現在我來說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黨的再建大會和一九二七年的再組織。一九二三年三月，日本共產黨未曾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也未得到黨的會議的承認，小資產階級幹

部就強迫地把組織解散了，組織解散以後，有所謂共產黨集團時期。把共產黨集團改爲正式的黨，即是恢復第一次共產黨時期之地位，和共產國際也恢復了關係，脫離集團，正式建黨。這就是再建。這次再組織爲了使一直根據從來的，尤其是根據再建大會通過的決議而來活動的黨，更向前發展，一九二七年綱領是絕對必要的。根據一九二七年綱領來把黨在政治方針上和組織形式上根本改組，這乃是再組織的重點。這個再組織的意義就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走共產國際的路綫，肅清了錯誤的領導，根本使黨面目一新。

## （二）從再組織到「三·一五」檢舉

現在講再組織以後日本共產黨的主要鬥爭。日本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綱領而着手再組織，馬上就遇到眼前的重大鬥爭場面，就是總選舉——最初實行普選的國會總選舉戰。在選舉戰中，日本共產黨現實地踏上作爲羣衆黨而發展的第一步，在實踐上表明它能夠成爲工人羣衆的黨，共產黨參加這個選舉戰的目的，首先是爲了推進黨實際的再組織事業，即是首先爲了要以工廠爲基礎而來建黨，其次是爲了擴大黨的勢力，要把這個選舉戰利用到最大限度。

實際上，在這個選舉戰中，黨的中央委員會也曾竭力鼓勵和爭取新黨員入黨。在這

次選舉戰中日本共產黨所採取的方針，根本上的確是按照共產國際第二屆世界大會的綱領中關於議會主義的綱領的根本原則進行的。●共產黨參加議會，就是要暴露資產階級議會的本質，在選舉鬥爭中要促進階級鬥爭的發展，促進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成長，嚴肅地採取推進對資產階級權力鬥爭的方針。無產階級決不是原封不動地把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繼承下來，把它作為自己的機關——這是馬克思理論所指明的。無產階級有自己全新的權力機關，即是蘇維埃，只有由它來奪取並行使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這些事都在羣衆之間毫不隱蔽地大胆地宣傳和闡明了。共產黨雖然參加了選舉，但對於那些要積累改良主義的立法來獲得無產階級的解放以及利用改良主義的立法而升為統治階級的幻想都是斷然反對的。黨參加這個選舉戰，是要從內部來破壞資產階級議會，建立無產階級新的蘇維埃，利用議會作為階級鬥爭的補助手段，當時對一般羣衆宣傳了參加選舉戰的這些目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在選舉鬥爭中把議會主義的幻想盡量散佈於羣衆之間，以議會是國民意志的表現這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處心積慮地來欺騙無產階級。但是共產黨大胆地說明，現在日本社會裏決沒有所謂全民那樣統一的東西，要是有的話，那就是資產階

● 關於議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共產國際第二屆世界大會通過並公佈的關於議會主義的綱領，其中詳細地規定：適應新情況的共產國際的新任務、議會職責的變化、黨對於議會的戰略、對議會派別的組織原則。這是必須一讀的文件。

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通過議會裏面的改良使無產階級上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乃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騙人的話。無產階級只有由羣衆鬥爭，只有由羣衆鬥爭的最高形態的起義和革命，來取得政權。共產黨並不把議會內部的鬥爭當作階級鬥爭的重點，議會內部的鬥爭，完全要服從議會外面的羣衆鬥爭。共產黨也會向羣衆這樣宣傳，階級鬥爭的重點，是議會以外的羣衆鬥爭，議會裏面的鬥爭，不過是廣大階級鬥爭的補助支點而已。共產黨基於這樣的根本方針，面臨着選舉戰，在具體的選舉鬥爭中，就是基於以上的方針，採取了必須由共產黨自己推出候選人的方針。因為當時力量的關係，日本共產黨還不能公然推舉候選人，所以通過當時的勞農黨和其他稱爲大衆黨的無產政黨，特別是通過左翼勞農黨，使黨員出馬作爲勞農黨的候選人。在選舉戰和議會裏面能徹底和資產階級鬥爭的，只有共產黨的組織。爲什麼能這樣呢？因爲共產黨有鐵的紀律，有統一的組織，不論他是怎樣有革命傾向的鬥士，如果不是共產黨的一員，他就不能和資產階級徹底鬥爭。所以我黨雖在嚴重的秘密狀態之下，也是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來進行鬥爭的。

共產黨的候選人，當然要絕對服從黨中央委員會的節制的。這個時候設立了選舉節制特別委員會，各候選人通過這個委員會絕對服從黨指導部的節制，候選人有在組織者直接指揮之下進行活動的義務，而且共產黨的候選人在發表任何政見的演說會上，一步也不能離開黨的原則。中央委員會把共產黨候選人至少必須把這些內容包含在演說之中



的嚴格的演說提綱交給共產黨候選人，要他們絕對服從，演說的時候一定要按照這個提綱。

在黨的嚴格節制之下，黨的議員候選人，站在全國各地羣衆鬥爭的前列，在演說會，羣衆集會，特別是在工廠內部鬥爭，集會或示威運動等之中，都是最勇敢地活動，博得了全體羣衆的信任。在這次選舉戰中，共產黨當然是採取了首先以工廠爲中心的政策，但是爲了爭取迫近農業革命的農民羣衆，共產黨在這次選舉戰中又特別提出了切合農民要求的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這次選舉戰，採用了一九二七年綱領所決定的十三個口號以及與這些口號有關的中心口號——「建立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對於這些口號，當然是要經過一番宣傳的，特別是「建立工農政府」這個口號，這是選舉戰的中心口號，是行列前面的大旗，此外也還有兩三個中心口號，可是結果都集中在「建立工農政府」這個口號上了。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日本共產黨，和當時所謂大衆黨的「無產政黨」有什麼關係呢？關於這一點，稍稍說一說。在選舉戰中，選舉協定成爲問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報紙，對它非常注意，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能推出多少代表。日本共產黨決不單只注意這一點。當時日本共產黨，是剛開始向羣衆黨這個方向進發，許多羣衆還不知道有日本共產黨。各種無產政黨，尤其是革命工農羣衆，都支持左翼無產政黨——勞農黨，他們認爲這是唯一的革命政黨。黨看到這種情勢，所以也不和這些無產政黨機械地對立，

而是採取和它們互相爲用的方針，特別是在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上，是支持它們的，採取和這些無產政黨的鬥爭結合起來，向着共同鬥爭的方向發展，把這作爲無產政黨合併的橋樑的方針。雖然黨來支持這些無產政黨，但是因爲它們決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因此，對於他們的錯誤，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始終保持無情地加以批判並向羣衆暴露出來的自由。

例如當時由大阪推出的社會民衆黨候選人鈴木文治，和在東北出馬的赤松克麿，都是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黨對於他們曾毫不躊躇地加以批判，使一般羣衆離開他們的領導，但是因爲鈴木文治還有一部分羣衆擁護他，他比田中陸軍上將還有人緣，因此，我們也不得不支持鈴木文治，在那個時候覺得他們這些墮落幹部當了選，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利的地方，他們若是在資產階級議會裏暴露了本來面目，總會受到羣衆的彈劾的，所以在選舉的時候來支持他們，也未嘗不可，當時黨是採取了這樣極寬大的態度的。以後實際證明，自從鈴木文治當了選，佔了帝國國會議員的席位以後，很露骨地顯出了他的叛變情形和他是資產階級御用商人的情形。這就像當時日本共產黨所預言的那樣，因此便失掉了羣衆的信仰。共產國際認爲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採取這樣寬大的態度是絕對錯誤的，當時日本共產黨受了批評。若想使無產階級運動發展，若想使共產黨成長，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展開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裏我們認識到一九二七年綱領中的正確領導。

大家都知道，選舉的結果有五十萬張票投於號稱無產政黨裏面的若干政黨，在這五十萬票裏面，有二十萬票投到左翼無產黨，就是投到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節制與影響之下，最活潑、最革命地參加了選舉鬥爭的勞農黨身上。這就是說：日本共產黨在這次選舉戰中，提出了中心口號以後，羣衆向着「建立工農政府」投了二十萬張選票。這還不單是票數的問題，這是日本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氣壓計。這是證明日本共產黨有發展前途的紀念碑。

此外，日本共產黨在勞動組合運動方向上曾受過福本主義的影響，對於勞動組合運動有過低的評價，現在却在「三·一五」檢舉以前，克服了這種偏向，強調黨和勞動組合關係之重要，全力注意於左翼勞動組合的勞動組合評議會的強化，進行勞動組合的統一運動，特別是從羣衆方面通過統一戰綫來進行勞動組合的統一運動，當時採用了這樣的方針，着着促其實現。黨也曾爲援助野田醬油公司從前年後半年起繼續到現在的長期的勞資爭議而進行鬥爭。雖然勞動總同盟幹部拒絕了共產黨及左翼勞動組合的援助，黨和評議會却努力組織了羣衆的援助，爲了使各勞動組合對於田野爭議進行共同鬥爭，共同援助而奮鬥。當時建國會和其他暴力團會有襲擊勞資爭議工人團體事務所的暴行，爲了對抗一切暴行，日本共產黨曾以工廠爲中心組織工人自衛隊，施以軍事訓練，學習抵抗統治階級的種種暴力手段的鬥爭，也對大家宣傳過必須準備武裝起義，要把武裝起義見諸實行。

二月下旬總選舉告終了，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二屆全國組織會議，總結了這個期間各種鬥爭經驗。以前再組織剛開始的時候，開過第一次全國組織會議，這是第二屆組織會議。

第一屆組織會議，是爲了黨之再組織向全國派遣組織者時，黨組織部才把各組織者召來，舉行重要會議，討論怎樣在各地推行一九二七年綱領，會議後把各組織者派到各地，根據會議結果進行活動，這是第一屆組織會議，是再組織的出發點。二月下旬舉行的第二屆組織會議，總結了再組織最初鬥爭的重要經驗，更爲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作了一個重要決議，又因爲這是日本共產黨公然在羣衆之間活動以後總結經驗的會議，所以討論得非常熱烈。結果，通過了幾個決議：

第一是關於黨的組織方針的決議。這個決議的內容，即是在組織方面以徹底肅清過去的宗派主義的殘餘爲急務，強調斷然採用羣衆組織方法的重要性，強調組織活動中中央機關報、地方機關報、工廠新聞報的重要作用，強調應集中努力於有計劃地、有系統地獲得工廠，特別是獲得大工廠。

第二，關於黨的口號也作了一個決議。凡是含有工農民主革命專政意義的口號，都予以承認，對於共產黨提出的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和一般羣衆所採用的確立耕種權的口號，也作了決議。一般的如像羣衆日常鬥爭與黨的口號結合等等的問題，也都決議通過了。

第三，關於作爲大衆黨的無產政黨的合併問題也作了決議。當時這樣規定：大衆黨是工農的政治集團而不是政黨，以此爲根本的出發點，大衆黨的合併，至少要以建立工農政府這樣的口號爲中心來鬥爭，只有在這種鬥爭過程裏，才能有大衆黨統一的道路。

第四個決議，是關於總選舉後各種鬥爭的決議。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總選舉戰中暴露了原形，對於他們要加以攻擊；對於即將到來的臨時會議即位大典的預算進行鬥爭。這些也都決議通過了。

第五，把當時關於勞農一派的決議，在全國組織會議上討論並認可了。要指出所謂勞農一派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現在是國內階級叛逆也是國際的叛徒，承認把他們裏邊一些人開除黨籍。通過了這些重要的決議，就使第二屆組合會議，在黨最初爲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出發點上，留下一個偉大的功績。黨現在真正爲大衆的黨而開始活動了，使羣衆知道自己的政策，羣衆的信仰漸集中於共產黨。

黨在這種情況之下，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鬥爭告一段落的時候，準備開始召集黨的大會。大體是預定四月間開大會，於是起草了新的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勞動組合綱領草案，共產國際的指導者共同參加籌備黨大會預備會議的工作，一位中央委員携帶着這些綱領草案，被派到共產國際去了。正在黨大會的籌備當中，日本共產黨受到最初的大鎮壓即「三·一五」檢舉的襲擊。

從黨再組織以後，到「三·一五」大檢舉，關於黨活動的成績，還有要稍加補充的

地方。再組織把日本共產黨的存在及其政綱對羣衆公佈，給羣衆一種強烈的光明。革命的工人和貧農，一向都認爲勞農黨是唯一的革命政黨，所以站在它的旗幟之下來戰鬥，從日本共產黨公然出現以後，才知道徹底和資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政黨是日本共產黨。革命工人及貧農的進步分子，雖然在勞農黨中積極活動，但是勞農黨的活動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漸使他們的不滿，而現在才發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由於再組織以後，黨公然出現，使共產黨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不僅在量的方面，把工人羣衆吸收了不少，而在質的方面也克服了以前黨內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使黨具有工人黨的實質。

再組織事業在現實方面，黨不單是驅逐了那些不承認一九二七年綱領，背叛了黨和共產國際的明顯的叛徒，對於那些不積極服從綱領，不爲黨的再組織和黨的擴大強化而戰鬥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也斷然加以處置，實行了大清除。在前面講第二屆組織會議關於勞農派的決議的時候，曾談到會議承認開除勞農派，恐怕言之不盡，發生誤解，所以再聲明一下：黨的下層組織對於勞農派明顯的叛徒，已經嚴正地要求聲明他們不是黨內人，要求把他們除名。第二屆組織會議中，各方面繼續苦鬥的組織者，也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勞農黨的問題，認爲黨內有了這些人，黨就絕不能發展；他們是黨發展的障礙，要求趕快把他們驅逐出去。因此第二屆組織會議作了決議，開除了勞農一派的頭目們，黨中央委員會也予以認可。前面說過了，除去這些明顯的叛徒以外，把那些不積極

根據綱領而活動的分子，也驅逐了出去。可是當時未能驅逐淨盡。這在當時，也不可能作到這種地步。當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表面服從共產國際決議，在這樣政治方針之下，也來服從黨。但是在「三·一五」大檢舉以後，在資產階級鎮壓之下，這些分子在實踐上就背叛共產國際的決議了。他們大胆背叛共產國際之處，遠在勞農派以上。這些分子在黨的實踐活動上，在對資產階級鬥爭發展中，纔開始暴露了原形，所以最初這些分子有一部分還留在黨中，也不足為奇。

在「三·一五」事件到來以前，黨已經在工廠中開始有了穩固的基礎。黨的口號，特別是建立工農政府的口號，開始普及於廣大羣衆之間。前面說過了，日本共產黨當初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極寬大的，但是以後知道這是大大的失敗，所以又馬上加以肅清，日本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代理人——社會民主主義者——遂毫不留情地展開鬥爭，黨從當時以普選爲中心，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之失敗中，得了極大的教訓。

大家都知道，「三·一五」事件發生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早晨，動員了全國二十多個檢查局，以共產黨員的嫌疑爲藉口逮捕了將近一千名的工農戰士。

### (三) 從「三·一五」到第六屆世界大會

我想講講從「三·一五」大檢舉到同年夏天在革命之都莫斯科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

六屆世界大會前後黨的活動。

「三·一五」大檢舉的時候，資產階級政府，禁止一切報紙登載，想完全在暗中處分成千成百工農先鋒分子。還故意捏造說發覺了有像暴動團、暗殺團那樣的陰謀。資產階級反對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這次檢舉這樣說：這是田中內閣爲了掩飾干涉選舉的失敗；有的說：選舉的時候，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發出皇室中心主義宣言以後，很不得人心，爲了遮羞，並且作爲下屆議會克服困難的方策，才以政略手段實行了這次檢舉。他們作了這樣溫和的批評。這些批評却是抹殺了這次檢舉的階級的意義，所以共產黨馬上告訴大家，這次檢舉不是旁的，而是對工人階級先鋒隊——日本共產黨——的鎮壓，是對於工農先鋒隊的鎮壓和檢舉。並指出其次就要輪到鎮壓工人羣衆團體了，於是使他們組織羣衆的抗議運動，使種種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等羣衆團體，站在共同鬥爭的戰綫上，抗議資產階級這種狂暴的鎮壓。黨中央委員會感覺到必須把這次檢舉事件的真相，明白揭發於羣衆之間，要使羣衆都普遍地知道，這才把以下的意義，普遍告訴一般羣衆。

第一，日本資產階級受到了中國革命的威脅，爲了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在中國的權益尤其是在滿蒙的權益受到威脅，所以感到有用武力干涉中國革命的必要。不僅這樣，圍繞着中國問題並以日本爲主的各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傾軋日趨激烈，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之危機，越來越迫切。不待分說，日本帝國主義在未來的戰爭中，不得



不充當一個大角色。迫於這種情勢，日本資產階級政府纔進行了對於共產黨的大鎮壓。爲什麼要鎮壓呢？就是因爲日本共產黨提出支持中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並且真正爲這些口號來進行鬥爭，並提出了「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內戰」，「希望本國政府打敗仗」這樣的口號。所以實際和本國資產階級鬥爭者只有一個日本共產黨，所以日本共產黨是和資產階級毫不相容的敵手。這樣可怕的共產黨，若令其安然無事地展開活動和成長，那就不能圓滿地進行爲資產階級利益而犧牲羣衆的戰爭了。他們是在這種意義上來進行鎮壓日本共產黨的。

第二，日本資產階級特別是自從金融恐慌以來，更加強烈地實行激烈的野蠻的產業合理化政策。他們感覺到必須鎮壓在日本共產黨影響之下的對產業合理化展開鬥爭的革命工人，這是鎮壓日本共產黨的第二理由。

第三，在農村方面農業革命很迫切，這表現在各種農民暴動的形式上。資產階級面對着這種危機，爲了鎮壓農民的起義，對於農民唯一信任的領導者和朋友——爲沒收大地主土地使土地歸農民而鬥爭的日本共產黨——那是一定非鎮壓不可的。因此日本資產階級就實行了這次大檢舉。

我們日本共產黨把這些事毫無遺留地告訴了一般羣衆。

共產黨着手恢復由大檢舉所破壞的再組織和機關，四月末就又恢復了全國的聯絡，就連「赤旗」的復刊也作到了。關於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以前忘記談起，現在稍

稍補充一些。日本共產黨有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是黨再組織以後的事，以前沒有。這個黨的中央機關報，在激發羣衆的鬥爭上，在傳達黨的政策於黨員及黨外革命工人羣衆上，在使羣衆信任黨中央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了這個報紙以後，中央委員會從黨大會到其次的大會中間的活動，在羣衆之間樹立了強有力的影響和信仰，在使黨和羣衆的團結上，它起了絕對的作用。有了這個黨的中央機關報以後，日本共產黨就真能充分地進行大衆的組織運動了。「赤旗」遭了「三·一五」事件，雖然在短期內曾停刊一時，可是剛纔說過了，到四月末就已復刊，並且比以前更有定期，比以前發行得更加頻繁。在鎮壓之下，黨的旗幟在羣衆之間更樹立了堅強的威信。

沒有被檢舉的黨員和黨外革命工人及同情者，冒着檢舉的危險，冒着這次檢舉及檢舉以後接連不斷的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的鎮壓的危險，自動地爲了再組織工廠支部而活動，爲了已被破壞的羣衆團體之再建，爲了創立各種團體機關，爲了動員羣衆組織抗議檢舉運動而進行活動。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是在明中或暗中支持着對共產黨的檢舉，他們對於羣衆反對檢舉的鬥爭是不合作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樣說：日本共產黨有廢除君主制的口號，那末今天由資產階級政府來鎮壓乃是當然的。他們說檢舉共產黨是正當的。這樣公然不知羞恥地對於資產階級和君主表示忠誠，而成爲資產階級國家安寧的幫手。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說：共產黨作得太過火了，又說共產黨戰術用錯了，他們對於在資產階級血腥鎮壓之下而來戰鬥的共產黨，散佈一切惡毒的宣傳。這樣，他

們實質上就是幫助了資產階級的檢舉和對無產階級運動的鎮壓。

就在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成爲莫逆的期間，資產階級政府更進一步，於四月十日斷然解散了三個羣衆團體：勞動組合評議會，勞農黨，無產青年同盟。日本共產黨對於這三個團體的解散，看作是「三·一五」事件的繼續，乃着手宣傳組織羣衆的抗議運動，並成立了支援反對暴壓同盟。這個時候，勞農黨內部小資產階級幹部，在勞農黨被資產階級政府解散以後，要在合法範圍以內再來結黨，他們表現了這樣失敗主義的傾向；我們共產黨斷然反對這樣作，我們主張以勞農協議會來進行戰鬥。在資產階級鎮壓和禁止勞農黨活動之下，小資產階級分子要在政府許可範圍內再來結黨。勞農協議會對這樣的失敗主義者，進行了鬥爭。當時黨對於號稱是工農政黨的無產政黨之中的小資產階級階級性的想法，在勞農黨被取締的時候，已經表面化了，因而主張與其靠這樣的勞農黨來鬥爭，不如靠工農協議會的組織來進行鬥爭。

黨在勞動組合評議會解散後，更爲了立即再建評議會而進行戰鬥。把鬥爭和以產業別的合併運動結合起來。以用產業別的評議會之組織爲基礎而加以強化，把這當作再建評議會的運動。

對於無產青年同盟的解散，我黨首先採取再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方針，並且着手於

● 無產青年同盟創立於一九二五年八月，辦公處設在大阪。

這個方針的實現。在「三·一五」檢舉和四月十日的鎮壓以後，日本資產階級出現了完全白色恐怖的世界，在這白色恐怖之下，我們共產黨站在各羣衆團體的前列，毫不退縮，在羣衆之間更展開了強烈的鬥爭。

日本共產黨在瘋狂的白色恐怖之下，首先把力量集中，對日本資產階級出兵中國以及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進行鬥爭，對它的戰爭準備果敢地進行了鬥爭。資產階級爲了對付帝國主義戰爭危機有對我黨進行「三·一五」檢舉的必要，這樣正確的意見，馬上得到證明。四月十日解散了三團體以後，四月下旬政府聲稱中國國民北伐軍威脅日本權益的根源地滿洲和華北，乃由熊本、廣島、久留米各師團編成混成旅團而出兵中國，惹起的事件即是五月三日的濟南事件。濟南事件，乃是日本資產階級犧牲住在山東濟南街上的日本私賣鴉片者和娼妓，挑撥起和中國軍隊的衝突。大家都知道，國民軍方面最初希望日本僑民撤退，爲了撤僑出些費用也可以，曾向日本政府交涉過，而日本資產階級在所謂就地保護的名目之下，堅決要居留在中國領土內以確保其勢力範圍。

對於濟南事件，日本資產階級竭力宣傳，說許多日本人受到殘酷的虐殺，這樣來努力鼓動所謂「愛國心」，挑撥排外的敵愾心。但是濟南事件明明是日本資產階級爲了侵略中國而利用的一種藉口。田中內閣在臨時議會，藉口濟南事件，馬上要求三百萬圓預算，更把名古屋第三師團、廣島通信隊、各務原飛行隊，都調到中國領土上和國民軍作戰。田中內閣既已爲了武力干涉中國耗費了四千萬圓，把數千名士兵調到中國領土上，

使他們冒着砲火的危險，此外更把一億五千萬圓的「剩餘金」，爲侵略中國而自由使用，這真是帝國主義厚顏無恥的政策。

日本對中國這樣的侵略，一方面却和美國的對立尖銳化了。當時美國政府不承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權益，公開提出抗議，認爲日本出兵中國是不法行爲。日本政府當然也預想到美國政府的抗議，他們對於美國的抗議，一步也不表示退讓，他們只有加強和美國一戰的決心，表示出什麼時候都可以以中國領土爲舞台，斷然和美國一戰。日本共產黨看透了內外情勢，揭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周密地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陰謀，而倡導無產階級和農民應該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我們黨在當時，通過黨的種種機關，得到了一些日本帝國主義者具體準備對美戰爭的實際證據。當時東京砲兵工廠僱了六百五十名臨時工開始加緊製造武器。福岡的渡邊鐵工廠也急速開始製造水雷發射管，中島飛機製造廠、名古屋內燃機工廠、川崎造船所等，驟然開始製造五百架陸軍飛機。僅由這一點事實，也可以證明備戰之一端。

黨在這個時候，雖然處在整個組織被破壞狀態與滿身創痍狀態之下，仍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出兵中國，站在羣衆前列進行鬥爭。中央機關報「赤旗」首舉義旗，其他機關也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日本共產黨在這時候和中國共產黨的同志開了共同會議，決議共同發表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日兩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實質上共同公然進行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就說明日本共產黨以前那種極微弱的

國際主義，現在得到強有力的發揚，這是中日兩國無產階級友愛提携的範例。

我黨響應了汎太平洋勞動組合會議爲反對日本對華干涉而鬥爭的號召，動員了勞動組合評議會和其他勞動組合，組織反對對華干涉的羣衆鬥爭，結成了反對戰爭同盟。黨向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用兵進行鬥爭，在全國重要都市，或用演說會或在工人集會上或組織公開的、秘密的示威運動等，常常站在大衆前列來戰鬥的。但是我黨反對對華武力干涉，絕不是發些傳單作些演說就算完事，還對日本的出征軍人不斷進行頑強的宣傳，勸他們不要爲資產階級利益而戰爭。隨着佔領濟南和決定第四次出兵，正在調動名古屋第三師團的時候，我黨黨員和在黨影響之下的革命工人，尤其是年輕的青年戰士，對於名古屋第三師團，最勇敢、最不怕犧牲地進行了反對出兵的宣傳運動。在名古屋金魚虎（日本有名的古蹟——譯者）之下，到處發現了反對戰爭的「不穩」的傳單，這些事使資產階級驚愕，遂將治安維持法修改爲死刑法。當時司法大臣曾經解釋治安維持法之必須修改爲死刑法的理由，不是要消滅共產黨，而是說共產黨妨害了對華戰爭、妨害了帝國軍隊出征。這些足以證明，當時日本共產黨和革命工人，尤其是青年戰士，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之自動的和拼死的鬥爭，是非常活躍的。我們黨爲了制止向中國運軍隊和武器，曾向工人宣傳，使他們不要運武器和軍隊，在海陸交通工人方面，也實際進行過有組織的活動。

我黨受「三·一五」的打擊以後，又在接連不斷的官憲追究和瘋狂的白色恐怖之

下，還這樣頑強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這說明日本無產階級已經壯大起來了。日本共產黨在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鬥爭，就是爲撤銷對革命工人加以死刑的治安維持法而進行的鬥爭。對於這個越修改越惡劣的治安維持法——對付日本共產黨的法律，反無產階級的法律，反共產主義的法律——我們黨知道必須站在羣衆前列進行鬥爭。當時田中內閣把被議會所撤銷的治安維持法，僅過了十天又提到內閣會議，以緊急勅令來頒佈它。我黨對於這件事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治安維持法的社會根源，就是要維持日本資產階級對工農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就是爲了這個才非把治安維持法改爲死刑法不可，這是從日本資產階級骨髓裏生長出來的慾望，所以對於治安維持法的鬥爭，必須是顛覆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若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作徹底鬥爭，專等待治安法之鬆弛或廢止，專等待這樣可喜的和平日子來到，簡直是夢想。所以必須把這件事情暴露出去，和羣衆對資產階級國家權力的鬥爭結合起來，進行反對修改治安維持法和要求撤銷治安維持法的鬥爭，並使這種鬥爭和反對日本出兵侵略中國的鬥爭與對華不干涉的鬥爭，發生密切關係。黨把它兩個結合起來展開鬥爭。我黨並在羣衆之中，提出立即釋放「共產黨事件」被捕者的口號，組織羣衆進行「釋放共產黨事件被告」的運動。

這樣，在對治安維持法的鬥爭和釋放共產黨事件被告的鬥爭中，我黨站在前列推動了工農革命運動。可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及社會民衆黨，日本勞農黨以及所謂勞農一派，對於治安維持法的鬥爭，明中暗中都是拒絕的。他們的確也講過反對修改治安維持

法的話，可是他們是怎樣講的呢？他們說用緊急勅令來修改治安維持法明明是忽視憲法、藐視議會的違憲行爲，規避召集議會履行手續的期間，而却以緊急勅令來頒佈，這簡直藐視議會太甚了。他們的理由就是這樣。他們又說：日本共產黨是「思想的犯罪」，處罰或防止「思想的犯罪」，反而要給社會帶來惡影響的。對於思想運動徒然處以極刑，這不過僅是法律的野蠻而已，並不能收任何效果。他們除去對日本資產階級進行親切的忠告和幫腔以外，對於治安維持法沒有任何實際鬥爭。不僅這樣，他們還拼命防止羣衆參加反對治安維持法的鬥爭，尤其是他們自己支配之下的羣衆。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鬥爭，即是對於五十五次臨時議會的鬥爭。在這裏不用說是要反對對華出兵的三百萬圓的預算的，並且提出了立即召回派遣到中國的軍隊和軍艦的要求，向羣衆進行宣傳；也反對修改治安維持法，並且要求撤廢這個法律；更進一步的，是尾崎行雄當時提出的三大國難決議案，原原本本地表現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和資產階級受到共產黨發展的威脅所引起的恐怖，這三大國難決議案，是最卑劣、最陰險的御用代辯詞，我們黨首先反對這三大國難決議案；又對於檢舉共產黨和解散三團體之不當，也在議會裏進行羣衆鬥爭的活動；此外並且反對議會所提出的大典預算，即是反對爲祝賀天皇即位而從國民榨取七百萬圓的大典預算。所謂無產黨員却也暴露了徹底的叛變的面目。他們戴着絲織的高帽子，穿着燕尾服，被召於豐明殿，喫個酒醉飯飽，醺醺然一歪一歪地退出來的照片等等，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都登出來了。我黨對於



這種最大的叛逆，毫不饒恕地、毫不留情地進行揭露和彈劾，向羣衆指出：這樣的無產黨議員，決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利益，而對他們在羣衆之前加以猛烈的攻擊。資產階級走狗社會民主主義者，早在十年以前，在勞資爭議和農民爭議上，喫了資本家和地主的香餌，把罷工和農民爭議向資本家和地主出賣了。他們是作爲資產階級國家壓迫工農的一種機關而活動的。這一點，由他們自己的言行明顯地表現於羣衆之前了。

當時我黨在農民運動方面，在白色恐怖之下，曾對於一部分農民的動搖和領導者的右傾進行鬥爭，反對右翼農民組合合併運動，主張由各地農民在對地主及資產階級政府實際鬥爭中，來進行合併。並努力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

我們黨領導了東京電燈公司爭議，和社外船●裁員的鬥爭。還有北海道的選舉和富山方面電燈公司的爭議，我黨也給了很大的援助。

從「三·一五」大鎮壓到這一年的秋天，我們黨有了顯著的發展，雖然又受到接二連三的八月檢舉和十月檢舉，雖然在治安維持法、死刑法、警察暴力團瘋狂的白色恐怖之下，在政治方面我們黨却一步也不退縮，站在無產階級前列進行鬥爭，這說明共產黨已經具備空前的強有力的根基。這時候我們黨若在政治方面後退一步，也許又回到一九

● 日本的航海事業，大部分都被壟斷資本家的股份公司（株式會社）所壟斷，社外船是指這些股份公司以外的輪船公司。——譯者

二四年解黨的悲慘命運，可是現在我們黨斷不是這樣，反而在困難的情況中壯大起來了。在日本史無前例的大鎮壓和白色恐怖之下，黨有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不但一步也不會退却，相反的，却向前進了。日本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之下的進步與成功，在客觀方面來說，乃是因為有了日本資本主義已經難以維持下去、工農羣衆更左翼化、更革命化了的有利的條件，而最重要的乃是日本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頑強鬥爭，和公開在羣衆之間提出黨的政策來進行活動，黨有了這樣主觀條件，工人羣衆纔自覺地爲黨的再建和發展而來戰鬥。黨在機關報上公開發表政策，還有其他一切秘密機關和各種集會的組織，公開在羣衆之間進行獨立的活動。如果不是這樣，我想客觀條件就是怎樣有利，在白色恐怖之下，黨的再建和發展能這樣迅速，乃是不可能的。這種情況，我們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絕對見不到的。若是一檢查這個期間日本共產黨活動的成果，那末，在「三·一五」以前，日本共產黨在工廠中發展的組織，此時已發展到在大工廠中獲得了基礎，在大工廠裏築成了強固的堅城的地步。在這個時期黨反對對華干涉、反對對華用兵，把國際主義發揚到很高的地步，這一事實很重要，沒有這些，黨是發展不起來的。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鬥爭，指出最重要的出發點，一方面走進社會民主主義者蒙蔽之下的羣衆裏面去使他們傾聽黨的政策，另一方面，甚至在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牙城總同盟及其他右翼組合之中，也發展我黨黨員、發展黨的秘密組織，使右翼組合產生革命的反對派。

最後再談一談這個時期黨和共產國際結合的問題。雖然在白色恐怖下可是黨仍然冒着種種危險，努力加強與共產國際聯絡，使黨與共產國際領導的結合比從前加強了幾倍。共產國際政治局五月四日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包含對當時黨的活動之重要批判的決議以及其他共產國際領導者有力的指示等，空前頻繁而且迅速地帶到我們黨裏來了，使我們黨的活動不斷得到正確的領導。能作到這種地步，不能不說是偉大成績之一。

我們黨在繼續發展之中，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開了會，以有劃時代重要意義的共產國際綱領爲首的各種重要綱領，都帶到日本來了，這給日本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運動以很大激勵。以下我來講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的意義。

## 六 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以後

### (一) 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一九二八年綱領）

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九月初，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大會開會時候的情況，正是整個國際資本主義在暫時的相對的穩定之際，從各方面暴露了新危機，即所謂戰後資本主義進入了第三期。以中國大革命爲開端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火焰，到處燃燒了起來，使帝國主義世界發生動搖。正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第六屆世界大會開了會。這也是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瘋狂的時候，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直接成爲工人階級敵人的時候，也即是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相結合而結成社會法西斯形式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國際開了大會。各國無產階級現在都起來和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者展開激烈的、拼死的鬥爭，和自己陣營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展開鬥爭，他們都感覺到這些是緊急而又不可避免的任務，在這種情勢之下，共產國際開了第六屆大會。

這次大會是一九二四年第五屆大會之後，累積了四年國際革命運動經驗以後所舉行

的大會，也是討論和決定作爲最初的無產階級世界綱領的共產國際綱領之重大會議。我們日本共產黨雖然受到「三·一五」檢舉的打擊，也決計派遣幾位黨代表，參加這樣重要的共產國際世界大會。從日本國內派幾名黨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世界大會，這在以前是不會有過的事，這是共產國際發展和日本共產黨發展的一個證據。

這次大會重要議題，第一是共產國際綱領，第二是國際情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綱領，第三是國際情勢的中心即帝國主義戰爭危機綱領，第四是殖民地革命運動綱領，最後是關於蘇聯情勢的決議。從世界各處來的黨代表，對於各種重要決議，進行了長時間的熱烈討論，一同盡力來製成這些綱領和方針。

大會很注意日本革命運動之發展，在國際情勢綱領中，強調日本共產黨本身首先要向羣衆性的黨的方向發展。更必須爲了爭取勞動組合而鬥爭。也必須領導農民組合。

大會所決定的日本問題的決議中，強調黨首先要羣衆化，要從羣衆裏面吸收黨員（現實目標爭取五千名黨員），確立並強化工廠支部特別是要爭取大工廠，確立地方委員會，尤其是要在大工廠密集的大工業都市中，確立大都市委員會，並強調發揮主動的、積極性的活動的重要性。在勞動組合運動方面，更強調勞動組合和共產黨都是無產階級運動中很重要的組織。又指出應盡力於評議會再建的鬥爭，並爭取青年工人及婦女工人，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上推動勞動組合運動，特別要爭取大工廠，最後要在改良派勞動組合內組織革命的反對派。以上幾點都是大會所強調的。

其次，關於公開的無產政黨問題，極簡單地講幾句。關於公開的勞農政黨，共產國際不單是把日本，更把南美、印度、保加利亞的歷史也蒐集起來，在殖民地革命運動綱領中說明，站在工農小資產階級這樣兩個以上的階級融洽的基礎上的黨，雖然在某一定時期有革命的性質，可是那個時期一過，就容易成爲小資產階級的黨，因而規定共產黨決不能是這樣的黨。基於這樣的觀點，指出必須強調日本勞農黨雖然多少起過些革命作用，可是共產黨要對勞農黨和左翼政黨表明它的根本的羣衆性質，只有共產黨纔是無產階級的黨，是工農唯一的良友。在農民運動方面，強調要在沒收大地主土地、土地歸農民的口號下，進行宣傳，不僅組織以前那種佃農對付地主所成立的佃戶組合團體，更必須使它成爲廣泛的貧農羣衆的鬥爭組織；更強調共產主義者必須領導農民起義。

最後關於黨的宣傳方面，強調要沿着導向革命鬥爭的平坦的列寧主義路綫，以宣傳文件動員羣衆，舉行羣衆示威運動；不管資產階級許可不許可，必須要舉行公開的或秘密的羣衆示威運動，必須要從重要工廠直接到街頭去動員羣衆。這一次大會通過了這種意義的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這個共產國際第六屆大會的決議，在這一年秋冬之間到達了日本，如前所述，這次大會使日本共產黨向前躍進一步上起了鼓勵的作用。

這個時期日本的一般情況，一點也不會緩和，比半年前「三·一五」檢舉的情況更加尖銳了。首先，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依然佔領中國領土一部分；其次，日英美的對立也更加厲害。中國民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猛烈反抗，使日本軍漸趨不利，而這些不

但不曾緩和帝國主義戰爭危機，却更使危機向前發展。日本資產階級爲了隱蔽帝國主義的備戰和對工農的鎮壓，爲了進行順利，花費了許多錢，來湊一番即位大典的熱鬧。日本政府爲了使這個大典平安無事地進行，聲稱是爲了警備，把數千工農戰士逮捕下獄，施以種種野蠻行爲。實際上，即位大典是以工農的血來祝賀的。把治安維持法修改爲死刑法以勅令強行，這說明日本國家的法西斯化更加尖銳，更加露骨了。現在日本已和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及波蘭並駕齊驅，成爲世界屈指可數的白色恐怖國家。

「三·一五」事件和三團體的解散，暫時減低了工人的鬥爭情緒。但是在這一年六月，工人就跳出了改良派幹部的抑制，羣起罷工，衝破了壞幹部的壓抑，爆發了社外船的罷工鬥爭；在七八月間，又發生了東京市電車公司的爭議。由於「三·一五」事件和三團體的解散，農民運動雖然一時受到障礙使內部機會主義得以抬頭，而現在却更深刻化起來了。資產階級報紙曾公然說過，工農鬥爭一時減退的原因不是旁的，而是由於資產階級對共產黨所加的鎮壓。資產階級報紙把這種事明明白白地招認了。另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者醜惡的叛變，也在光天化日之下現了原形，他們越來越使羣衆感覺他們是最下流的資產階級的伙伴。

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重要政治決議的精神，爲黨的羣衆化和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前進。

## (二) 從共產國際第六屆大會到「四·一六」

現在講一講從共產國際第六屆大會各種決定帶到日本以後，到「四·一六」檢舉之間，日本共產黨的重要活動。這個時期雖然短，却是黨偉大的發展時期，黨有各種重要活動。

第一、共產國際大會國際情況綱領中，曾強調日本共產黨本身必須沿着羣衆性的黨的道路前進，我黨即在實際活動中實現這個方針。而恰好正在這個時候，就遇到自「三一五」以來的數次檢舉，使黨蒙受了打擊。正在想恢復辦法的時候，却又碰到新的檢舉。在新的檢舉和不絕的窮追之下，全體黨員和革命工人，一點也不畏縮，爲了保護黨，爲了使黨更加強化和發展，都是在自我犧牲地努力活動着。當然，這幾次檢舉的打擊，黨是蒙受了損失的。但另一方面，工人羣衆的革命壓力，只有越來越高漲。日本共產黨的組織力趕不上羣衆革命壓力的高潮，因此兩者之間，曾發生了不均衡的狀態。黨很容易有陷於孤立的危險，可是由於全體黨員熱心活動，及根據第六屆世界大會的決定爲更加羣衆化而鬥爭，日本共產黨纔能把工人羣衆革命熱潮引導過來，使它成爲自己的力量。

黨曾爲羣衆化而鬥爭，第一是盡力宣傳只有共產黨纔是工人階級唯一的黨。在現實



方面，特別把新黨準備會（「三·一五」）以後，於四月十日被政府所解散了的勞農黨的後身）及勞農同盟（新黨準備會十二月末完成組黨工作被政府禁止以後，為獲得政治自由再來組織勞農同盟）等左翼勞農政黨的革命精華，吸收到組織裏面，而把它作為我黨羣衆化的重要力量。這就是我黨在現實方面所採取的方針。

黨對於羣衆化這件事，並不認為單在數量上增加黨員。為了使黨羣衆化，共產黨熱心參加為保護並擴大工農日常利益而發生的鬥爭，並且站在他們前列來戰鬥，和改良主義集團即是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叛變行為來進行戰鬥，並為着對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鬥爭而努力在工廠和貧農集結的村落中，爭取積極分子。

黨特別在大工業都市中在重要工業和軍需工業的大工廠中，為爭取工人，着手進行頑強的有計劃的鬥爭。革命工人一接觸到我們黨這種組織活動，即一接觸到從來還不會充分發揮的黨的政治的組織的活動，便發揮了自己的積極性從而參加到裏面來了。

黨提出在工廠農村組織支部的口號，在十二月初復刊的黨中央機關報「赤旗」上，明確地發出黨的羣衆化的號召。工人羣衆，特別是勞農同盟之中，以往在共產黨影響之下進行政治鬥爭的革命工人，對黨的信任越來越加強，多數工人都自動跑到黨的門前來了。

爲了把這些來到黨門前的羣衆迅速地爭取到組織裏來，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九年二月提倡黨外革命工人羣衆自動組織日本共產黨支部，因此，給新黨員開闢了一條集體

入黨的道路。

日本共產黨倡導黨外工人羣衆自動參加黨的組織活動的號召、給集體參加黨開了一條道路，我想這在特殊情況之下，是很有必要的。以前勞農黨的革命羣衆在工廠和一部分農村曾自動創立活動集團，黨的組織者如果來到這裏的話，就不像以前那樣很多都是個人參加的。現在實際上有在一定目標和一定方針之下進行集體的、有組織的活動的革命工人團體存在；他們響應這個號召，等待着黨去組織他們。他們成爲黨在「四·一六」大檢舉以後，黨再組織的不絕的新源泉。

把強暴而殘酷的鎮壓法即治安維持法，提高到死刑法；日本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因使用這個殘酷的法律，把全國弄到雞犬不寧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消說，黨特別認爲有鞏固秘密組織的必要。共產國際給我黨的指針上說，強大的建築物，必須建築在鞏固的地下組織之上。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必須十分注意這一點。

我們黨就是這樣地在黨的活動方面爲黨的羣衆化而進行活動，在這個運動中，我黨特別注意在大工廠方面集中組織運動，同時黨在各階級中的領導機關裏，更努力提拔工人成分，特別是實際在工廠中作工的就業工人。實際上把在工廠作工的革命工人，選拔到黨的領導機關裏來，照普通的想法是有許多困難的，但是我們黨努力克服這些困難，認識到把工廠中的工人爭取到黨的領導旗幟之下是絕對必要的，並爲實現這種方針而努力了。

另一方面，日本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因為有中央機關報「赤旗」和其他種種黨的文件，以及全體黨員有組織的活動，已為廣大的羣衆所熟知；大衆都支持黨的方針政策，申請入黨的熱情越來越高。同時陸續由小資產階層流入無產階級分子成爲黨的同情者，這種小資產階級同情者，在黨的周圍越來越多。但是除小資產階級的同情者以外，我們共產黨所真正尊重的同情者當然是工廠工人和產業工人。這些工人成分贊成黨的政策、支持黨、和黨共鳴，但還不會參加黨的組織；他們纔真正是共產黨所尊重的同情者。黨員當然應該進行有意識的積極的活動，把這些同情的工人，趕快地吸收到黨裏來。然而另一方面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同情者，在黨的周圍，口裏不絕地說些極革命、極左的言辭，表面上表示極端擁護黨，可是一遇到困難，或是情況一變，立刻又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本性，在革命的左傾的調子很高的言語行動裏，忽然右傾、忽然動搖起來了，最厲害的還有叛變行爲。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同情者，雖然也稱爲同情者，可是我們黨痛切感到，必須把這些人和真正爲共產黨所尊重的革命工人同情者，嚴格地區分開。這些小資產階級同情者，特別是在黨的力量應付客觀情況還比較弱小的時候，充分有直接影響黨的方針、損害工人真正的革命方針的危險。

舉當時兩三個現實的例子來說吧：在東京市議會選舉戰中，以勞農同盟爲中心而組織的選舉鬥爭同盟，提出了「創立工人無產市民的市議會」的口號。如後所述，這是在黨的周圍和黨接近並打算在日本共產黨方針下來活動的小資產階級同情者所採用的極露

骨的小資產階級口號。

其他的例子，像改正檢閱制度期成同盟<sup>①</sup>。我們黨也提出了撤廢檢閱制度的口號，採取成立羣衆組織而使它進行戰鬥的方針；可是却給了黨周圍力量比較微弱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一個很大的影響，使改正檢閱制度期成同盟，提出了小資產階級動搖的口號。對於這一類小資產階級同情者，我們黨一方面並不否認他們在黨外各種活動中所起的或多或少進步作用，一方面必須採用一切手段來防止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侵入到黨內各種重要活動之中。

「四·一六」檢舉以後，若是實現了以上的方針，那末，隨着鬥爭的發展，自不待言會有更重要的意義。可是不能不說當時僅是採用了這樣的方針，並未充分實現。

但是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廣大的羣衆信任和擁護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越來越羣衆的黨，可以認爲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展。實際上我黨當時羣衆化的前途，極爲有希望。

我們日本共產黨能沿着羣衆化的道路前進，和勞農黨的新黨準備會，即以後成爲勞農同盟的新黨準備會有密切關聯。因此，我想必須講講我們黨對於新黨準備會和對於以後的勞農同盟的方針。一九二八年春天，勞農黨解散以後，勞農黨內部小資產階級領

① 檢閱制度是指日本統治階級檢查出版物的制度。——譯者

導者的極大的動搖、我黨的強有力的活動、新黨準備會內部越來越強烈的工人革命潮流……這些不想詳述，可是應該指出：所謂百度解散百度結黨的百度結黨主義，在秋天的時候，反回到無法形容的失敗主義的公開的結黨方針裏去了。新黨準備會的小資產階級本質，完全暴露出來了。他們取銷了「建立工農政府」的口號，說什麼新黨是大眾黨而不是共產黨，新黨不是以社會組織及經濟組織之變革爲目的。露出了這樣空前未有的右傾主義、機會主義。這是在階級鬥爭激烈發展之下，暴露了與共產黨不同的小資產階級黨的本質。

共產黨首先反對在新黨內抬頭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相反地，却支持新黨準備會內革命工人的潮流，即是支持不取銷「建立工農政府」的口號而使新黨準備會向組黨之途邁進的運動。我黨在這時候，當然是立腳於共產國際第六屆大會的殖民地革命運動綱領中關於工農政黨的規定的，而那些建築在工農兩階級所湊合而成的政黨，雖然一時有它的革命性，時間一久就容易轉化爲小資產階級的黨。黨根據這種規定，會努力解釋並宣傳無產階級黨只有共產黨，工農兩不同階級湊合起來的勞農黨及一般工農的政黨，不能成爲我們真正的政黨。同時，若僅是這樣宣傳，就很難堵住新黨準備會向革命的組黨來發展的澎湃的潮流，而且若堵塞的話，事實上會使黨向後退。從這種見地上來看，就認識到我們黨和羣衆之間事實上存在着裂痕，所以不如支持這個革命的組黨潮流而加以領導，於是就把這個潮流利用到共產黨的羣衆化的方針上。羣衆在這個時候，若單由於

宣傳，是不能使他們捨掉勞農政黨的傾向一舉而參加到我們黨裏來的，必須使向着革命的結黨前進的羣衆，在推進結黨運動中和資產階級政府衝突以後，由他們自身的經驗，使他們知道能和資產階級國家權力真正抗爭的黨，不是工農湊合起來的黨，使他們學習到這樣的黨是不能追求的，非追求共產黨不可。這是我們當時工作的根本方針。

十一月初黨受到檢舉，剛剛出刊的「赤旗」再刊號，又不能發行，因此，不得不採用其他方法來宣傳這種方針。可是在宣傳上多少發生了些困難，也是事實。這種方針——以後作爲對待當時勞農黨的根本方針——得到了革命工人絕大多數的支持，十二月二十五日遂開了組黨大會。我們黨把這個組黨大會當作共產黨本身羣衆化的宣傳舞台，或用公開的或用秘密的手段，把它利用到最大限度。因此在這方面得到了成功。

新黨準備會的組黨大會，不用說，遭到了資產階級的解散。我們黨首先發動抗議運動，使廣大的羣衆知道，共產黨的羣衆化，共產黨是資產階級解散不了的黨，號召向來在新黨準備會熱心活動的工人參加到我們黨裏來，同時爲領導這廣大的工農左翼精華來組織工農同盟而進行活動。這首先是在抗議最初的勞農同盟、新黨準備會組黨大會被強制解散的意義上，把它當作抗議鬥爭的一種組織，然後把它再組織起來，成爲獲得政治自由的勞農同盟的組織而使它完成鬥爭任務，這就是黨的方針。但是勞農同盟成立不久，隨着時間的迅速推移，一方面內部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動搖、機會主義的抬頭和對政府屈服的傾向，使同盟有再停留於勞農政黨境地的趨勢。當然同時在相反的方面，就是

當勞農同盟和資產階級政府展開鬥爭的時候，在勞農同盟運動必須走向共產黨羣衆化的道路的方針之下，也曾有過自發地活動的革命工人分子。

這兩個矛盾的潮流，我們黨非徹底解決它不可。在我們黨的陣營內，在黨的影響之下的左翼勞動組合的陣營內，以及在革命的貧農之間，都還有對於舊勞農黨的留戀，對於只有共產黨纔是無產階級的黨還有疑惑，對於共產黨能成爲羣衆性的黨這一點，也有一部分人缺乏鐵的自信；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有的認爲共產黨誠然是第一黨，可是在現在日本情況之下，還應有一個工農的政黨來支持共產黨，對共產黨不斷輸送新的力量，成爲黨的貯水池，成爲黨與羣衆之間的紐帶。這樣的空氣曾經濃厚地存在着。只要有一點點認爲共產黨以外還要有另外特殊的政黨這樣的思想，這在階級鬥爭發展中乃是和黨的羣衆化顯然相矛盾的思想。可以斷言，這骨子裏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思想。

這種動搖還不是像被一小撮金融資本家所自由操縱的資產階級政黨那樣的分派，這只是證明無產階級羣衆對於只有共產黨才是絕對統一集中而組織堅強的政黨，沒有充分信心。我黨爲了肅清這種動搖與懷疑，必須堅決地採取革命手段，使勞農同盟解體。現在的勞農同盟，不應該使它改頭換面，而是要堅決地使它解體，但是解體後必須要把勞農同盟裏面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工人吸收到日本共產黨裏面來。若不是這樣，就說不上是勞農同盟解體。把勞農同盟的革命勢力組織到日本共產黨裏面去，纔能使勞農同盟真正入於解體。這是從三月到四月在黨中央的會議上，把以前許多經驗加以綜合地集中地批

判以後所得到的解決辦法。

爲了這樣解決，就必須肅清關於以前長久存在於共產黨及左翼裏面的統一戰綫黨——一般叫作勞農政黨統一戰綫黨——的舊見解。這些決定是我黨在四月檢舉以前的見解，當時只有少數人知道。但是應該強調這種決定在當時有極重要的意義。

在日本所謂統一戰綫黨，最初本來是我們共產黨所主張的。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日本共產主義集團的政策，特別是爲了在羣衆裏面爭取農民，認爲必須組織工農反對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鬥爭同盟，使作爲無產政黨組織運動的先鋒。但是當時日本共產黨統一戰綫的主張，與一九二八年勞農一派所主張的爲了掩蔽自己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民主主義的政黨組織而用的勞農派的統一戰綫，是完全不同的。

農民勞動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組成，馬上就被資產階級政府解散了，它比以前所有的無產政黨運動都好，因爲它裏面有共產黨所採用的方針，所以有充分的革命性。這首先是因爲日本共產主義集團雖然勢力不大，却是獨立存在的，當時無產政黨運動能夠有革命性，這是一個重要條件。正像當時我們黨所明確地主張的那樣，它是共產黨爭取羣衆的舞台。這種主張和這種意義，都明顯地表現在共產國際一九二五年一月綱領和一九二六年二月綱領中。實際上，當時我們黨在無產政黨組織運動過程中，爲使無產政黨採用革命的行動綱領而進行的鬥爭，以後將永遠存在於革命工農羣衆的記憶之中。在第一次無產政黨綱領審議會中，已故渡邊政之輔同志怎樣爲黨所主張的革命行動綱領而



作強烈的鬥爭，也是使人忘不掉的一種記憶。特別是我們黨的代表是怎樣為擁護殖民地獨立解放運動而鬥爭，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代表却怎樣以殖民地「自治」這樣口號來支援日本帝國主義的可恥的機會主義綱領來對付我們這些事實，說明了當時無產政黨組織運動當中，革命潮流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的鬥爭已達到了頂點。

關於無產政黨組織方面的問題，我們黨堅決主張的是羣衆團體聯合組織，以羣衆團體爲中心的組織，也就是團體中心主義的主張。從這個主張中就可以看出我們黨對於無產政黨是怎樣一個看法了。無產政黨決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不是政黨。黨在無產政黨組織運動中所採用的方針，是把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等羣衆團體集攏來，在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漩渦中，使共產黨代表的左翼主張，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代表的右翼主張，公開來戰鬥，使這些羣衆團體，公然成爲共產黨獲得勢力的鬥爭舞台。當時山川均所主張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種種階級之間的特殊政治統一戰綫黨的見解，決不是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組織運動的根本方針。不消說，我們的方針和這恰巧相反。

實際上左翼勞動組合，支持了我們黨當時的方針。以無產團體評議會的組織，表明對於黨的支持。另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者却強烈地反對我們無產政黨組織運動方針，

● 第一次無產政黨綱領審議會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七、八日在大阪中央公會堂會議室舉行。在這個會議席上，總同盟及評議會的代表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殖民地的自治對解放乃是重大的對立。

曾經想要使它成爲一個爲社會民主主義所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可是羣衆支持我們黨，粉碎了他們的企圖，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成立了農民勞動黨。資產階級政府在這個黨成立以後，用它自己的國家權力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未作到的加以實行，解散了這個政黨。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後的卑劣的、厚顏無恥的無產政黨運動，一切機會主義化、右傾化的慘澹的努力又是怎樣的東西呢？我想現在沒有詳細說明的必要。但無論如何是可以把解散農民勞動黨當作一個界綫，此後所謂無產政黨組織運動完全變爲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組織運動。

但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最密切的結合，實行無產政黨社會民主主義化運動，也不是能够順利進行的。當時由於以勞動組合評議會爲首的各羣衆團體的頑強鬥爭，使以後的無產政黨運動，如衆所週知，會由最右翼社會民衆黨，變爲日本勞農黨，乃至分裂爲勞動黨。分裂以後的左翼勞農政黨運動中雖然無疑地曾經存在着工農鬥爭同盟的思想，但這若是有了政黨的形式，就必然使勞農政黨的運動和無產階級真正的革命的領導之下工農同盟的正確的道路，背道而馳。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以後，特別是那年秋天，很露骨地出現了公開的屈服的結黨方針。事實上不外證明勞動政黨的運動，不管怎樣站在左翼方面，只要是政黨，那就有陷入右傾機會的危險，也必然要走入社會民主主義黨化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初，強調我們黨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羣衆的黨，同時一時也容許了用大衆

黨這樣名義或用大衆的勞動黨這樣名義的勞農政黨的存在。可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就已經沒有容許的餘地了。一切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只有集中到強有力的高度集中的共產黨裏來纔行，黨員自不必論，廣大的革命工人羣衆，也理解到這點。共產黨的羣衆化，即是共產黨向着成爲羣衆的黨的道路前進，這是絕對必要的而且重要的過程。

這樣我們黨從一九二九年三月到四月，決定了以革命手段使勞農同盟解體的方針，並且爲實行這種方針作了準備。

以上所述，是我黨關於羣衆化、無產政黨和勞農同盟等問題所採取的方針。

東京市議會因爲發生了有名的「板舟貪污事件」●而遭到解散，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又舉行選舉。這次選舉的活動，及這次東京市議會以後的一九二九年三月到六月全國所舉行的市街村會選舉戰，這些鬥爭都是當時日本共產黨活動中的重要事件。關於這一點，就一切項目簡單地說一說。

日本共產黨參加全國的選舉戰，到這個時候一共纔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秋天因普選而參加了最初的府縣會選舉戰。到這時候黨參加這個選舉戰還不是黨獨自充分地在羣衆之間公然活動，乃是通過勞農黨而參加的選舉戰。在這次選舉戰

● 在東京魚河岸上，給靠岸的船搭上跳板的權利，被一部分批發商所獨佔。以廢除板舟權利問題爲中心，在東京市議會內發生了大規模的貪污事件。

中，以勞農黨爲首的一些剛剛參加選舉戰的無產政黨，雖然能選出幾個府縣會議員，但是這些議員，除去共產黨當選的同志以外，都因爲當選後沒有嚴格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節制，大部分都墮落了，結果是有的背叛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利益，有的雖然不到這地步，因爲沒有活動的基本目標，也就渙散無力。其次日本共產黨所參加的選舉戰，乃上述一九二八年春的國會總選舉——依照國會最初的普通選舉的國會選舉戰。又在一九二八年末，參加了東京市議會和全國市街村會的選舉。

黨的選舉方針，首先在東京市會選舉，得到了新經驗。在東京市議會選舉上，資產階級各政黨欺騙羣衆，說什麼爲了市政的純潔，推選人格本位的候選人，黨對於這種欺騙，進行了抗爭。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提出了「把市議會奪回到民衆手裏」的口號來爭取羣衆。這口號乍一看很好，實際上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我們黨爲揭露小資產階級本質進行了鬥爭。當時以左翼勞農同盟爲中心而組織的選舉鬥爭同盟所提出的口號是「樹立工人無產市民的市議會」對於這樣機會主義的口號，不管選舉鬥爭同盟是左翼團體，黨也曾猛烈地加以抨擊。我黨提出了「把革命的工人送到市議會去」的口號，把當時關在獄中的「日本共產黨事件之被告」唐澤清八同志首先提名出來，也提出其他數名革命工人作爲候選人，黨爲支持這些候選人來進行戰鬥。在選舉戰中，我們黨的東京地方委員會，以重要工廠爲目標，爲了建設確立並發展工廠支部，爲了激發工人的日常戰鬥，把黨的傳單標語大量地散發於工廠地帶，更努力組織種種公開的祕密的羣衆集會。

我們黨用以上方法參加了市議會議員的選舉戰，在成績方面來說，因為東京地方委員會的東京黨員同志都很熱烈地活動，可是結果還是不夠，尤其對於熱烈的宣傳活動，痛切地感覺到組織的活動是不夠的。

根據這些經驗，對於即將來到的全國市街村會選舉戰，日本共產黨採取什麼樣的根本方針，是有充分討論和決定的必要的。黨中央經過幾次討論，在四月作了最後的決定。黨對於市街村會選舉所決定的方針之要點列舉如下：

這些參加市街村會選舉的原則，就是上次參加國會選舉時黨的活動時所說的革命的議會主義的原則。市街村會的選舉戰雖然不會在羣衆之間發生像國會選舉戰那樣強大的全國性的影響，可是這和工農，特別是和貧農的日常利害有密切關係，因此在這種意義上，使羣衆感到極大的興趣。我黨的對策，首先是採取揭露那號稱地方自治體的市街村的階級性的方針。市街村雖然被稱爲地方自治體，實際上既不是什麼地方的，也不是什麼自治的，而不外是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國家不可分的構成要素而已；這是資本家、地主、富農爲了壟斷利益，爲了劫取工農利益而設的機關，是非敲骨吸髓不止的資產階級的投資收買的工具，是腐敗不堪的東西；特別是今天的大都市都在金融資產階級自己藥籠之中，更是這樣。

和我們的方針對立的，是那些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在羣衆之間拼命散佈什麼地方分權、徹底實行地方自治、都市社會主義、農村基爾特主義等幻想；他們說工農代表如

能在市街村佔到多數，即可把市街村會轉用爲工農羣衆自治機關。他們這樣賣弄社會民主主義議會主義的幻想；我們黨採取了和這些作徹底鬥爭的方針。

反動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又賣弄些改良的言辭，說什麼要從今日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國家的壓制下來解救市街村。若不和這種反動的主張來進行鬥爭，那末，我們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來參加市街村選舉就失掉意義了。

當時在左翼同情者中，十分可能要提出絕對反對內務大臣和府縣知事干涉市街村的權利，即絕對反對干涉權的口號。我們黨使羣衆認識到這樣口號從現在所說的見解看來，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決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我黨在這次選舉戰中所提出的口號，因各地情況不同，力量對比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但就主要的、基本的原則而論，則決定必須以下面這樣的體系來訂立：

第一、主張工農日常利益的口號。例如工人方面特別着重受僱於市街村的就業工人的工資問題。此外也提出改善一切勞動條件、工人住宅、免費旅店、工人食堂、澡堂等。此外爲工人及農村貧農要求文化和娛樂設施。農村中特別注意到帝國主義的重稅、高利貸、土地、水利、肥料等問題。必須提出主張農村人口中的貧農利益的口號。

第二、關於市街村的政治，也可以說是關於市街村政治機構方面。首先提出十八歲以上男女有公民權，工人投票日放假，撤銷工農投票之事實上的一切障礙；關於村長的一般投票和市街村財政中農村之歲出歲入及村有財產與公有財產之處分等，都是堅持和

地主、富農利益相反的貧農的利益；此外也提出廢除資產階級及地主掌握中的產業組合和農會等；主張青年團少女會等自治化。此外特別反對農村中地主的、主人的、官僚的種種統治。表現這樣要求的口號是必要的。

第三、必須有全國性的一般口號。不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選舉戰，必須向羣衆宣傳全國性的一般口號，例如：工農言論集會出版結社之自由，工農有團結權，有舉行示威運動之自由，廢除治安維持法及一切反工人法令。

最後提出「建立工農政府」作爲中心口號。

其次在這些選舉鬥爭組織方面，黨鑒於直到東京市議會選舉爲止的許多經驗作了以下的決定：

最要緊的是在這些選舉戰中領導中心應由共產黨來堅強地掌握。這就是說：黨要把選舉所應用的一切革命的階級勢力，加以組織和集中，而黨又必須成爲這些勢力的中心。在東京市議會選舉戰的時候所表現的像勞動同盟和日本共產黨的不一致的二重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狀態等，都必須斷然肅清。爲了使黨成爲選舉鬥爭的中心之唯一的領導者，首先必須在工人作工的工廠或工廠支部的周圍，組織羣衆的工人選舉同盟，結合革命的勞動組合、農民組合、及改良派勞動組合中的革命的反對派，在工廠或農村裏組織無產階級選舉聯盟，我黨必須在各處作爲選舉聯盟的聯絡中心，又作爲它們的靈魂來進行工作。但是這些聯盟，不論從什麼意義上來說，決不能代替共產

黨。不論在口號裏，不論在候選人中或在其他一切活動中，都不能用選舉聯盟來代替我們黨。黨不論在口號上不論在方向上或其他一切方面，必須堅決保持獨立性。不過在現在的情態之下，爲了把黨的宣傳有效地和羣衆結合，不得不利用這個聯盟而已。

以上是關於選舉鬥爭組織所決定的事項。黨根據一九二八年春天國會選舉的經驗，並鑒於共產國際領導的意見和批評，認清社會民主主義各黨派，即那些用種種名目偽裝爲工農的朋友實際是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政黨，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我們的朋友；在這次選舉戰中，採取了斷然把它當作階級敵人，徹底和它抗爭的方針。不許對社會民主主義各政黨有任何調和與妥協。但是一點也不妨礙各政黨所屬的工農羣衆，來和共產黨及革命的勞動組合，從下面、從工廠、從農村結成統一戰綫。此事極重要，對工廠選舉聯盟和無產階級聯盟也是這樣，必須採取從農村、從工廠、從下面來建立羣衆的統一戰綫的方針。

而且這次選舉鬥爭中主要的是組織羣衆行動。因此就要激發工人組織經濟的罷工和農村羣衆鬥爭的示威運動，並且要看情形去組織政治罷工、羣衆大會和示威運動。在這些選舉鬥爭之中，黨爲了領導羣衆，爲了爭取羣衆，確定了這些必要事項。上面講過，在東京市議會選舉戰的時候，文字的宣傳鼓動很熱烈，而組織的領導却未能迎頭趕上，因此有許多地方失敗了。現在有鑒於此，決計要在工廠要從工廠到街頭來動員工人，發起羣衆大會和示威運動。從工廠回到家裏的工人，不是從家裏把他找出來而是在工廠裏



把他們集合起來，在街頭集體動員工人羣衆。這些事不僅要公開地作，也要秘密地作。黨的候選人全都要站在這些鬥爭的前列，把羣衆注意力與信任集於一身；領導者與其在街頭作發表政見的演說，不如先在工廠內參加和領導各種集會和鬥爭更爲重要。

關於選舉戰的候選人，黨首先把黨員候選人置於黨的嚴格節制之下。其次，選舉聯盟的候選人不是置於選舉聯盟之下，而是必須使他們在黨的節制之下進行活動。提不出黨員候選人的地方，必須採取支持革命工人候選的方針。有一些分子雖然有革命的階級約束，而一旦當選坐上議員的椅子，就背叛了階級；對於這種分子，必須徹底排斥。

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主義各黨派，胡亂賣弄些什麼應該正確投票啦，什麼羣衆利益全在投票啦等等的話，黨必須和它們堅決作鬥爭，同時在另一方面，左翼陣營中有認爲當選落選都沒有關係的一種消極論調，黨必須毅然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因此最要緊的不是把散票弄到一塊，而是爭取工廠農村特別是工廠中的羣衆有組織的集中的投票。這樣投票纔能真正成爲我黨無產階級力量的氣壓計，纔能成爲選舉戰中黨的活動的氣壓計。「有組織的集中的」這是必要的。

像這樣地當選爲市街村的議員的時候，他們不是對選舉區負責，而是應該完全對黨負責。當選的議員在議會的一切行動，完全由黨節制，對於重要問題的發言、提案、演說，一切都必須得到黨的承認。黨命令要作的，一切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和執行。黨的議員重要的任務，是把議員的特權利用到最大限度，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超越特權的限

制，揭露資產階級議會的階級性，鼓動羣衆行動起來，而自己則站在前列和資產階級戰鬥，利用議員的特權，公開在羣衆之間鼓動並宣傳共產黨和黨的口號。

以上只是舉了些要目，但大體上我們是在這種意義上，決定市街村會選舉方針而付諸實施的。

黨的活動直到「四·一六」檢舉以前，重要的事很多，但這些就不在這裏多說了。

現在只講一點從「三·一五」以來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間與瘋狂如故的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相鬥爭的事實。這些事實說明我黨不斷地面臨着鬥爭，而在任何鬥爭中又必須惡戰苦鬥。資產階級對工農的鎮壓、迫害，例如對許多同志拷問、傷害和虐殺，使我們付出了種種的犧牲，其中我們共產黨悠久的領導者、日本共產黨總書記渡邊政之輔同志，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帶着黨的任務去活動的時候，在台灣的基隆亦被日本資產階級的官憲殺害了。

渡邊政之輔同志犧牲以後，資產階級用了一切縝密而周到的手段，多方地狡辯，捏造說渡邊政之輔同志不是由官憲殺害而是自殺的，企圖遮掩他們對我黨優秀的領導同志所加的慘酷行爲，以便消弭羣衆的怒火。

我黨根據事實，確認渡邊政之輔同志是日本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的犧牲者，他決不是自殺而確是被資產階級官憲殺害的。渡邊政之輔同志在台灣的行動，是在與日本共產黨保持正常聯絡之下進行的。他在台灣基隆被資產階級官憲殺害的消息，雖然沒有馬上

傳到我們黨裏，但不久通過海外的道路——正式通過共產國際的道路——傳到了我們黨裏。根據這個，證明資產階級官憲逮捕殺害了渡邊政之輔同志了。

我們黨向羣衆宣揚，渡邊政之輔同志爲了黨是怎樣活動的，爲了黨的發展作了些什麼偉大的工作，特別是他爲了在日本實踐共產國際一九二七年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是怎樣站在同志們的最前列而作英勇犧牲的活動，直到他死在台灣以前，是怎樣在我們黨最困難的時候，常身先羣衆作爲我們無產階級的英雄而進行活動。同時還告訴羣衆，爲了繼承渡邊同志的遺業，必須參加到共產黨裏來，爲日本共產黨的事業而奮鬥，爲日本共產黨的羣衆化和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渡邊同志的犧牲，雖然有資產階級的一切反宣傳，但是欺騙不了工農。渡邊同志的犧牲，更在羣衆之間培養了共產黨的新勢力，而使黨成爲斬除不盡消滅不了的偉大力量。

關於在當時白色恐怖之下被殺掉的山本宣治同志，只要回顧一下他間接支持我們黨的戰鬥功績，就知道死於暴力團兇刃下的山本宣治同志，並不是作爲暴力團的犧牲，實在是作了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的犧牲。我們從這種意義上來着想，就把山本宣治同志在我們黨的旗幟之下埋葬了。

在白色恐怖瘋狂的狀態之下，我黨迎接「三·一五」第一周年決定並進行了許多黨的具體活動。爲了紀念「三·一五」，到處召開了公開的和秘密的會，爲黨的羣衆化進行鬥爭，在紀念這個日子的時候，作了種種事業，在各支部中發行了各種工廠新聞。

在這個期間，「日本共產黨事件」的公審開庭了。在這個公審當中，被捕的同志們在公審法庭裏如何把日本共產黨怎樣合於正義，一步也不退讓地把自己的主張和鬥爭的情形，明確地表現出來。資產階級禁止公開審判，要在暗中把這件事掩埋下去。我黨揭發了這種陰謀並且和它進行鬥爭。我們黨對羣衆說：資產階級打算禁止「共產黨事件」的公開審判了，他們禁止公開不是爲了別的，他們知道日本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唯一真正的黨，是全體勞動羣衆的朋友，他們怕羣衆普遍地深刻地知道了這件事。

直到「四·一六」事件發生以前，我黨進行了這些大的鬥爭，看出了組織方面新的發展以後，遂召開了全國組織會議，爲開黨大會作了準備。在黨的大會上，爲了制訂目前政治情勢和我們黨的任務的綱領、黨的組織綱領、農民運動綱領等三種重要綱領草案，設立了特別委員會。特別是組織問題，在海外設立了特別委員會，爲大會開始作準備工作。而正在準備過程中即受到「四·一六」大檢舉。

自一九二九年初，工人及貧農的階級鬥爭又漸漸尖銳起來，帝國主義戰爭危機非常迫切，共產黨不但不會絕滅，反而越來越得到羣衆的信任，成爲羣衆的朋友，在羣衆之間擴大它的勢力。資產階級覺得有對黨加以打擊的必要，所以當然就要進行這次「四·一六」的大檢舉了。

## 結尾語

以上大體講了我們黨自創立以來到「四·一六」檢舉的重要活動。當然這連我們黨活動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沒有說到。但是根據這個，我想就可以明白我黨自創立以來，是怎樣爲無產階級而站在前列來鬥爭的歷史了。我黨自創立以來，九年之間決沒有作過什麼標新立異的事，不過固守着工人階級的利益，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爲貧農的利益和解放而鬥爭罷了。

這就是說，我黨是爲了擁護和擴展日常利益而鬥爭，特別是對於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進行鬥爭。爲了勞動組合的組織，爲了勞動組合的革命化，爲了統一戰綫，比什麼都熱烈，比什麼都忠實地進行了鬥爭。我黨更爲了農民，尤其是爲了貧農的利益而進行鬥爭，特別是爲了迫切的農業革命進行了鬥爭。

我黨爲一切青年和婦女工人而鬥爭，爲了援助共產主義青年團而工作。此外又爲了工農的團結，爲了工農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對於資產階級殘暴的反無產階級的法律、階級法案、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治安維持法以及其他反無產階級法規，對於世界少有的暴虐的警察恐怖，對白色恐怖，對走向法西斯化的政府，進行了鬥爭。

我黨爲了保衛世界無產階級唯一的祖國蘇聯，爲了支持中國革命，爲了殖民地獨立解放運動，爲了國際工人的團結而鬥爭。又爲對帝國主義戰爭危機而鬥爭，對於對外出兵更不必說，對於一切排外主義、軍國主義也都展開了鬥爭。我黨把這一切鬥爭，都集中到使現在日本國家的崩潰——包含着廢除君主制的整個國家的崩潰、工農的解放、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之鬥爭裏面。而且我黨也在這一切鬥爭裏面，常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展開激烈鬥爭。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我黨內部，爲了克服種種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由於共產國際領導和援助，而展開了克服這些機會主義的鬥爭。

黨對於這個時期許多地方的成功以及迭次的失敗，是從來不隱諱的。凡是日本共產黨作爲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密切結合的時候常是正常的發展下去。黨離開了共產國際的領導的時候，就必然崩潰或停滯不進，脫離羣衆而陷於孤立。

這就是說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而革命理論絕對需要由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來武裝它，這種革命理論在工農鬥爭中是容易使黨獲得的，決沒有什麼困難。

黨在工廠裏面紮下了深根，必須和工廠脫離黨的領導的一切傾向展開鬥爭。黨在一切情況之下，自我批評都是絕對必要的。自我批評對於黨的發展比什麼都重要。對於那些妨礙黨的發展的各種因素和各種傾向，對於那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路線的各種因素，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驅逐，黨纔能成長。我黨不只對於這樣的過失、錯誤和

偏向，即對於大的政治錯誤和過失，也必須堅決地加以處置。事實也證明，如果不這樣做，黨是不能發展的。

我黨在過去九年之間，經過種種道路和逆境，尤其是受到「三·一五」和「四·一六」大檢舉，在白色恐怖之下犧牲了許多同志，他們那種無產階級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忠誠，刺激了一般同志，因此在瘋狂的反動之下，爲了黨的再建前仆後繼，新的同志挺身而出參加了戰鬥。這雖然及不上中國共產黨那種偉大而英勇的模範行動，但是這說明了黨越來越得到羣衆的支持和越來越羣衆化，我們黨已經斷然不饒恕「三·一五」和「四·一六」大檢舉的敵人了。

但是我黨若沒有任何犧牲，成長和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犧牲在黨的鬥爭中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同志曾經說過，犧牲以後更能得到數百數千的黨員，那末犧牲是不算什麼的。

黨的發展是必然的。黨的勝利，即無產階級的勝利，乃是必然的。

## 最終陳述

(一九三二年七月五日檢察官論告①，七月十四日起開始最終陳述，市川正一是在二十四日說的)

檢察官代表天皇、三井、三菱、德川等一小撮大金融資本家地主貴族，請求判處三田村同志死刑，佐野、鍋山兩同志和我無期徒刑，一百幾十個同志千載未聞的有期徒刑。而且在這請求判刑以前，已有渡邊同志以次數十人被害。在論告那一天，這個審判所附近都架有機關槍。雖沒有聽說這機關槍已向工農開火，可是這機關槍顯然是預備屠殺工農的。要求判處三田村同志死刑的資本家地主們和吸血鬼一樣，正虎視眈眈地想吸工農的血。

所以工農都感覺到這個審判是自己切身的危險。爲了對於這種死刑重罰表示憤慨，在工廠、農村到處都有起而奮鬥的。單看東京的例子，已經有城北四十一個工廠的代表

① 論告，在刑事訴訟法上，是就他人的情事而申述自己的意見。這裏是指警察機關向司法機關提出論告，請求判刑。被告在論告求刑後可作最後陳述。而後司法機關即予判決。——譯者



開會，議決反對判處共產主義者死刑重罰，城南方面也有十幾個工廠的代表集會，議決「無罪釋放我們的先鋒隊」、「奪回先鋒隊」。此外聽說在十九日的夜間還開了一個批判對共產黨公審判決的演說會，在那裏有七百多聽衆突破警察憲兵的重圍前往參加，工人有如潮湧地奔往會場。警察憲兵因恐懼羣衆的憤激而解散演說會時，革命工人喊着「絕對反對判處共產主義者死刑重罰」、「立刻無罪釋放共產黨員及一切階級的政治犯」，勇敢地舉行了示威。

工農及其他一切勤勞羣衆真是堅決地反對對我們的死刑重罰，並拼命地在作鬥爭，由上述的事可以證明。

庭長日前爲了贊助檢察官的論告和請求判刑，得意洋洋地說，法庭接到鼓勵庭長的信，當然資產階級地主對於這種階級審判會寫信來鼓勵。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們贊成處共產主義者以死刑呢？把姓名告訴我吧。

本來，整個共產黨事件是由白色恐怖或欺騙所造成的。檢察官以空洞含糊的話來論告，其中有什麼「七千萬國民所信仰的我國國體」、「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維持着社會的安寧秩序」等等騙人的話。

可是，這樣抽象的話也不能輕輕放過。因爲檢察官爲了騙人，說黨和共產主義者都是七千萬同胞的敵人，故必須以死刑重罰來判罪，才利用公審法庭，在論告的形式下來作惡毒的煽動。直到今天，檢察官作爲警察政治的兇手，又作爲資本家地主的代理人不

知怎樣地在誣蔑我黨和共產主義者，在怎樣地作惡毒的煽動，只要舉出他們曾經瘋狂地製造解黨派一事就足以證明了。在這一方面最賣力氣因而得到資本家地主的褒獎的，就是龜山檢察官。還有坐在那兒的戶澤檢察官，近來對要求保釋出獄的同志們說：「如果外面的同志們不寫一封斷絕關係的信來，那末決不放出去。」威迫利誘，想盡方法要使我們的同志腐化墮落。他們企圖隨便使用「七千萬國民的信仰」、「千古不磨的憲法」、「三千年來的確信」等抽象的詞句，使階級審判中的一部分——論告和請求判刑——的階級性神秘化。可是檢察官顯然是軍事的警察的君主制的走狗，是資本家地主的忠實奴才。

平田檢察官到資本家最高政策決定機關的工業俱樂部去，報告檢舉共產黨的經過情形，報告同志們及解黨派人們的傾向和行動。檢察官這次論告和請求判刑的時候，是否直接接受了工業俱樂部及經濟聯盟的指揮命令雖不知道，但平田檢察官曾與大資本家會商，對於這次的論告和請求判刑得到一些教訓，那是毫無疑義的。

不僅是檢察官；庭長也曾利用這次公審，大大地誣蔑我黨和共產主義者。身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司法官，而竟批評我黨的組織原則，說什麼「鐵的紀律豈不是變為鉛的了嗎？」甚至把叛徒考茨基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背叛分子都牽扯到一起，對馬克思和列寧也都加以誣蔑。

所謂假借天皇名義的審判的超階級性，就是這樣的東西。對於我黨以及在我黨旗幟之下鬥爭的工農，檢察官則在暗中、庭長則公開地加以惡毒的誣蔑。

檢察官已經論告我們共產主義者是犯了罪的人。可是究竟共產主義者是對誰的犯罪人呢？

打倒那種連根剝奪佔國民百分之八十的工農大眾的自由，並用奴隸的鐵鏈把人民大眾束縛起來的、反動的、反革命的君主制，這究竟是對誰犯罪？反對那種爲了一小撮資產階級地主的利益就驅使工農大眾去殺戮同胞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人究竟是誰的敵人呢？爲了根本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爲了確立七小時勞動制而作鬥爭的我黨，難道是工人的敵人嗎？當農民爲了要求土地正在起而鬥爭的時候，我們站在這個鬥爭的前列，爲了沒收皇室所有、官有公有、寺院神社所有以及一部分寄生地主所有的土地而作鬥爭，還能說我們是農民的敵人嗎？

實則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是只把資本家地主君主制才當做敵人。反對君主制和帝國主義戰爭、向着爲了糧食、土地和自由而建立工農政府的人民革命進行鬥爭的我黨，絕對不是對工農的罪犯。我們却是對於一小撮資產階級地主的敵人。不過是連百分比也够不上的那樣極少數資本家地主的敵人而已。

然而檢察官却誣蔑我黨和共產主義者是人民大眾可怕的敵人，想把我們當做「七千萬國民」的敵人來判罪。這才是空洞含糊的論告的政治意圖了。

檢察官又誣蔑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不顧現實的人，把我們說成好像與工農大眾的利益毫無關係地作爲空想家而行動着似的。可是，現實地所存在的却和檢察官所說的完全相

反。我黨的口號中所說的，推翻君主制、沒收寄生地主的土地、確立七小時勞動制，却不是與工農大眾的利益和信念背道而馳的。我黨在這口號之下，已經繼續鬥爭了十年之久。如因此而對我黨大加鎮壓，工農的利益絲毫未能伸展。今天在日本，佔七千萬國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及其他一切勤勞大眾，還有二千萬以上的朝鮮和台灣殖民地民衆，正陷於饑餓的深淵。而且，當大多數人民有一餐沒一餐地挨餓的時候，大資本家却盡量自肥，這無非由於君主政治的警察的統治壓制工農的反抗而擁護資本家地主的利益的緣故，人民大眾已經漸漸感覺到了。人民大眾對於什麼國體和私有財產的信念，已經大大地消滅，代之而起的，乃是階級鬥爭的信念、共產主義的信念、無產階級專政的信念、對於日本共產黨的信念，這種信念正在工農大眾之間像洪水一樣地增大成長着。這就是不假的現實。檢察官的論告說我們不顧現實，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相反了。

但是，檢察官說到國體的尊嚴、天皇的神聖，這不僅是因爲不顧現實，實則是具有深的階級的心腸。今天的君主制乃是資本家地主追求利潤的武器。而且在日本的國體即軍事的警察的君主制裏面，有着前時代的反動的野蠻性，它束縛着人民大眾的政治生活。檢察官爲了想要隱蔽、欺瞞這樣的現實，才把七千萬國民的信仰引出來，與千古不磨的大典云云的美辭麗句相並列。

這個檢察官的煽動，與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所說的國體論即皇室論是相同的。永田秀次郎談到皇室的效用，第一個效用乃是皇室的存在可使人心安定和緩國民間的傾軋，

第二個效用乃是行大赦、行慈善事業來在社會風教上起最高的作用，第三個效用乃是國家存在的表象、是國民精神的表象、是國防的表象、是軍人精神的表象，第四個效用乃起有獎勵國民文化生活並使之提高的作用。

可是，天皇並不是這樣的超階級的存在。

第一、皇室乃是每年產生利潤二千萬圓的大土地所有者、大股份所有者，所以皇室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利益，成爲資產階級地主剝削工農的先鋒。

第二、所謂皇室的慈善事業和大赦是什麼？一九二八年的大典時的大赦是怎樣呢？不是把階級的政治犯即治安維持法違反者全部除外，並以大典爲口實而逮捕和鎮壓了八千工農嗎？而且對於從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奮起的殖民地大衆不是用飛機的轟炸和毒氣來大屠殺大鎮壓嗎？雖然支出微乎其微的傷兵救恤金，那裏能抵償天皇對工農所行的血腥的鎮壓呢？不過罪惡的欺騙而已。

第三、說什麼天皇是軍人精神的表象，這次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時，不是把反對戰爭的兵士大舉屠殺了好幾百人嗎？

第四、說什麼皇室可使國民文化生活提高，它不是日本一切反動的、封建的野蠻文化的中心嗎？

像這樣的君主制即國體與其說「七千萬國民的信仰」，毋寧說佔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大衆的敵對物。像這樣的國體既可變革，而且一定非變革不可。

以人民革命來粉碎這樣反動的、反革命的國體，在資產階級地主看來或許是值得處絞刑的犯罪。但在七千萬民衆看來却斷斷不是犯罪。這已日益成爲工農大衆的信念了。

檢察官在論告時說：「私有財產將來或有可以改革之處，但現在的社會秩序，却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上維持現狀。」這件事乃由資產階級兇手檢察官自己表示已經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欺瞞。日本資產階級在一九二八年把治安維持法改壞時，對國體的變革與私有財產制度的變革加以區別，特別對於國體的變革規定處以死刑、無期徒刑。他們是藉此使人覺得治安維持法的主要目的好像在於國體的防衛。可是平田檢察官在論告時說，只有私有財產纔是社會制度的根本，國體即君主制乃建立在它上面而又是它的擁護者。這就暴露了治安維持法的根本目的在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地主的私有財產制度之擁護。資產階級露出神秘的神聖的假面目，首先就提出君主制，藉以欺騙工農大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

古時有句諺語：「欲射將者必先射馬」。國體——君主制是馬，而資本家的私有制是它的將。資產階級騎在名叫君主制的馬上鎮壓着工農。所以我們必須首先集中主力來推翻作爲馬的國體——君主制。

第一、我們必須推翻君主制。即使從馬墜下來，大將也不會立刻就死。若不把大將的腦袋割掉那是不中用的。所以推翻君主制之後，還得要粉碎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資本主義制度。

資產階級故意使人覺得好像私有財產制度是一般的，假裝着是擁護它的。可是，所謂一般的私有財產制度決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資本家的地主的剝削的私有財產制度。我們是要和這個制度鬥爭，把它推翻的。

資本家的剝削的財產制度乃是把工人當做工資奴隸，為資本的剝削而加以束縛的鐵鎖。使工人日益陷入貧困、奴隸、失業、饑餓、墮落和一切悲慘的非人的狀態的，就是這個資本家的剝削的財產制度。不僅如此，這個私有財產制度把農民作為個體的小農，為地主的剝削而加以束縛，聽其受着高利貸的剝奪。而且這個制度把小市民中間層趕到窮困和沒落的路上去，使他們徘徊於神經病的反抗與懦弱無能之間。把工農大眾拉到殘酷的帝國主義戰爭中，並使殖民地勞苦大眾受殘酷的剝削與鎮壓，也正是這個剝削的私有財產制度。

這個資本家的地主的剝削的私有財產制度非被打垮不可。剝奪者非被剝奪不可。大工廠、大礦山、大交通運輸機關、大銀行等的剝削財產必須從大資本家之手奪歸工人之手，非移交工人管理不可。天皇和地主的寄生的土地必須加以沒收而分配給農民。檢察官所說「私有財產制度將來或有可改革之處」，這只是欺騙而已。資產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矛盾，又因為工人階級的猛烈反抗，以致自己的剝削財產制度發生了動搖，想要憑藉國家權力來抵制、來加強，並加以法西斯的暴力的變革，以期自己的生命無限期地延長。檢察官就是想要開關走向法西斯的獨裁統治的道路的人了。

平田檢察官對被告等在企圖變革那個基於千古不磨的大典的、建立在七千萬國民的信仰之上的國體和私有財產制度加以指責，並認為有着憑藉暴力革命的意圖而加以攻擊。這個作為資產階級的兇手的檢察官，正在這樣地千方百計，想要使工農大眾抱着那末一種感想，把日本共產黨看做好像流氓團那樣地極其兇暴的東西。可是，這個檢察官的陰謀是失敗了。

工農在罷工、佃農爭議及其他極切實的日常鬥爭的場合，都親自經驗過警官、憲兵、流氓團用怎樣兇惡的暴力來壓迫他們的情形。並且他們已經明白地知道，為了爭取自己的勝利必須武裝起來，使用暴力來和這個資本家的暴力戰鬥。不僅如此，工農大眾已經知道，爲了要從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奴役、失業、飢餓、墮落中解放出來，又爲了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悲慘境遇，必須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以羣衆的武裝起義公然與資本家地主的國家權力作武力鬥爭，建立工農的日本蘇維埃政權。平田檢察官的爲着資產階級的陰謀已歸失敗。

所謂工農的暴力是什麼呢？就是在檢察官所樂道的「七千萬國民」之中佔有絕大多數的工農的力量，是有組織的集體的力量。至若一個一個的人投着炸彈到處奔跑、携着槍械跳來跑去，那就不是共產主義者的暴力。平田檢察官却把日本共產黨當做暴力團那樣的東西來說。可是，兇惡的反動的暴力之使用者不是別人，正是平田檢察官拜倒在其膝下的資本家地主。試問驅使警官、憲兵、檢察官、推事、看守、流氓，日日夜夜對工



農使用着暴力的難道不是資本家地主嗎？自己製造的騙人的法律，自己又來破壞它，對工農實行白色恐怖。不論是在檢舉共產主義者的時候，在罷工、佃農爭議的時候，也都是把暴行、凌辱、拷問、暗無天日的殘酷的野獸的白色恐怖加在工農的身上。試問能夠否認這個嗎？只有資產階級纔是兇惡的暴力之使用者。這都是工農大眾所身受的、所深知的事情。

檢察官攻擊日本共產黨是秘密結社。究竟日本共產黨在工農大眾看來是秘密的存在嗎？工農因力量關係，知道工農的組織對於資本家地主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秘密的。而日本共產黨對於工農大眾却不論在什麼樣的時候也公開它的存在，並公佈它的政策。在工農看來，日本共產黨決不是秘密結社。

實際上施行秘密的却是資產階級及其幫兇。試看這次的審判吧。作為資產階級的兇手的警官、檢察官、推事長、推事等，正在黑暗中打算加罪於無產階級的先鋒。作秘密的行爲者正是資產階級以及作為它的兇手的警官、檢察官、推事、資產階級學者、資產階級議員及其流亞。這是工農大眾所親身經驗而知道的。

檢察官以日本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曾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爲了廢除君主制、推翻資本家地主政府、建立工農的日本蘇維埃政權而戰鬥云云的理由，要求對共產主義者加以虐殺或永遠監禁，要求着工農先鋒的血。這正是從檢舉以來，由資產階級的兇手們在警察署、監獄內所施行的血腥的白色恐怖之集中的歸結。即

如檢察官暴虐地請求判刑，那正說明着資產階級是想要吮吸工農先鋒的血。

檢察官的請求判刑也實在全是虛偽和欺騙。幾乎是對一切被告都要求判處五年、六年的重刑，但是似乎連治安維持法的條文也違反了的這種重刑，却是懷着使四年、五年的長期拘留合理化的計謀。

其次檢察官對於三田村同志要求判處死刑，要他的腦袋。這個對三田村同志的腦袋的要求，實在是對我們全體被告判罪的集中的要求。不，簡直是對全工農的集中的鎮壓。檢察官使人覺得三田村同志曾向前往逮捕的特務高木信平發放手槍那件事儼然當作是無賴漢的行動似的，想使死刑合理。可是，三田村同志的發放手槍却完全是衛黨的政行爲。他們是打算藉着三田村同志的死刑，來開個先例，以便讓「四·一六」以後因衛黨而勇敢地使用武器的一切共產主義者依據先例都判處死刑。不僅如此，三田村同志向來作爲無產階級的先鋒而忠實地勇敢地鬥爭，作爲英明的領導者而工作，所以要求他的腦袋。我們對於資產階級這樣的鎮壓是要徹底地鬥爭到底的。

資產階級及地主爲了維持他們自己的利潤追求和剝削統治，對於向來作爲工農及勞苦大眾的領導者、作爲革命運動的組織而鬥爭的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用法律的名義，並假借人民大眾的名義，以檢察官的論告和請求判刑，要求他們的血。要求着向來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廢除君主制、推翻資本家地主政府、建立工農政府、實現爲了爭取糧食、土地和自由的人民革命爲目標而進行鬥爭的先鋒的血。

我們對於像這樣的檢察官的論告和請求判刑，不僅要大衆一齊站起來呼號反對，並且要以行動來抗議，爲了使他們的圖謀終於落空，並使剝削者及其幫兇的命根斷絕，相信會把這個宣判推翻並使它消滅。

我們今天處於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周圍都有資產階級地主爲維持其統治在以最殘酷而兇暴的手段進行着最後掙扎。對於工農的經常的鎮壓，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滿洲侵略戰爭而虐殺日滿人民，還有對蘇聯的干涉戰爭的危機都在目前進行着。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推翻君主制！爲爭取糧食、土地和自由的人民革命日益迫切。人民革命必定到來。

日本共產黨萬歲！

共產國際萬歲！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